

抢救史料 综合研究
普及知识 服务现实

中共淄博市委宣传部 主管
中共临淄区委 主办
双月刊

2014年第3期
(总第66期)

特邀顾问

李学勤 葛剑雄
刘庆柱 纪连海

顾 问

王志民 张建国
周清利 徐景颜
岳长志 郭利民
齐秀生 陈庆照
解维俊 唐福泉

编 委 会

主 任 毕荣青
副 主 任 宋振波 王秀荣
曹丕祯 张召才
委 员 刘素梅 王克林
苗 玉 宣兆琦
高广举 张士友
孙林涛 毕国鹏
宋爱国 郑德新
苏向东 刘学军
苏宏伟 杨 健
王同国 王金智

编 辑 部

主 编 张召才
副 主 编 苏宏伟 王金智
责任编辑 韩宏博
编 辑 姜 健 姚素娟
编辑出版 中共临淄区委宣传部
临淄齐文化研究中心

刊 号 鲁淄文广新准字(2014)ZBL210号

地 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东路1号

邮政编码 255400

电 话 (0533)7218186 7218187

传 真 (0533)7218187

电子信箱 qwhyjzx@126.com

网 址 www.Linzi.gov.cn/qwh/

印 制 淄博临福激光印刷有限公司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部分文章和照片非本刊原创,请作者与本刊
联系索取稿费。

学术研究

- 齐文化廉政思想的兴亡观 王衍杰 姜太公的廉政思想 03
及其影响 宋玉顺 05
- 齐人独特而深刻的廉政观 姜 健 09
- 简析管晏节俭思想中的道德因素 姚素娟 11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高恒昌 14

人物春秋

- 敢与秦始皇廷辩的临淄大儒——浮丘伯 王景甫 17
- 田完——田氏齐国缔造者 孙长征 19
- 佛学大师善导生平事迹 许道田 杨文山 21

稷下漫谈

- 秦始皇帝的东方情结 周新芳 24
- 趣话白兔丘高傒墓下“关圣帝君庙”楹联 高庶值 29
- 太极拳与《孙子兵法》中的整体与局部简说 李光乐 31
- 唐人诗歌颂管鲍 陈巨慧 32
- 齐文化在世界再次大放光彩 张福信 33
- “守险全国”辨莒邑 朱 宇 36

图说成语

- 舍本逐末 韩雷声 朱代训 37

遗址巡礼

- 春风沉醉马莲台 王德亭 38
- 金山游记 仇绪芳 39
- 牛山怀古 孙方之 40

考古发现

- 临淄山王汉代兵马俑出土始末 王会田 贾 健 41



文化遗产

| | | |
|-----------|-------------|-------|
| 临淄春耕习俗 | 王毅 | 43 |
| 陈姓渊源 | 闫树学齐文化精神(四) | 中国 45 |
| 图腾文化艺术研究院 | | 46 |

文博之窗

| | | |
|--------------|---------|----|
| 临淄于姓探源 | 于有存 于启泉 | 47 |
| 齐长城墙体的病害及成因 | 张艳群 程留斌 | 48 |
| 文物生物病害研究的重要性 | 柯院馆 | 49 |

故事长廊

| | | |
|--------------|-----|----|
| 甘德迎“神十”会“玉兔” | 朱航宇 | 52 |
| 齐国故事二则 | 曹承章 | 54 |
| 霸主 | 马新亭 | 55 |

齐都艺苑

| | | |
|------------------|-----|----|
| 西江月·临淄 | 刘德昌 | 30 |
| 孔子闻韶处 | 凌鼎年 | 35 |
| 七律·齐地吟(两首) | 李光乐 | 53 |
| 七律·老有所乐 | 刘长胜 | 55 |
| 乐游博物院 品鉴文化餐 | 徐大伟 | 60 |
| 东周殉马 | 胡云丽 | 61 |
| 万化山上遥想火牛阵 | 于永军 | 62 |
| 泄柳店,相约在一个雨天里 | 憨仲 | 63 |
| 北部乡镇齐文化考察记 | 李玉国 | 65 |
| “董永与七仙女”故事的由来和流传 | 杨玉勇 | 66 |

本刊理事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丁有江 | 淄博东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
| 于少华 | 临淄区金岭回族镇党委书记 |
| 于亦刚 | 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
| 王云明 | 临淄区稷下街道党工委书记 |
| 王立义 | 山东兔巴哥集团董事长 |
| 石建新 | 淄博市王煤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
| 田钢昌 | 淄博市环保局齐鲁石化分局局长 |
| | 临淄环保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
| | 临淄区辛店街道党工委书记 |
| 徐继国 | 临淄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 |
| | 临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 |
| 李家刚 | 临淄区朱台镇党委书记 |
| 刘恩慧 | 临淄区皇城镇党委书记 |
| 张成刚 | 临淄区齐陵街道党工委书记 |
| 朱春光 | 临淄区凤凰镇党委书记 |
| 朱伯学 | 临淄区齐都镇党委书记、镇长 |
| 宋爱国 | 临淄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
| 杨晓军 | 齐鲁化学工业区综合管理局副局长 |
| | 临淄区金山镇党委书记 |
| 周恒学 | 临淄区雪宫街道党工委书记 |
| 国爱梅 | 临淄区政府副区长 |
| | 临淄区闻韶街道党工委书记 |
| 郑家晴 |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
| 郑德敬 | 山东蓝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
| 郭天勇 | 齐都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
| 路德芝 | 临淄区敬仲镇党委书记 |
| 翟智 | 淄博市公路管理局临淄分局党支部书记、局长 |



齐文化廉政思想的兴亡观

王衍杰

齐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中包含了廉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对历代的统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当今的反腐倡廉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溯源廉政思想的发端,深受尧舜时期的节俭孝行活动和夏商时代关龙逢、比干宽刑薄役思想影响。笔者认为,廉政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产生还是从周师齐祖的姜尚开始的,其后经历了管仲、晏婴等人的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齐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注重了与朝代兴亡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兴亡之变,廉政关键

姜尚、管仲、晏婴都从前代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注重廉政,倡导清正廉洁,把廉政看做兴亡的关键。姜尚是周文王、武王的军师,西周著名的军事家和思想家。他亲历了商朝后期的残暴统治和贪淫腐败,在助周伐纣建立西周的过程中,深知商纣灭亡的原因。因此,姜尚认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六韬》)即当政者的清正廉洁与国家兴亡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他还否定国家的兴亡在于天命的观点。如果当政者残暴昏庸,荒淫无度,那么国家就出现危机,社会就不稳定。管仲则把国家的兴亡与“礼义廉耻”辩证统一,把“廉”列为治国之纲,突出了“廉”的重要地位:“国有四维,礼、义、廉、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管子·牧民》)即国家有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不稳;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倾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四维”的本意是指系在网四角上的绳索,借助四维,网的纲和目才能提得起来。这里的“四维”则是指维系国家的精神意志的四项基本支柱。“三维绝则覆”,国家就覆灭。管仲还认为,“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矩;有义就不会妄自尊大;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屈从坏人。否则就会恶化官民关系,激化官民矛盾,天下就不稳定。“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管子·形

势》。晏婴则认为“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廉之谓之公正,让之谓之保德。”(《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把廉政作为执政之根本。廉洁乃立人之本,廉政是立国之本,国家兴亡的关键。

二、国家兴盛,实行廉政

国家兴盛就要实行廉政,廉政则要以民为本,国家兴亡在于民心的向背,廉政举措在于注重民心民力民生。周师齐祖姜尚亲自感受到人民群众在改朝换代中的巨大力量和作用。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六韬》)。姜尚认为,执政者要爱惜民力,不要过多征收人民的财物和劳动力,“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其赋役也,甚寡”。还应“存养天下鳏寡孤独,赈赡祸亡之家”,对遇到灾难的人民要给予救济。“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诸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六韬》)。“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三宝完,则国安”,发展社会经济,国家才能安定(《六韬》)。管仲认为,民心向背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中的发挥关键作用。“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要夺取天下,必须先要争取人民的支持。管仲提出“夫霸王之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顺民心为本”“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刘向《说苑》)。管子还强调廉政就要发展社会经济,“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管仲最早提出的这种“以人为本”廉政理念,把廉政更加实际化、具体化,丰富发展了廉政思想内容。晏婴他的廉政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人为本”的爱民主张上。他强调:“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当政



者对于平民不能“夺其财而饥之，劳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严听其狱，痛诛其罪”；应该体察平民的痛苦，“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要“散百官之财，施之民”（《晏子春秋》）。例如，有一年，齐国连续17天大雨，灾情严重。齐景公依然饮酒作乐，晏子多次奏请救灾无效。遂把自家的粮食分给灾民。车马器物放在路旁供人们使用。对景公说：百姓“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而“君不恤”“民氓百姓，不亦薄乎？”然后“请身而去”。逼使景公开仓救济灾民。齐景公出游麦丘，问封人年岁多大？封人答：85岁。景公说，您真长寿啊，请您祝福我吧，封人先祝他健康长寿，有益于国家，景公不满足；再祝他的后代长寿，景公仍不满足，封人便说：“使君无得罪于民。”景公听了不高兴，说，“只有百姓得罪于君主的，哪有君主得罪于百姓的？”晏子说：“君主错了，桀纣不是被百姓诛灭的吗？”晏婴的这些廉政爱民主张和故事，根本之处是看到人民群众在兴亡中的关键作用。

三、长治久安，提倡节俭

把兴亡存废与奢侈节俭联系起来这是齐文化廉政思想的特点之一。姜尚认为，圣贤之君要学习尧舜，勤劳节俭，戒奢侈挥霍，以身作则。指出“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宇不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以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六韬》）。管仲认为，当政者要率先垂范，勤俭节约。“人君之欲无穷”，而“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管子·权修》）。统治者必须考虑实际可能而对自身的欲望有所克制，以俭为道，“俭，其道乎”。（《管子·法法》）《管子·七臣七主》说“明主有六务”，其第一要务就是“节用”，如果君主不节制对老百姓的“求取”等欲望，“则上位危”。（《管子·法法》）君主应当带头节俭，引导人民“从风”。管仲让齐桓公“试勿衣紫”，由此带动“宫中莫衣紫”，并逐步扩展到“国内莫衣紫”，以至于“境内莫衣紫”。刘向《说苑》中载，齐桓公担心国内财用困难而群臣服用太贵。管子说：“君尝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管子·牧民》）。规劝齐桓公要带头换上朴素衣冠，于是，“一年而齐国俭”。这些上行下效以至相互模仿而改变社会风尚的事例，充分说明统治者的典范之于民风的作用。他总结道：“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管子·牧

民》。晏子认为要实行廉政自身应该廉洁节俭。他乘破车上朝，景公送他新车，晏子拒收。景公很不悦：“夫子不受，寡人也不乘。”晏子回答：“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类，以先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也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晏子春秋》）晏子为相多年，始终不置家产。晏子则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主张实行“善政”，减轻赋税。认为，当政者就是“与民为仇”，其结果会导致“民叛”，得罪于民的国君，将遭到“民诛”。奢侈腐化，导致的将是君诛国亡。

四、国家兴盛，公德公正。

国家要兴盛就要倡导社会公德，惩贪奖廉，扬善惩恶，这也是齐文化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姜尚认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公正爱民者，就可以得到升迁，就可以提高增加俸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凡对长辈孝顺对子女慈爱者受尊敬，努力生产者受鼓励，辨别善恶，表扬善行，以法度惩罚恶行。“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对于奖功罚罪必须公正，不能偏私。为君者能做到以上两点，就会“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视其君如父母”（以上均为《六韬》）。管仲则认为政策政令和官员政绩的好坏，要以民心向背这把尺子去衡量，满足人民的合理愿望和诉求，使人民得到快乐、富裕和安定，这是治国理政、天下归心，维护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法宝。晏子则说“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之保德。”廉洁是政事的根本；谦让是重要的美德；……廉洁才能公正无私，谦让才能保持美德”。由此可见，倡导社会公德，惩贪奖廉，扬善惩恶，在国家兴亡中的主要作用。

五、国家长兴，纳言兼听。

要做到国家的长久兴盛，保持廉政的连续性，就要举贤善任，善于纳言。姜尚在《六韬·文韬·大礼》中提出，作为当政者应“勿妄而许，勿逆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六韬》）。在听取意见时，听人之言不可轻率加以允许，也不可马上加以拒绝。轻率允许，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见，马上拒绝就闭塞了臣子以后的进言。他认为，国君要做到明察国情。管子认为“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管子·九守》）。管仲和晏婴



姜太公的廉政思想及其影响

宋玉顺

姜太公是商周之际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他辅周灭商,封齐、建齐,在其政治实践中,政治思想建树颇多,其廉政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入探讨之,对今天的廉政建设,无疑是正能量。

一、姜太公的廉政思想

《六韬·盈虚篇》记载周文王问古代贤君治国的情况,姜太公给予了详尽回答。太公的答辞,即反映了他廉政思想。其内容如下:

其一,倡节俭,禁奢侈

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

其意思是说:尧帝统治天下之时,不用金银珠宝装饰,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稀奇珍贵的物品,不收藏供玩赏的宝器,不听淫佚的音乐……以鹿裘御寒,以布衣遮体,粗粮为饭,野菜为汤,不因为征

调役夫而影响农时,压制欲望、约束行为,从事清静无为。

这段文字的核心内容是倡节俭,禁奢侈。不仅讲尧帝衣、食、住、用等各方面都十分节俭,而且歌颂其克己节欲而利民的高贵品格。

其二,奖励官吏廉洁

“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即用奖赏的手段,鼓励官吏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官吏忠厚正派、克己奉法的,就升迁其爵位;廉洁爱民的,就增加其俸禄。这一激励方针和措施,对于纯正官德、改善政风,有积极促进作用。

其三,尚法贵公,奖罚严明

“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即讲求法律公正,奖罚要出于公心;对于厌恶的人,有功必赏;对喜爱的人,有罪必罚。这对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起积极促进作用。

其四,严以自律,节欲利民

“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都是进谏的专家,他们是通过进谏得到君主赏识而发挥其聪明才智的,所以自然非常注重进谏纳谏与国家兴亡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很多进谏的事例,就足以说明。姜尚认为,当政者要提拔贤才,革除无能。提出识别人才的“知之八征”。“一曰问之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谋,以观其成;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才,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知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六韬》)考核标准即君王“六守”(仁、义、忠、信、勇、谋)将帅“五材”(勇、智、仁、信、忠)。管子提出了选人原则,即“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评选人才,要衡量其才智、能力,考核他的品德,然后重用,这

是君主要遵守的选人原则。管仲认为,“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管子·小问》)晏婴更是把选贤任能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国家有三不祥,国家有人才,国君却不了解;了解了却不使用;使用了不委以重任,都是国家的不祥啊。国家不祥则是危亡之兆。

综合上述,廉政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产生还是从姜尚开始的,齐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注重了与朝代兴亡的密切联系,包括了廉政在国家兴亡的关键作用、爱民、节俭、奖惩、纳言、选才等重要内容。其后经历了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为后人发扬光大。对于当今的反腐倡廉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是说尧帝严以律己,克己利民。自己要求的很少,征收的赋税劳役也很轻薄,所以天下百姓富足安乐,没有饥寒的面容。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民心,百姓爱戴他像景仰日月一样,亲近他像亲近父母一般。

无独有偶,《说苑·政理》载周武王问姜太公“贤君治国若何?”的事,姜太公的答辞:

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后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淫慝,下不阴害;不幸官室以费财,不多观游池以罢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也。其意思是说:贤君治国,其行政的方法比较平稳。官吏不苛刻地征收赋税,节约自己微薄的俸禄,且不因自己的私利而损害公共的法令,奖赏不给无功之人,刑罚不施于无罪之人。不因有人讨好自己,就给予赏赐,不因触怒自己就进行诛杀。凡违背百姓利益的,皆以有罪论处;对于推荐贤良的人,就给予奖赏。后宫不荒淫,拒绝美女拜见,在上头不做邪恶的事情,到民间也不暗地里害人。不建造官室,以免浪费资财,不到处游乐观看台池,以免让百姓停止生产;不在自己住用的房舍雕刻粉饰,以用来愉悦自己的耳目;官府不把资财藏得腐烂了,国家也没有饥民到处流浪。

姜太公这一答周武王问贤君之治国的文字,与前所引述的姜太公答周文王问古代贤君治国的文字,其内容基本相同,二者都强调倡节俭,禁奢侈;执法公正,赏罚严明;尊贤能,去奸佞;官吏廉洁,节欲爱民;薄赋役,利百姓等,这些内容基本上反映了姜太公的廉政思想。

二、姜太公廉政思想的形成及意义

姜太公的廉政思想是在辅周灭商的伟大斗争中,总结古代贤君治国经验而形成、发展的。它对于灭商建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大周王朝的长治久安,也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殷纣王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荒淫奢侈的暴君。他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对贤者的残害,以及他本人的荒淫奢侈,都是无以复加的。《太平御览》曾记载殷纣王残暴奢侈的情况说:殷君喜欢杀人,喜欢用人肉喂老虎,喜欢剖腹挖取人心……小人当道,用阿谀逢迎的人执掌政权;用苛刻的命令欺凌成千上万的百姓。喜好田猎,用毕、戈、走狗捕捉禽兽,喜修池、台、宫室,多达七十三所,最大的宫殿群达百里之

远;喜修酒池,酒糟堆积如山;无功者受奖,无罪反遭诛杀,等等。

姜太公对周武王说:“所谓残(凶残)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钱、彩帛、狗马、谷粟,藏之不休,此谓残也;所谓贼(凶暴)者,收暴虐之吏,杀天下之民,无贵无贼(不分好坏),非以法度,此谓贼也。”(《群书治要》)义正词严地讲明了殷纣王的罪恶,及其征伐之的必要性、正义性。

当周武王灭商途中,见到纣王力量强大而产生畏惧心理时,姜太公说:“王无恐且惧。所谓大者,尽得天下之民;所谓众者,尽得天下之众;所谓强者,尽用天下之力;所谓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子,此之谓天子。今日之事,为天下除残去贼也。周虽细,曾残贼一人之不当乎?”(《群书治要》)姜太公指出:所谓力量大,是指最大限度地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所谓多,是指能得到天下人的支持;所谓强,是指拥有天下的人力物力;所谓安定,是指能深得所有天下人的人心;所谓天子,是指与天下所有的人相亲相爱的关系如同父亲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这才称得上是天子。而当今所进行的事业,是为天下人除掉一个最残酷、最凶险的暴君。周国虽然微细弱小,难道连一个独夫民贼都抵挡不过吗?”

姜太公不愧是高瞻远瞩、智慧过人的政治家,他从殷纣王奢侈腐败,看到了他凶残之极的本质;当他貌似强大之时,已看到他必然灭亡的下场。其理论根据就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文师篇》)殷纣王就是一个擅天下之利的暴君。他的荒淫腐化的生活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的痛苦之上的。《六韬·国务篇》曰:“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官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是说人民无罪而罚,就是杀害;对人民横征暴敛,就是掠夺;滥修官室台榭使民力疲惫,就是增加人民的痛苦;官吏贪污苛敛,就会使人民愤怒。总之,损及广大人民利益的人,必然被广大人民所抛弃。

同时,姜太公又以贤君治国之道,告诫周执政者修德爱民,行廉洁之政,以保证取得民心,进而推翻殷商的反动统治。对于取得政权后的周执政者来说,起到警钟长鸣、稽古鉴今的作用。姜太公说,对民“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乐而无苦,喜而无怒。”(《六韬·国务篇》)这样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具体地讲:“不使人民失去职业,就是给



了人民利益；农时不误，就是促进了百姓耕种；不惩罚无罪之人，就是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少征赋税，就是给了人民实惠；少建官室台榭，就可使人民安居乐业；官吏清廉不盘剥苛敛，就能使人民欢喜。”（《六韬·国务篇》）可见姜太公对廉政的重视，同时也可看出他的廉政思想是和爱民联为一体的。进一步说：其廉政思想是以民本思想为思想基础的。

三、姜太公廉政思想的影响

姜太公不仅是辅周灭商的历史功臣，而且也是齐国的第一代国君。他的廉政思想在齐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看对管仲及《管子》作者的影响：

在节俭禁奢方面，管仲劝齐桓公不要沉于酒乐，要强国爱民。说：“臣闻之，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臣是以敢出也。”（《管子·中匡》）管仲晚年，劝桓公近贤臣，远小人，不要沉于酒乐。管仲病逝，桓公忘掉管仲之言，重用易牙、竖刁、开方等奸佞。以致于死后六十七天没有入殓，九个月没有安葬。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管子·七臣七主》列举了殷纣王奢侈亡国的事例。说：“诛贤忠，近谗贼之士而贵妇人……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圃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材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百姓罢乏……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为周氏之禽。”这段文字，真切地说明《管子》作者和姜太公关于廉政思想的一致性。同时，也是对姜太公辅佐周武王推翻殷纣王残暴统治的肯定。

《管子·权修》曰：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已，不可得也。”说明执政者的奢侈会造成上下间的矛盾，而导致政令不行，以致于危及国家的安全。《管子》把奢侈视为“伤国之道”，是导致政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君毋听观乐玩好，（听之）则败。”“凡观乐者，官室、台池、珠玉、声乐。此皆费财尽力伤国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奸人也。”（《管子·立政九败解》）《管子》作者与姜太公的观点完全一致。

在尚法贵公、法律公正方面，《管子》继承了姜太公的一些观点，而有所发展。《管子·版法解》明确指出：“凡事者操持不可不正……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因之做到，“任法而不任

智，任公而不任私。”（《管子·任法》）“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管子·明法解》）《管子·版法》曰：“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管子·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在赏罚方面，《管子》坚持“明分职而课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管子·明法解》）而且赏罚不计出身、门第、亲疏、远近，做到：“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管子·七法》）《管子》的这些主张比姜太公讲的更加具体深刻。

在修德自律方面，《管子》也继承了姜太公关于执政者严以律己，克己利民的观点。《管子·君臣上》言：“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还主张执政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行法修治先民服也。”（《管子·法法》）

在节欲爱民方面，《管子》提出：“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管子·版法》），“无私者可置以为政”（《管子·牧民》）。《管子》把“废私立公”作为执政者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这无疑是对姜太公“天下为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们还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顺民心的关键是实行德政，对民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薄税、轻赋、宽刑）、匡其急、振其穷。也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政治以利民、安民、恤民。《管子·权修》也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些思想与姜太公的思想一脉相承。

再看，对晏婴和《晏子春秋》作者的影响：

在节俭和禁奢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晏子堪称为楷模。他身为相国，但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十分节俭。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说他“节俭力行重于齐”，并一再辞去景公赐予的封邑、千金、宅第、市租、辂车、乘马等，司马迁敬佩其人格和精神，由衷地表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牵马赶车）所忻慕（向往）焉！”（《史记·管晏列传》）在节俭方面，他和姜太公所赞颂的尧之君有相似之处。

齐景公时，奢侈腐化是齐国政治的主要症结，它不仅使政风污浊，而且给劳动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为此，晏子从齐国大局出发，以不屈不挠的精



神,一次又一次地劝谏齐景公。如《晏子春秋·内谏下第十四》载:景公欲以圣王之居服而致天下诸侯,晏子指出:“今君穷台榭之高,极汗池之深而不止,务于刻镂之巧,文章之观而不厌,则亦与民而仇矣。若臣之虑,恐国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愿致诸侯,不亦难乎!”在晏子的多次劝谏下,景公的奢侈之行有所收敛,朝中政风也有所改观。在禁奢方面,晏子较姜太公更加直接。因为二人所辅佐的对象不同。姜太公所辅佐的周文王、武王是清廉之君,而晏婴所辅佐的齐景公则是一味追求奢侈生活的君主。

在尚法公正、赏罚严明方面,晏子主张:“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子春秋·谏上第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公正执法。“喜乐无羨赏,忿怒无羨刑”(《晏子春秋·问下第八》)“不因喜加赏,不因怒以加罚。”(《晏子春秋·问上第十七》)在赏罚问题上还主张“从邪害民者有罪,进善举过者有赏”(《晏子春秋·问上第十七》),帮助奸邪残害人民者有罪,为国进谏善言、揭发坏人的就奖赏。还提出了“诛不避贵,赏不遗贱”(《晏子春秋·问上》)的观点,即惩罚邪恶,不庇护权贵,庆赏贤能,不遗漏贫贱之士。晏子

的这些观点显然受到姜太公和管子的影响。

在节欲利民方面,晏子主张“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不从欲以劳民。”(《晏子春秋·内问上第一》)“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不以养嗜欲。”(《晏子春秋·内问上第十一》)“所求于下者,不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事。”(《晏子春秋·内问上第十八》)“俭于藉敛,节于货财……百官节适,关市省征,山林陂泽(池塘水泽),不专其利,领民治民,勿使烦乱,知其贫富,勿使冻馁,则民享矣。”(《晏子春秋·内问上第二十六》)以上均说明晏子要求执政者要节欲利民,也即省刑、薄敛、减劳役,这无疑对灾难深重的人民,是有益的。晏子的这些主张,深受姜太公的影响。

姜太公无愧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廉政思想不仅影响了管仲、晏婴及其《管子》《晏子春秋》的作者们,而且在今天仍然闪烁着不灭的思想光辉。认真研究古代优秀廉政文化传统为现实服务的今天,姜太公廉政思想的借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对探求齐文化廉政思想的本源,也有学术研究的意义。■

敬仲镇中小學生祭掃高傒墓

中华高傒文化园办公室 高洪智

自临淄区委区政府及区教育局推进齐文化入驻校园以来,敬仲镇中小學的師生们积极响应

区委区政府号召,在努力完成国家课程之余,高度重视了对齐文化校本课程的教育工作。连续两年来每逢清明之际,校领导都会积极组织師生们来到齐文化教育基地——齐上卿高傒墓陵进行祭扫游园活动。特别提及的是,在习总书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讲话精神的激励与鼓舞下,師生们从根本上对齐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笔者在与師生们的交谈中意识到,广大青少年不单单只是对齐文化知识有兴趣,而且他们也在不同程度的用心钻研齐文化更深层次的知识内涵。■



敬仲镇中心小学傒公墓祭扫活动

齐人独特而深刻的廉政观

姜 健

对于“廉政”，很多人认为，就是公务人员（主要是领导干部）不贪污公款，不收取贿赂，大公无私，一尘不染。通俗点说，就是当领导的，为大家伙做事的，不把大家伙的钱，弄了自己的腰包里；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给自己捞好处。

毫无疑问，上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笔者认为，“不拿大家的钱”，还只是“廉洁”，还不能算是“廉政”。因为，“廉洁”是“廉政”的初步和基础，而远非“廉政”的全部。比起“廉洁”，“廉政”涵盖的范围还要广，内容还要多。也就是说，保持个人廉洁，严格自律，是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是党和人民对公务人员的最起码的要求，但仅仅廉洁，还不能算是“廉政”；仅仅不贪不占、严于律己，还远远达不到“廉政型”优秀领导干部的标准，还不能称得上是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那么，领导干部除了个人廉洁之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廉官、“廉政型”领导呢？笔者最近研究齐国廉政文化，将齐国优秀政治家、齐文化三大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独特而深刻的廉政观念、廉政表述，整理了一下，草成小文，以期对大家有所启迪，有所借鉴和帮助。

一、姜太公说：领导者要把“廉洁”和“爱民”结合起来

在《六韬·武韬·论将》里，姜太公与周武王讨论选拔将帅的问题。姜太公指出，一个将领，如果有十种性格缺陷的某一种，就不能被提拔为主将、主帅，不可出外领兵打仗，即所谓“将之十过”。在“十过”中，姜太公提到“廉洁而不爱人者”不能当主将、主帅，因为其“可侮”，容易被敌人抓住缺点，一举击败。读到此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困惑不解：个人廉洁不是优点吗？怎么到了姜太公这里反而成了缺陷了？个人廉洁不是好人么，好人为什么就不能当主将呢？什么叫“不爱人”呀？

“不爱人，就可侮”到底啥意思呀？总之，姜太公

的此番独特言论，让人很难理解。

细细琢磨，笔者认为：（一）结合具体语境，“爱人”在这里指的是将帅体恤下属、爱护士卒，“不爱人”就是指将帅苛待下属、漠视士卒利益和生命。“廉洁而不爱人”，指的是某些将帅个人很廉洁、不贪钱，但过于苛刻、严酷，不懂得关爱部属疾苦、不知道奖赏激励部属。“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指的是这些将帅因为平时苛待下属，干群关系差，得不到士兵的衷心拥护和真心爱戴，到了战场上，一旦战事不利，士兵们就四散奔逃，没有人来拼死保卫主将主帅。而主将主帅常常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势单力孤，只能束手就擒，遭受敌人的羞辱。（二）姜太公并没有说将帅“廉洁”不好，而是说“廉洁而不爱人”不好。实际上，姜太公在此对将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姜太公看来，作为一名将帅，仅仅自身廉洁、严于律己是不够的，还要将个人廉洁与体恤下属、个人廉洁与爱护士卒结合起来。只有既注重自身廉洁又爱护下属、士卒，只有既严于律己又宽于待人，恩威并施，宽猛相济，才能成为真正的廉将、良将。

应该说，古往今来的良将，大都“廉洁而爱人”，继承了姜太公的这种“爱兵”思想，爱兵如子，身先士卒，因而敌不可侮，百战百胜。与士卒平分口粮的田穰苴、给生病士兵吸吮脓血的吴起、将妻女编入士卒，高唱《与士卒倡》的田单、将皇帝赏赐的钱物全数分给将士、自己却从来不取一文的岳飞、与士兵露宿街头、和士兵一起分享猪头肉的戚继光，直至和士兵一起下山挑粮、扁担上写上“朱德记”的朱总司令，都堪称“廉洁而爱人”的典范。

有没有“廉洁而不爱人”、违背了姜太公爱兵思想的负面例子呢？有啊，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有“万人敌”之称的张飞，就是这方面的反面典型。张飞是“廉洁”的，他对刘备忠心耿耿，对钱财十分淡泊，史书上未见其有贪污、受贿、奢侈、享乐的不良记录，但张飞在“爱人”方面有缺陷，对待同级、士人很宽容、



很耐心(如义释严颜),对待下属却非常严酷苛刻(这点与关羽正好相反,关羽是热爱士卒而轻慢同僚),经常喝醉了酒鞭打士卒。结果,因逼迫下属、打骂下属,被下属范强、张达暗杀,着实令人扼腕痛惜。

总之,“廉洁而爱人”的将帅,往往胜利;“廉洁而不爱人”的将帅,则往往下场悲惨。

军队里如此,政事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领导者“廉洁而爱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廉政爱民”,就能上下团结、政通人和、事业兴旺;一个领导者如果仅仅“廉洁”而不“爱人”“爱民”,则往往仅能自保,事业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很显然,姜太公的廉政观,是独特而深刻的。他告诉我们:当领导的,不仅不能贪公家的钱、收受黑钱、侵吞大家的利益,做到“廉洁”,还要爱民、利民——“爱人”,给下属、群众以实实在在的利益;严格要求自己是正确的,但对下属、群众则不能一严到底、严酷苛刻,而是要严爱结合、尊重呵护、宽容体贴。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廉洁而受人民拥护的好干部,才能成为廉政爱民的楷模。

二、管仲说:领导者,要把“廉洁”和“谦逊温和”结合起来

一个领导者,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是完全正确的;严格要求下属、廉洁做事,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具体实践中,某些领导往往出现偏差。一是某些领导过于“洁身自好”,乃至有“洁癖”,甚至认为“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从而傲气冲天、唯我独尊;二是某些领导在严格要求下属廉洁做事时,仅从个人的良好主观愿望出发,只是“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大家”,在批评教育下属时,不注意区分严重错误、一般错误,不讲究方式方法,不考虑下属的不同个性、不同情况、接受心理,一味的严厉批评、严酷惩罚、无情打击,往往造成“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下属对其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亲和力不足的情况。

对于领导者“廉而傲”“廉而厉”的现象,管仲是不认可的。在《管子·水地》篇中,管仲提出领导者要像美玉学习,应具备九个方面的美德,即所谓“玉之九德”。在“九德”中,管仲特别提到,领导者要像美玉一样,做事应“廉而不刿(guì)”。什么是“廉而不刿”呢?就是指美玉纯洁无瑕,但并不锋利尖锐,划伤别人;而作为领导者呢,也应如美玉一般,自身清正廉洁,但廉而不傲,低调谦逊;廉而不厉,和蔼可亲。应该说,管仲这种领导处世方法,与其后老子道

家思想“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一脉相承,也与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外圆内方”“外柔内刚”的处事原则基本一致。

在“廉而不刿”方面,做得非常好的,古有晏婴、郑板桥,今有周总理。他们都身居高位而严于律己,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夙夜为公、廉洁勤政,堪称道德楷模,而且都不盛气凌人、狂妄自大,皆以亲切温和、平易近人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让每一个人都如沐春风、感动钦佩。在“廉而不刿”方面,做得不太到位的,也有典型,如鲍叔牙、海瑞等。鲍叔牙是极端廉洁的,但为人极度尖刻,爱憎过于分明,因而他的铁哥们管仲临去世时,为国家计、为鲍叔牙个人计,没有向齐桓公推荐他当相国。海瑞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在廉洁自律方面绝对是当时的标杆,但由于其过分严厉、过于清高、过于孤傲,以致人缘不好,常常被孤立,成为同时代人眼中不可理喻的“怪物”。

总之,管仲“廉而不刿”的廉政观,独特而深刻。它启示我们,“廉洁”,是好的,是每一个领导者必须遵循和坚守的。但要将“廉洁”和“谦逊温和”结合起来,做到廉而不傲、廉而不厉。只有这样,才能将“廉政”完整的落到实处,才能既做到个人廉洁,又能使廉洁之风在下属中得到普及,才能得到下属和民众的真心拥护。

三、晏婴说:领导者,要把“廉洁”和“包容变通”结合起来

众所周知,“廉政”一词,最早出现于《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中的《景公问廉政而长久,晏子对以其行水也》一章。很多人在解读此章时,往往只注意了前半部分,认为晏婴提出了“清廉如水”的主张,并认为晏婴是在告诫为官者像清流水那样洁净,清廉自守,正直无私。这样,业绩才会卓著,声名才会永驻人间。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正确的成分,但未能全面的把握、准确的理解晏婴的本意。下面,笔者将原文全部摘录,并翻译出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晏婴到底想说什么:

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鬻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公曰:“廉政而速亡,其行何也?”对曰:“其行石也。坚哉石乎落落,视之则坚,循之则坚,内外皆坚,无以为久,是以速亡也。”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的白话文,意思是:有一次,

简析管晏节俭思想中的道德因素

姚素娟

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个贯穿古今的永恒话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古往今来,从明君贤臣到诗礼之家再到平民百姓,都把崇尚节约作为一种美德来提倡和施行。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节俭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是节俭思想的一个发展高峰,而齐国作为当时的大国、强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其中代表人物管子、晏子的节俭思想无疑是古代节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与研究。管子、晏子的节俭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晏子春秋》这两部著作中,现对这两部著作中体现出的管子、晏子节俭思想中蕴含的道德因素做一简要分析。

一、管子节俭思想中的道德因素

节俭是民众道德意识的组成部分。“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管子·八观》)管子意识到,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来看,节俭与否关系到民众的道德教化。“侈”就是过度浪费不节俭,不节俭是致使民众贫困的原因之一,民众贫困了就会“奸智生”“邪巧作”,人们的道德水平就会下降,就会影响到国家安定。管子对不节俭行为的人又是如何定位的呢?管子的用词非常毒辣。“人君毋听观乐玩好,(听之)则败。”“凡观乐者,宫室、台池、珠玉、声乐。此皆费财尽力伤国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奸人也。”(《管子·立政九败解》)国


齐景公问晏子:“廉洁正直而能长久执政的人,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的?”晏子回答说:“他们的行为就像水一样包容。清清的流水多么美好啊!它浑浊时可以用来刷墙;它清澈时可以用来洗涤他物,所以能长久。”齐景公又问:“有些人廉洁公正,却很快灭亡。他们的行为又是怎样的呢?”晏子回答说:“他们的行为就像石头。磊磊的石头多么坚硬啊!看它表面是坚硬的,抚摸它也是坚硬的,内外都坚硬,而坚硬的东西最容易折断破碎,不能长久,所以很快就灭亡了。”

从上面这个语段的原文和译文,我们可以看出:晏婴的本意,着重点不在赞扬水的“清澈”,而是在赞扬水的“包容、灵活”。在晏婴看来,水不怕石灰弄脏自己,而是包容石灰,与石灰一起融汇成石灰水,来粉刷墙壁;流水更不怕肮脏的东西来使自己变色,而是用自己将他们柔和的一一洗净。所以水长流不息,永远清澈。与此相反的是,晏婴对里面硬邦邦、外面也硬邦邦的石头,并不赞成。认为石头不如水灵活变通,呆板僵硬,很容易被砸碎,不能长久。

实际上,晏婴的答辞,运用对比和比喻,言此即彼,由物及人,旨在告诫齐景公和为官者: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仅仅廉洁正直是不够的,还应该像水一样胸怀博大,包容万物,随机应变,灵活融通,这样才能

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像石头那样,从里到外都坚硬无比,固执僵化,不能很好的处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则往往很快倒台,迅速失败。应该说,晏婴的这番言论,与老子的“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等阐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晏婴“廉如水”的廉政观,独特而深刻。每一个领导者,都能从中悟出充满智慧的为官之道。那就是:要将“廉洁”和“包容变通”结合起来,既要坚持原则、坚守底线,又要在原则的范围内,包容下属和民众的缺点,随机应变,以柔克刚,最终得到下属和民众的真心爱戴。

综上所述,姜太公、管仲、晏婴独特而深刻的廉政观念、廉政表述,加深了我们对廉政内涵的认识,启示我们当代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除了个人廉洁之外,还要热爱人民、关爱下属;还要保持谦虚温和的态度、开阔自己的胸怀、提高灵活变通的能力。总而言之,一个领导者,只有增强综合素质,提高综合能力,不断汲取一切文化精华,不断完善自我,才能成长为一名“廉政型”领导,一名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君痴迷玩乐享受,国家就会败亡;不节俭,用宫室、台池、珠玉与声乐之类来讨好、侍奉君主的,是奸臣。一个“奸”的评价言简意赅!《管子·牧民》对“四维”的重要地位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在明确了“廉”是其中之一后,又进一步解释说:“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民众懂礼义,知廉耻,就不会巧谋欺诈、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道德的事情就不去做,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修“小廉”,知“廉耻”是人们加强道德修养的内容之一。节俭除经济、政治因素外,更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约束、引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使人们自觉地从心理上遵守其各种要求,知礼懂礼,社会才能安定稳固。

二、晏子节俭思想中的道德因素

以俭养德,节俭是贤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俭与德是相互对应的,节俭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德行;与之相对应,有德行的人也是注意非常节俭的。景公问晏子曰:“贤君之治国若何?”晏子对曰:“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在这里,晏子的观点极为鲜明:节俭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贤德的一个重要条件,“养俭”是判断是否是贤君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奢侈失德,俭则能养德。《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齐国庆氏败亡后,景公赐给晏婴邶殿之地,晏婴不受。有人问,富是人人都想要的,你为什么单单不要呢?晏婴回答说:“夫富如帛布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便无黜嫚,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晏婴认为,凡布帛都有其宽度,故求利也应有限度,唯俭是从,不能过多的贪求,否则就要违背道德。《晏子春秋》内外篇中,也有多处体现同样的思想。晏子深知,作为官员,对于财富的取舍,心中要有“度”,坚守道德底线,不过于贪求财物,不然就会违背道德。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晏婴一再辞去景公赏赐的封邑、千金、狐裘、宅第、市税、车马及美女,生活节俭,静心做官,“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成就一世英名。

节俭是君子的准则,是否节俭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在晏子心中,什么样的人才是君子呢?一次,叔向问晏子曰:“嗇吝爱之于行何如?”晏子对曰:“嗇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谓也?”晏子曰:“称财多寡而节用之,富无金藏,贫不假

贷,谓之嗇;积多不能分人,而厚自养,谓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养,谓之爱。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晏子春秋·问下二三》)意思是说,叔向问晏子,嗇、吝、爱,对于修养自身品性怎么样,晏子回答说,对于自身的钱财要先衡量一下多少,节俭的使用,富裕了就把钱财分给贫困的人,不保藏金钱;贫困了就节衣缩食,不向人借贷,这叫做嗇。聚积了很多,不能分给贫困之人却优厚的供养自己,这叫做吝。钱财不能分给贫困之人,又舍不得供养自己,这叫做爱。所以说嗇是君子的准则,吝和爱是小人的品行。节俭财产,接济穷苦百姓是君子的人品。财富与道德的关系,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答案。2000多年晏子对这一命题给出了我们这样的答案:节俭是君子的美德,吝嗇是小人的恶德。衡量一个人财物的多寡,不是看这个人的穿戴是否华丽,也不是看这个人的出手是否阔绰,而是看这个人是否有计划地使用自己的钱物,时刻念及百姓之疾苦,国家之兴盛。基于这样的认识,晏子多次拒绝景公的赏赐,坚守生活节俭是君子的做派,以君子的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一生住近市之地,居“湫隘嚣尘”之宅,“食不重肉,妾不衣帛”“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苔菜耳矣”,即吃糙米饭、烤鸟肉、大粒盐和苦菜。维持最简单的衣食住行,而不追求奢侈享受,将自己的财物,时时救助穷苦百姓。

三、树立正确的节俭观

在传统观念中,节俭与消费是对立的。在社会财富一定的情况下,节俭与消费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用于消费的多了,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就会相应减少,因此,勤俭持家,减少浪费,增加储蓄是家庭以及国家积累财富最常用的方式。千百年来,人们信奉“大富由天,小富由俭”的致富信条,崇尚节俭,在“温良恭俭让”的传统道德规范中,“俭”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道德要求之一,是人们崇尚的一种美德、一种思想境界。

那么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怎样才算节俭?节俭的标准又是什么?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节俭应该包含三层含义:“1、等于或接近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2、与个人收入、财力相适应;3、在资源的社会供给量为既定的条件下不过多的占用或消耗该种资源。”现代节俭应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调解个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要满足人的正当、合理的消费要求;另一方



面,又要求避免享乐主义习气。建立一种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节俭与消费观,这种消费伦理既有利于社会理性秩序的维护和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又有利于消费的激发和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利于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其核心理念就是适度、科学、健康、文明。

晏子与管子都是齐国的相国,是国家重要官员,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是相同的,也注定了他们不论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都是站在维护、巩固自身统治地位来说的,不论是管子的“四维”之说还是晏子的“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概莫能外。但他们将节俭的个体性行为、经济含义进一

步发展到政治层面,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是我们今天需要重视以及借鉴的。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对节俭也是非常重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现行第一章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将节俭思想渗入到法律条文之中,200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勤俭自强”作为大力倡导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目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反腐倡廉,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实现中国梦,营造着一片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科技考古与手工业考古:齐故城冶铸考古多学科合作研究中期讨论会”在京举行

黄娟 王晓莲

为了更好地推进手工业考古的深入开展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一步强化考古研究中的多学科合作,探索科技考古与手工业考古有机结合的方法与路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项目组和科技考古中心联合召开的“科技考古与手工业考古: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多学科合作研究中期讨论会”于2014年5月10日在北京举行。承担齐故城冶铸考古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及特邀的科技考古专家,来自北京、山东、河南等地的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的师生,以及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等计80余人参加了会议。讨论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致辞。齐故城冶铸考古项目负责人白云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研究员共同主持了讨论会。

齐故城冶铸考古是2011年启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之一,其学术目标在于,通过山东省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深化东周秦汉时期青铜冶铸业

和铁器工业研究,推进手工业考古的学科建设,进一步完善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该项目实施以来,始终坚持立足于田野考古、强化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技术路线和做法,取得了重要收获和进展。

该项目的多学科合作研究,无论其规模还是其深度,在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尤其是手工业考古领域都可谓空前。讨论会上,首先由田野考古发掘负责人简要汇报了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址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及主要收获,然后有16位科技考古学者分别就齐故城冶铸考古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各个方面的进展情况做学术报告并进行讨论,内容包括植物、动物、人骨、年代测定、食性分析、纺织品检测、化学分析、物质结构分析、微痕分析和三维建模等十多个领域,涉及到钱币铸造、铜镜铸造、冶铁和制铁手工业技术和生产的若干基本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对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对各个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大家认为,这次中期讨论会的召开,将直接推动齐故城冶铸考古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做法,将成为我国科技考古与手工业考古有机结合的一个成功范例,对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高恒昌

年初,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时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五四青年节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为我们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营养,与时俱进,要有继承和创新。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的背景、内容及重大意义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也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最根本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发生了变化,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的入侵,国外的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入,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导致部分人们不同程度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统一的基本价值观和价值标准,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党的十七大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思想根基。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深入开展,十八大报告又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要求。当前,我们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阶段,也是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只有大力提倡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才能真正在全社会形成巨大的价值共识和思想共鸣,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内容与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佛教、法家,以及后来发展的农家、兵家,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诗词、琴棋书画等等都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孕育了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热爱和平,追求和谐。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和谐问题很早就受到众多先哲的关注,成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要义。比如,“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道家讲“知和曰常”,墨家提倡“非攻”“兼爱”,法家主张制定和实施法律以维护社会稳定等。这些思想虽然带有历史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精神。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固然要发挥今天人们的聪明才智,但也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其中,传统文化中有关爱好和平、社会和谐的思想,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内部、外部发展环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二)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我们知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他们相继灭亡或被灭亡,文明有中断,只有中国在人类文化史上一直保存着文化的延续。我们国家自南北朝至清代,虽经过好几次外族入侵,中华民族虽饱受创伤和灾难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关键在文化的统一,思想、文字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精忠报国、舍生取义,强调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强调与人为善、诚信待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做人、孝敬父母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永远是第一位。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社会力量、协调利益矛盾的重要作用。

(三)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对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的文明成果,不仅保存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文物古迹、典章制度中,而且渗透到我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在中国绵延相传两千余年,甚至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具有强大的兼容性、柔韧度和渗透力。儒家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其他形态如诗词、戏曲、小说、音乐、绘画、建筑、民俗甚至日常语言的渗透和影响无处不在。一些道德规范、名言警句,在群众中脍炙人口、深入人心。这是我们发挥传统文

化积极作用的良好群众基础。今天,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优秀传统文化对人们修身立德、积极进取、扬善抑恶、提高素养,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一样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固定的根本,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风骨、胸怀,以及健康的道德准则和积极的人生信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思想道德营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上,使之根深叶茂,茁壮成长。

(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中汲取养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从古至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在这里,我只从个人层面价值观来举例说明。爱国的典型有“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岳飞,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敬业的典型有“为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诚信的典型有“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季布,有“为讲诚信,不惜杀猪”的曾子;友善的典型当数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还有“七下西洋,传播文明”的郑和,“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康熙时期的张英。当然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于谦,“执法如山,刚直不阿”的包拯、海瑞等等。

淄博作为齐国故都,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文化底蕴比较深厚。新时期,淄博儿女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齐鲁大地涌现了一批新时代的



楷模。“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孔繁森，“环保卫士”孟祥民，“时代楷模”朱彦夫等等。他们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要有继承和创新。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继承才能创新发展。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充分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是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最具时代精神、最具民族特色、最具文化品质的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时代的拓展，所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以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为根基，与时俱进，增添文化内涵，实现文化关照，努力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可否认，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是做的尽善尽美。“文化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内的大批领导干部、文化大师、学者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学校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在一个时期内“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更谈不上传统文化的传承。改革开放后，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成为重要的信息工具，迫使中国传统文化本源性的要素逐渐流失，西方的没落价值观及享乐主义思想在网络上蔓延，冲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传

统美德的传承亟待加强。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世界大发展大变革的角度，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尽快形成与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淄博市作为文化大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与传承。率先在中小学中开展“学国学、诵经典”活动，开展“公民基本道德行为四十则”“淄博市民公德100则”等宣传活动，大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感动淄博”年度人物等先进典型的评选表彰活动等等，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

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行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一是应该多学习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从中汲取营养，弘扬其精神。二是加强道德修养。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是修身养德。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三要明辨是非。面对世界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面对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四要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从身边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把“三个倡导”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增强自觉奉行和日常践行的能力，努力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㉔

(作者单位：淄博市社科联)

(上接第36页)邑位于今青州市、临朐县和昌乐县的结合部，处在东西两丹河的上游，也就是西汉初始建的朱虚县。朱虚所以立名，前人说“虚”即是“墟”。故址也。此处是帝尧长子丹朱游览之所，所以县与丹河都以之得名。此说未免太荒谬。齐东方音，“莒”和“朱”读法相同，朱虚者，莒虚也，我看此释有些道理。

汉刘邦称帝，封非婚生子刘肥为齐王，封刘肥次子刘章为朱虚侯。刘章有勇力，有胆略，没有去朱虚

就封，而是留在汉宫随侍刘邦夫妇，很受吕后赏赞，把胞侄吕禄的女儿嫁之为妻。吕后和汉惠帝相继去世，吕氏家族阴谋作乱夺权，刘章从妻子处得知这些暗谋，告知丞相周勃和陈平，粉碎了谋叛活动，迎接代王刘恒入承大统，是为汉文帝。刘恒为酬答刘章拥戴之功，在莒国故地新建了城阳王国，封刘章为城阳王。国名由莒邑别名引来，封国与原封邑的名字又叠合，后人没有细考，这才阴差阳错将处于沭河宽广河谷的莒都，当成了“守险全国”的莒邑，并且沿袭了下来。 ㉕

敢与秦始皇廷辩的临淄大儒

王景甫

浮丘伯

浮丘伯像



刘向《说苑·至公》记载：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千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簏。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暗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秦始皇召群臣提问说：“古时候五帝以禅让礼贤传位，而夏商周三王以世继方式传位，我将采取哪一种传位方式更好呢？”博士70人一时没人答得上来。这时鲍白令之站出来说：“以天下为公，则用禅

让方式；以天下为自家，则用世继的方式。故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听了感觉鲍白令之的话暗合圣意，故意仰天而叹：“我要效法五帝用禅让方式，谁可出来继承我的位置呢？”目的是希望各位儒生能顺他的话意，继续恭维他。不料，鲍白令之大声地说：“陛下行夏桀、商纣之道，是不可能做到禅让的。”秦始皇听了大怒：“令之，你到前面来，你为何要说我行夏桀、商纣之道？快快自圆其说，说不上来你就得死。”鲍白令之慨然而对：“陛下筑台高入云霄，宫殿五里，建造重达千石的大钟，竖立重达万石的钟架。宫中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的骊山宫室一直到雍地，相继不绝。所有这一切殫竭天下民力，都是为自己享乐，而不顾天下苍生。陛下所谓天下只是一人之天下，怎么可与五帝比德行，用禅让方式呢？”一番话，从秦始皇的生活享受直说到坟墓建筑，逻辑严密，激昂慷慨。从来没人敢如此顶撞秦始皇，此时廷上一片死寂，没人敢再发一言。过了很久，秦始皇才回过神来，喃喃地说：“令之的话，令我当众出丑了。”于是传位的事就不再提起，也没有立太子，使秦始皇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惟一既没设立皇后又没设立太子的皇帝。可见，鲍白令之的这次廷辩对秦始皇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经史大师蒙文通(1894—1968)考证，文中这位令秦始皇当众出丑的鲍白令之“应是鲍丘之误，即《盐铁论》之包丘子，《史记》之浮丘伯”。

浮丘，复姓，亦作包丘、苞丘、鲍丘。浮丘伯(约前270—前170)，齐国临淄人。他家是当时临淄著名的富翁。少时聪明伶俐的他，变着法地游玩嬉戏、挥霍资财，几乎导致家产败尽。家长为了使他的聪明天赋用到正处，决定选位名师对他加以调教。最后选中了各家学派公认的学问最大、名望最高的学者、一连三届被推举为齐国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

当时，已是暮年的荀子早已离开了齐国，在楚国的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从事教学和著述。浮丘伯到兰陵投奔荀子之时，正遇李斯和韩非相继



离荀子而去。浮丘伯的到来,正好填补了老夫子心中的空缺。荀子对这位天性聪颖、悟性极佳的少年甚是爱惜,把他当作关门弟子,倾其所学,竭尽心血,全力调教。生性好学的浮丘伯,对老师的满腹才学产生了极大的求知欲,决心成为像老师一样的大学问家。

在荀子门下的六年熏陶,性情大变的浮丘伯也要辞别老师去闯天下了。临别时,荀子给浮丘伯写了封推荐信,希望他投奔他的学长李斯或韩非。但浮丘伯相信自己的才能不在当今任何人之下,不想借别人的羽翼来庇护自己。他藏起荀子的荐书,来到赵国。而赵王却信不过这位口若悬河的毛头小伙,竟不用他。在邯郸盘留期间,浮丘伯遇见了嬴政母亲赵姬的侍女姚氏,得知她的来历后,浮丘伯便携姚氏去游说嬴政的弟弟成峤,介入了嬴政身世之谜的皇室血脉纠纷之中。结果成峤无法对抗强势的嬴政,造反不成反被嬴政镇压。这两次受挫,让浮丘伯明白:自己的满腹经纶需要讲学授徒得以传播,自己人生价值要体现在天下文人的口碑中。于是,浮丘伯开始了潜心研究经学,收徒讲学的教师生涯。

秦统一后,浮丘伯的讲学已经名传四海,成为朝廷智囊“博士院”中最杰出的博士。当时比较杰出的儒生、方士还有淳于越、韩佟、安期生、徐福、卢敖等70人。秦始皇经常拿一些古怪的题目考这些博士,有时也召集他们参加廷议。

浮丘伯得家乡齐文化的熏陶、受恩师稷下学宫“祭酒”荀子的影响,对秦始皇的暴政和“家天下”思想十分反感。这次借廷议之机,奋稷下先生之余威,张“天下为公”之宏旨,与秦始皇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激烈交锋。

儒生们见秦始皇没有对在廷论中大放厥词的浮丘伯怎么样,话语开始渐渐放肆,一些儒生竟然背后议论秦始皇,引发了秦始皇对儒生的厌恶情绪。最终因齐人淳于越反对实行郡县制的驳辩,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浮丘伯避祸离开咸阳后,隐匿到了曲阜乡下,安贫乐道,一心从事学术研究和儒经传授。继而,在鲁南一带开始收徒传经,各地学子慕名纷纷前来求学。刘邦战胜了项羽后,举兵围鲁城(曲阜),浮丘伯和众儒生无视兵临城下,照常讲习礼乐,鲁城中弦歌之声不绝,全城百姓从容不迫。刘邦见此大为感叹,不忍再动干戈,于是对鲁城采取招降措施,才使鲁地

归汉。后来,刘邦再次路过曲阜,浮丘伯曾率弟子前往鲁之南宫拜见刘邦。

西汉建立后,浮丘伯居住曲阜12年后,迁居西汉首都长安,继续从事讲学事业。他把儒家经典在授学中重新阐述了一番。汉代儒学中的“鲁学”学派,就是浮丘伯弟子所兴起的一个学派,从而开创汉代新儒学,至汉武帝时形成影响整个封建社会的“独尊儒术”的局面。

浮丘伯的诸多弟子中,对新儒学贡献最大的是申培和刘交。

申培,《史记·儒林列传》称“申培公”,鲁(今山东曲阜一带)人。西汉经学大师、今文诗学“鲁诗学”的开创者,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有重要贡献。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敢于在民间秘密讲授《诗》《书》的就是浮丘伯。申培便是浮丘伯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西汉初年,儒家“五经”渐次出现,而《诗》出现最早、影响最大。

汉初,汉高帝刘邦过鲁祭孔,申培以弟子的身份随同他的老师浮丘伯接受了刘邦的召见。刘邦要求浮丘伯到长安教授儒学,于是申培随其老师浮丘伯来到长安。直至刘邦死后、吕太后掌权时,申培才拜别浮丘伯,离开长安。先做楚王太子戊的师傅。因刘戊不好学,颇以申公教授为苦。及刘戊继位,即罚申公劳役,形同奴隶。申公以此为耻,回到故乡,教授《诗经》,非弟子门人,拒绝接待宾客。当时从远方前来受业者1000余人。汉武帝时,其弟子王臧任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奏请迎其师申公。武帝乃招授80余岁的申培为太中大夫,议明堂事。申培的弟子中有十数人为博士。流传于鲁地的申公诗学称“鲁诗”,而当时流传于齐地的诗学则称“齐诗”,“齐诗学”的开创者为轅固(临淄人)。汉代诗学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对于《诗经》这一重要文化典籍的保存、流传,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交(? ~前179),字游,汉高帝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弟。是刘邦3个兄弟中最优秀的一个,也是刘氏4兄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史称刘交年轻时即好读书,为人多才多艺,有大志。曾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一起到浮丘伯门下学习《诗经》。刘邦在丰沛起义后,刘交跟随刘邦打天下,成为了刘邦的得力助手和亲信,深得刘邦的信任和宠爱。入关后刘交受封文信君,随刘邦转战各地,为汉家天下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汉朝的缔造者之一。西汉建立



后,刘邦分封刘交为楚王。楚王刘交是西汉宗室中文武双全的藩王。他到彭城做藩王后,息武兴文,将原来的同学穆生、白生和申公都请到楚国任中大夫。又派自己的儿子刘郢客到长安向昔日老师浮丘伯学习《诗经》,自己和儿子们都在楚国读《诗经》和先秦典籍。刘交还曾为《诗经》作传注,号称《元王诗》,成为当时《诗经》学中的一个派别。刘交的次子刘郢客因学有所成,被汉文帝任命为宗正,管理刘氏宗室事务。在刘交的倡导之下,楚国成为当时中国的《诗》学研究中心和学术空气最浓厚的地区之一。刘交在位23年,死后被尊谥为楚元王。

刘邦死后,浮丘伯再次对吕后的专权反感而失望,毅然离开了长安,转而学习钓鱼技术,追求道的境界。先后在河南嵩山、山东鲁南、安徽巢湖、黄山等地修炼,最后来到了景宁鹤溪。修筑钓台,沐鹤饮酒,与土著山民传些中

原的农耕技术,说些战国时期及朝廷中有趣的故事,过起了天高皇帝远的隐居生活。

浮丘伯爱鹤养鹤,也自比于鹤。他揣摩鹤的习性,写成著名的《相鹤经》。后世人喜欢把浮丘伯当作神仙来崇尚,历史上不少故事传说,干脆将浮丘伯说成是驾鹤修道的仙人。尽管如此,也不会动摇他“秦末汉初新儒学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焚书坑儒”以后,浮丘伯始终以宣教儒家经典为己任,在文化荒漠中播种新绿而不辞艰辛,被研究者誉为新儒家的创始者、旧儒学向新儒学发展历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敢于在廷堂之上直面君主,坦陈己见,甚至与君主争辩,是齐国稷下先生的学术品质,在尊崇“君君、臣臣”的儒教中,是不允许如此作为的。由此可以想见,浮丘伯在汉初宣教的新儒学中不乏齐文化因素。 田

田完——田氏齐国缔造者

孙长征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追封前代圣王后人——舜的后裔妫满(为帝舜之子商均的第32代孙)为陈侯,史称胡公满、陈胡公。传到八世孙陈桓公陈鲍时逢病重时,桓公的弟弟陈佗联络舅舅家族蔡国,借用外来力量把陈桓公以及太子免杀掉自立为陈废公,即位以后,娶蔡国之女为妻。这个蔡女因和蔡国人通奸,常常找理由回蔡国去,陈废公也经常陪同前去蔡国,陈桓公的儿子陈跃怨恨叔叔陈废公杀死了他的父兄,就买通蔡国人诱骗陈废公前往蔡国淫乱并设计把他杀了。然后陈跃自立为国君,这就是陈厉公。在登上君位的第二年,陈完呱呱坠地,恰逢周太史周游至此,陈厉公便请他给陈完卜卦。西周、春秋时太史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仅位于三公之下,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诸多国家大事。这个太史卜得的卦是《观卦》变为《否卦》,太史说:《观》卦的卦象是:风在上、地在下。观国之光,即观览国之盛德光辉。预示陈完具有超强的能量,足以光大一个国家的运气!用宾于王,他将来会成为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利于作为君王的宾客,或者是王

(天子)身边的重要人物。但是,不在本国,而是在外国;也不在他这一辈子,而是在他的子孙后代。因为大风刮起后,最终还是要落在土上,即使刮出了国境,还是要落在外国的土地上,“风行而著于土”,所以最终的应验,将会是在外国。《观》卦巽在上坤在下。巽为大风,主东南,巽风向东南方刮起后,最终落在了“坤”土上。坤属土。而齐国姓姜,正是四岳的后人,岳即是山即是土。所以应该到齐国才可以使本国光大。因为曾经算过这样一次占卜,所以后

枣庄薛城田家湾田完祠





来当陈完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到齐国也有着占卜留下的预示。

陈完五岁的时候,爹去世。他的叔叔林即位为陈庄公,后则是最小的叔叔杵臼即位,称陈宣公,在兄终弟及这样的情形下,原本可以是太子的陈完只好把太子这个地位拱手相送给他的堂兄弟御寇,也就是陈宣公的大儿子。好在堂兄弟之间自小一起玩耍,兄弟间的感情甚好,江山毕竟还在自己家里,况且御寇对自己尊重有加,故而两人在成长交往过程中颇为默契,在这一点上,足以说明陈完是个有智慧的人,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待到陈完而立之年时,陈宣公宠爱的妃子开始吹枕边风,要陈宣公立自己生的儿子款为太子,一时间宫廷内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身为太子的御寇开始不停的联络公子大臣,以期在日益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得到立足之地。陈宣公也觉察到了太子御寇在经营自己的政治势力,在陈宣公二十一年(前672),以谋反(或涉嫌谋反)的罪名处死了太子御寇。陈完很不幸的被卷入这场政治角力,深知这个罪名相当大,于是连夜同另一位公子颀孙逃出陈国。

时逢当时齐国齐桓公当政,启用管仲为相,政治上相对清明,并且能够从其他渠道选拔贤能之士,陈完便同颀孙商议后跑到齐国。在当时诸侯国不断联姻的前提下,因为有可能流亡的政治犯就是下一任的君主(如齐桓公),所以当时这样的贵族血脉流亡到其他诸侯国是会受到很好的接待,况且陈完是陈国有名的大贵族,还是个贤者,在当时社会上也是很有名望的人,这样的人物齐桓公自然以贵宾待遇接待,并且许诺给予卿的官职。陈完颇有自知之明,婉言谢绝,《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记载陈完推辞之语,辞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簪,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说这话是有着极大智慧的,本身



厚德載物 徐成 篆刻

是来寻求政治避难的,在齐国本土的那些家族有着深厚的基础,才可以成为“卿”,如果自己冒冒失失的答应下来,以后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陈完认准

的是当时齐国强大的实力作为自己的庇护,当时的陈国不过是齐国的尾随者,作为从属国的陈国,自然不会对齐国庇护的人有所异议,但如果自己做的过于出头,那么有可能就失去齐桓公这棵大树,到时就得不偿失没有了立足之地。在这样的前提下,陈完力推,这么高的官职,我实在是做不来的,最后做了齐国的“工正”一职,管理百工。

人生无常啊!生下来时是陈国的太子,遇到宫变后,就不能为国君了,只能当个大夫,当大夫时再次遇到宫变,转眼间就变成了政治犯,逃难到齐国混了一个小官。这样的滋味自然不好受,但又有什么办法来改变呢?唯有做好本职工作,得到齐桓公的信任才可以,故而陈完在担任“工正”期间,不仅帮助齐国完成了“工盖天下”“器盖天下”的争霸目标,还组织人编定了《考工记》一书。在这样的前提下,自然受到齐桓公的另眼相看。说有一次,齐桓公到他家里去,陈完摆酒招待,桓公喝高兴了,天黑了的时候,桓公还不走,让点上灯,继续喝。陈完婉言劝止,说道:“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意思就是,我只准备白天陪您玩,没打算夜晚还玩,这样没日没夜的玩,不是好事,恕我不敢久留!齐桓公曰:“有礼哉!”赞叹而去,称他为贤人,让他采食于田。这也是成语“卜昼卜夜”的由来。过去天子分国,诸侯分家,各个家族都有赖以生存的封地,所谓采邑。由于陈完出色的工作和绝佳的人品,齐桓公就划了一些齐国的良田赐给陈完,陈完一则为了隐姓避难,二则为了表示对齐桓公赐封田庄的感激,三则当时陈、田二字的读音差不多,故以田为姓,改陈完为田完。也就从此脱离了原来的陈国,另立了门户,成为后来田氏一族的祖先。

田完声名鹊起以后,有个叫懿仲的人,就想把女儿嫁给他,就去找人占卜一下吉凶如何,找的什么人呢?《史记》上没说,《左传》上说是他老婆亲自占算的,断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这一卦,是个大吉之卦。这叫做:凤凰飞翔,和谐的鸣声锵锵。有妣氏的后代,将在姜氏齐国这里养育成长。五代之后,就要昌盛,和正卿的地位一样。八代之后,地位之高,就没人能够比得上。既然他这么好的命,那就快快把女儿嫁给她吧,于是田完就做了懿老二的女婿,生子田稚,其五世孙田无宇掌握了齐国政权,八世孙田常则独揽了齐国大权,自此展开了“田氏代齐”的序幕。 ㊦

佛学大师善导生平事迹

许道田 杨文山

善导大师驻香港族人朱先生,根据朱台镇朱台庄(原名朱太保庄)来寻根问祖。据朱台庄《朱氏家谱》载:始祖怀友,系山东琅琊人,于明洪武年间,因避乱迁入临淄朱太保庄。当时尚有金、于、李三姓,而始祖以客居,后金、于、李三姓衰,朱氏繁衍旺盛。依据朱太保庄之北,有一高台,后改为朱台庄。根据善导族人反映,他们的祖先是临淄人,在唐朝曾官封“太保”(古代官职名。西周始置,监护与辅弼国君之官。清代为正一品——(文官)太师、太傅、太保、大学士。),在朝为官,家为朱太保庄,庄北有一高台(现封土无存),庄西有一无名塚(现封土完好)。此两项是否与善导朱氏家族住处有关,有待细考。但现在朱台镇朱台庄朱姓与善导朱姓不是一支。通过朱先生介绍,对善导的生平事迹有了进一步了解。

善导大师(613-681)是唐代盛弘净土教的一代宗师,今山东临淄人。俗姓朱,十岁时即跟从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的明胜法师出家,归心向佛。初时学习三论宗经典,亦常读诵《法华》《维摩》诸经。经过数年静心修学后,佛学修养逐渐提升。然而,慧根深厚的善导大师并不自满,常自思维:佛教法门甚为广大,教藏经典其数无量,若不契机,功即徒费。应当择一法门,一生潜心修学。之后依止妙开律师受具足戒,偶入藏经楼中,于藏经前默祷祈愿佛力加被,指导所向。便即常依是经潜修十六观门,恒谛思维西方胜境。数载之后,观想功夫已臻深妙之境,常于定中备观极乐世界的楼阁、金台、宝池等境,如现目前,于是更加坚定了修学净土法门的信愿。

善导大师非常敬仰东晋慧远大师的芳踪。曾往庐山瞻礼遗范,之后更周游各地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大德。唐贞观十五年(641)大师廿九岁,闻说道绰大师在西河(今山西省境内)广弘净土法门,开闡净土地道场。即不远千里赶赴并州(今山西太原)石壁山玄中寺,请教修学净土的要领。道绰大师见其诚意可嘉,便授之以《观无量寿经》的深奥义理,并令其亲观净土九品道场。大师因此增益信愿,欢喜地说:“此真入佛之津要,修余行业于表僻难成,唯此法门速超生死。”此后更加精勤苦修,昼夜不断地礼拜读诵净

土经典。唐贞观十九年(645)道绰大师圆寂后,善导大师即转赴长安,在光明、慈恩等寺盛弘净土法门,激发四众同修念佛求生西方。自修则“每入室长跪念佛,非力竭不休”;度人则“每逢人即演说净土法门。”30年如一日。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勉已励人,专弘念佛法门,普度众生共入弥陀愿海,遂成当时弘传净土法门的著名大师。

有关善导大师示寂的记载,与多部史籍中存有多种说法。据《佛祖统纪·乐邦文类》记述:“(善导)忽一日谓人曰:‘此身可厌,吾将西归’乃登寺前柳树向西祝曰:‘愿佛接我,菩萨助我,令我不失正念,不存恐惧,得生安养。’言以投身而逝”。另据元代优昙普度所著《莲宗宝鉴》卷四云:“善导乃登所居寺前柳树西向愿曰……,愿毕于其树上端身立化”。又据《临淄区志》记载:“681年(唐开耀元年),69岁的善导在恍惚中攀上寺中柳树,结果失手摔跌而逝。”从这些资料来看,大师的示寂,显然存有异说,并且颇有出入。然而从中皆可明见大师自知时至,预期往生的同一迹象。由此可见大师修持净土法门的功夫,的确非同寻常,难以思议。而且往生之后“身体柔软,容光如常,异香音乐,久而方歇”,此正是决定往生的瑞迹。大师失寂后,其弟子怀恠、怀感等,于706年(唐神龙二年)将大师的遗骸埋葬在长安终南山麓神禾原,立灵塔名崇灵塔,并于塔旁建寺名香积寺,作为永志之所。唐高宗以师念佛口出光明,神异无比,故赐额为“光明寺”,后世学人也因而称师为



善导大师

“光明和尚”。

大师处世为人师表，上受帝王之尊崇，下为世人所敬仰。据《佛祖统纪·卷廿六·净土立教志》记言：宋代时宗晓，择取宋前不同年代修持得力，盛弘净土法门的高僧大德共7人，立为莲宗七祖，将大师列于庐山慧远大师之次，列为莲宗二祖。而净土教法传到日本后，日本净宗更尊称大师为“高祖”“宗家”等。并有奉阿弥陀佛为初祖，善导为二祖，法然上人（日僧）为三祖的说法，诚乃推崇之至。然若了知善导大师之生平事迹者，皆谓名至实归。大师在长安弘化的那些年，被他影响教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据《往生传》里面讲：“士女奉者，其数无量。”信奉他的人，男男女女，“其数无量”，度化的人已经没有办法计算了。在另一部《往生西方略传》中，则有记载说：“三年之后，长安城中就已经被念佛的人给充满了。”大家要晓得，我们大唐王朝的这个都城长安（现在的西安），那绝对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就是形容长安的。中国佛协与日本净土宗，曾召集两国佛教徒及学者于1998年5月，在长安香积寺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法会，以纪念



善导督造的奉先寺佛像

善导大师生西1300周年。

善导大师的一生，以净土为归宿，苦心研学净土经教，自行化他恒以净业居先。严格地以戒律威仪规范自身，从不毁犯纤毫。不曾刻意地去驰求世俗的名闻利养，纵有信施馈赠财物等，也都将上好的供奉大众，自己则惟遗粗劣以自支身。虽然如此，大师每受供养之时，仍存不安之情，常自责曰：“释迦世尊尚乃分卫（即托钵乞食），大师何人，敢端居而索供养乎？”是以平日常乐出外乞食。三衣瓶钵，随身携带，

从不使人持洗。除洗浴外，不脱三衣。戒行严谨，深得四众钦敬。大师毕生热衷于弘法兴教的事业，每见闻有坏寺废塔未曾兴复，即不遗余力地倾囊相助，兴寺弘教，燃灯续明。而大师更擅长建寺造像的艺术，在西京实际寺时，曾奉诏督造过洛阳龙门的大卢遮那佛像，以及于佛像之南兴建的奉先寺。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雕，此窟建开凿于唐高宗初，咸亨三年（672年）皇后武则天赞助脂粉钱两万贯，上元二年（675年）功毕，长宽各30余米，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此外，大师也擅长书画，曾将信施供养的净资，书写《阿弥陀经》十余万卷，及画《净土变相》三百余壁，普为流通，藉以广弘净土法门。善导大师是一位修持净土法门的大成就者，这也是他在长安地界广弘净土法门，获得极大功绩的主要原因。从西安碑林中保存的《大唐实际寺故寺主怀恠奉敕赠隆闡大法师碑铭》中有“时有亲证三昧大德善导阿闍黎”的语句可以证实这一点。大师修持净业异常精进。“每入室则长跪念佛，非力竭不休。虽时寒冷亦须流汗”。如此地勇猛用功，日积月累自然道力非凡。曾于大众前演示，“口念一声佛号，便有一道光明从口出，十声乃至百千声光亦如是”的神异瑞相，来激励大众虔心念佛，精进办道必当托化莲池，得生安养。大师在长安弘教期间“道俗从其化者甚众”。《往生传》说：“士女奉者，其数无量”。《往生西方略传》记述：“三年后，长安城中已被念佛者所充满”。其弟子中有诵《阿弥陀经》十万卷乃至五十万卷者，有日课念佛万声乃至十万声者。其间现生得念佛三昧者不可记数，临终现瑞相得生净土者不可称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可以想见当时大师弘传净土念佛法门的绝佳成绩，可谓盛况空前矣。

在大师众多弟子中，怀感、怀恠二者最为著名。怀感是长安千福寺的沙门，因为专学法相，且博经通论，起初不信念佛往生净土之说。后受大师的启迪与引导，遂深信净土法门，并且精诚地念佛用功，3年后即得念佛三昧，撰有《释净土群疑论》7卷，用以通释修学净土的各种疑难问题。怀恠，初于长安西明寺出家，后往光明寺大师座下侍座十余年，尽得真传。大师寂后，他率众于终南山神禾原建灵塔以葬之，并于塔旁建伽蓝作为纪念场所、继承师业，转弘净土念佛法门，常讲《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



等。则天永昌元年(689)奉柬力为长安实际寺主,寂后受谥为“隆闾大法师”。孟铣亦曾在《释净土群疑论序》中给予善道大师这两位弟子高度的评价,说:“恽与感师,并为道公神足”。

善导大师在弘传净土教法的过程中,深入地研学了净土经典,有关著作颇为丰实。这些著作大体上可以用解义与行义二类来加以区分。著名的有《观无量寿佛经疏》(亦称《观经四帖疏》)四卷。此疏主要依《观经》来解说净土法门的教相与教义,属于解义分。(这部著作在8世纪传到日本后,日僧法然(源空)依之创立日本净土宗)。属于行义分的有《往生礼赞偈》一卷(亦称《六时礼赞偈》)文中讲述了昼夜六时礼赞极乐教主阿弥陀佛及观音、势至的仪式。《净土法事赞》二卷,上标签题为《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下卷题目是《安乐行道转经愿往生净土法事赞》是依《阿弥陀经》解释转读行道的方法。另有《依观经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赞》一卷,是依《观经》等明修学般舟三昧行道的方法。以及《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一卷(简称《观念法门》)是解说应如何观念佛三昧的行相及忏悔发愿入道场念佛的仪法。在《观念法门》中附有的《依经明五种增上教义》一卷,也是善导大师所著。这些著述较为全面地叙述了净土法门的行事仪规,与教相解义理论方面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信教念佛者,依之而得解行并进,圆成胜果。此外见于史载的善导著作还有《大乘布萨法》一卷,又南宋宗晓的《乐邦文类》卷四载有《临终正念诀》一篇,署名作者亦为京师比丘善导,而宋王日休的《龙舒增广净土文集》卷十二题作《善导和尚临终往生正念文》实为同文而异题。

善导大师的净土学说,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阿弥陀佛是报身佛,弥陀净土是报土,而凡夫之辈了凡即可得生报土的这些理论上。他充分地发挥了净土立教的本旨,提倡凡夫众生只要能具备往生的正因(即具足“三心”和起行、作业)便可仗佛愿力得生极乐。所谓三心即是至诚心,深心与回向发愿心,合称安心;起行就是起身、口、意三业之行。身拜弥陀,口称弥陀,意观弥陀及净土庄严;作业是依四种法修持净业,即恭敬修(恭敬虔诚地修)、无余修(专修称名、专想净土),无间修(心行相续无有间断),长时修(心行不退,毕生相继)。由此建立了净土教法的严谨体系,可以说大师在这方面算得上是净土理论的集大成者,一位典型的代表性人物。

善导大师对净宗的贡献是巨大而且显著的。早

期庐山慧远,及其以下弘传净土法门的先贤大德,大都首崇“观相念佛”;到了昙鸾大师便有了“观相”与“称名”并行的趋势;经道大师以至善导大师,则侧重于“称名”一门。善导大师把修行分为正、杂二行,正行是专依净土经典而修的行业,杂行则是其余的诸善万行。主张修学净土法门应当彼杂行修正行。而正行又分为正业与助业二种,在《观经疏》卷四中分析得十分清楚。其中称名正行属于正业,其余读诵、观察、礼拜、赞叹供养等行皆属助业,提倡主修正业,旁修助业。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念念不彼,只以往生净土为期。这种富有见地的主张与见解,深得净业学者的认同。善导大师之后的莲宗诸祖,虽于弘法布教,领众熏修时所采取的方式互不雷同,然都同遵此旨,首弘持名念佛。

近人黄念祖居士言:“善导大师之所以能长受后世无限的尊崇敬仰,是因为大师依止《无量寿经》十念必生的本愿,拈出持名妙法,指出径路修行的径路,显示弥陀愿王的本心”。大师从最初的依《观经》行观相念佛到依《无量寿经》行持名念佛,这是他在修净土法门过程中一种质的飞跃,同时也是一种境界的提升。他在《观经疏》卷三中云:“自余众行,虽名为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较也。”并且道出了“释迦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冠古绝今的至佳名言。本着这种理念,他曾作劝世偈曰:“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步龙钟,假绕金玉满堂,岂免衰残病苦。任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径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其著作仅存《观无量寿佛经疏》4卷,《净土法事赞》2卷,《观念法门》1卷,《般舟赞》1卷,《往生礼赞偈》1卷,《大乘布萨法》1卷。

总之,无论从大师的净土思想而言,还是从他的实践修行来说,大师始终都在努力树立净土教法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而他的言传与身教,对后世修学净土法门的学人与行者,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无怪乎明朝莲池大师赞言:“善导和尚,世传弥陀化身,见其自行精严,利生广博,万代之下犹能感发人之信心。若非弥陀,亦必观音、普贤之俦,呜呼大哉!”从以上所述的善导生平及事迹观之,莲池大师所赞非虚,作为莲宗二祖,大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净土理论及其对净土宗的贡献,乃至对后世的影响,实在无法以此粗笔散文给予全面的讲述。唯能略其身世及有关事迹,让我们共同来了解这位杰出的莲宗祖师,并藉此深表衷心的景仰之情。 卍



被称之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帝，以叱咤风云之势，积十年之功，扫除六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然而，对于最后灭掉的东方齐地，始皇帝却始终有着特别的感情：有迷信、崇拜而产生的狂热的亲近欲、占有欲和掠夺欲，有恐惧、忿懑生成的镇压欲和肆虐欲，更有一些迷惘掺杂着执着凝成的欲罢不能的无奈等等，拧成了始皇帝心中解不开的东方情结。

—

东方齐地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对始皇帝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大帝国建立前后便吸纳齐文化，使之成为秦帝国大厦的基石。

在制度方面的继承，从博士制度上可见一斑。博士一名，先秦已有之，作为官职之名，最早出现在稷下学宫。秦不仅继承其博士之名，连博士官职之员额也与齐相去无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齐宣王时封稷下的博士76人为上大夫。《说苑·至公篇》称秦博士70十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证实：秦始皇34年，置酒成阳宫时是“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始皇封泰山时亦是征召齐鲁博士七十人。马非百先生曾考证过：“秦博士之最早记载，见于始皇二十八年，其员额为七十人，其制盖亦袭稷下先生之七十人。”在博士职能上也是按照稷下的规定执行的，稷下博士为“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秦博士也是掌“通古今。”二者职能相同。可见秦之博士制度直接继承了齐地传统。

对思想文化的吸纳更为突出。《史记·礼书》中载：“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传统史学界认为，秦兴于法亦亡于法，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秦代统治思想不仅是法家还包括儒家、阴阳五行等学说，只不过几种学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统治领域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已。秦帝国建立之前的商鞅变法过程中法治传统已经建立，但法家讲功利，严刑峻法，易激化社会矛盾，而儒家仁义德政等主张，则有利于维护等级和皇权。于是始皇帝儒法并

秦始皇帝的东方情结

周新芳

用，一手举着暴力强制，一手举着教化旗帜，即使是在后期的“黜儒”“坑儒”之后，仍然没有放弃“伦理道德教化天下”的口号，这点可从秦始皇遍立全国各地的刻石中得到反映。可见，始皇帝是“黜儒生”“坑儒生”而并不废弃儒家思想中对其统治有用的东西；法家思想是秦思想文化的主流，它起源于东方无须赘言。而阴阳五行思想同样兴于齐而又由齐人移植到了秦帝国。这一点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当然也有人认为阴阳五行观念产生于秦地，而其形成系统理论是在齐地。

依齐人邹衍之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并根据此说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这一方面是始皇帝为其统治寻找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阴阳五行学说在秦汉社会领域里的地位与作用。

对齐地文化的吸纳和尊崇，在信仰崇拜方面表现的更为充分。先秦的神学思想和神祇系统较为发达，对秦汉社会影响极大，是造成秦汉社会神秘性的重要原因。

齐地是神仙方术的发源地，从战国到魏晋神仙方术兴盛时期，著名方士大都是齐人。秦代，齐方士由民间进入朝廷，使民间的神仙方士与秦朝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如《盐铁论·散不足》中所言：秦统一后，“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术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而“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那么，初并天下的始皇帝为什么甘心于神仙之道呢？神仙方术原是先秦时期的民间信仰，由西方的“贵生说”和东方的“长生说”两派。“贵生说”主张尽量满足人生欲望，从质的方面实现人的生命价值。“长生说”主张用种种方术延长人生寿命，从量的方面体现人的生命价值。前者对始皇帝而言，轻而易举便可实现，而“长生说”则较有吸引力。于是始皇帝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不惜人力和财力，多次派人渡东海求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市（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



神采药。”“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三十五年……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然后又多次遣人入海都一无所获，他仍执迷不悟，甚至方士们哄骗他的离奇谎言，他也能信以为真，徐市求不得药，曾欺骗秦始皇说：“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可得取。’”始皇竟“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甚至听信徐市等人上报仙人不至是因为海神所阻，便亲临东海上，弯弓搭箭亲自射杀大鱼，秦始皇的思想已经完全被方士们所左右。

其痴迷神仙方术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了秦始皇对齐地更加浓厚的兴趣，行封禅，礼祀名山大川及八神，表现出了秦始皇对齐地神祇的虔诚。“封禅”，即“封土于山而禅于地”“王者受命必封禅”这是古代王者易姓告天报地的一种宗教仪式。最早产生于齐地，《管子》一书中曾有封禅篇，可惜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然而，齐地八神之一的“地主之祠”即在泰山，可以肯定“封禅说”源于东方。齐地方士顺应秦始皇的心理需要，将“长生说”援入“封禅说”，使之更具有吸引力。《史记·封禅书》中很详细地记述了秦始皇行封禅的过程。秦始皇并天下后，从方士说而封禅，“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始皇封禅泰山应与他崇信的齐地阴阳五行说有关，阴阳五行认为东方主生，是生命的起始处，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礼记》中说“天子祭名山大川”这是天子的权威。“八祠”崇拜是东方山川崇拜的主体，为了表示对东方的拥有，在东巡往来齐地过程中，行礼祠齐地名山大川以及八神，使之成为秦帝国神学大厦的组成部分之一。秦代神祇“从其内容看，有两股神。一是齐地的神学思想和齐地的神祇，以山东半岛为中心；一是秦人的神学思想和秦地的神祇，以宝鸡雍城为中心。东西方众多的神拼凑起来，构建起了秦王朝的神的大厦。”

巡游占去了始皇帝统一中国后大半的时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从统一次年开始，共有五次大规模的出巡，其中四次是东巡，三次以齐地为主要目标，这三次都到了琅琊、之罘，可见他对齐地的狂热和关注。“秦始皇对齐地的多次巡行，使他有机会接

触更多的齐地的风土人情，山川风物，使其对齐地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也加深了对齐地的感情。”

其实，对于东方齐地这块神奇的土地，在始皇帝心里，既有神秘的向往感，也有他的愤恨、惧怕和无奈，结成了一种久凝心头解不开的结。所以他对于东方齐地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主动积极的吸纳东方文化，广泛援引东方人才。另一方面，却并不是热爱庇护这片土地，更多的是掠夺、镇压与控制。例如，始皇帝的巡行，从本意上讲，与他追求“长生说”有关，而他展示给齐地人民的却是另外一副面孔：所到之处，隳毁城廓、拆除堡垒，“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加以销毁。封禅泰山，求鼎泗水、刻石纪功、宣扬帝威，以服海内。大规模移民也是为了削弱和控制东方，先是迁豪富，“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以消弱东方地区的经济力量。又“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经营“新秦中”，以加强对齐地的控制。其文化专制政策的主要矛盾同样是东方的齐地。众所周知，秦文化专制统治中最惨烈的是“焚书坑儒”，当时是“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秦记与东方史书的待遇不同；齐博士“大抵多齐鲁人”，所坑儒士中当以齐鲁人为众。即使在秦重用关东人才的过中，关东“客卿也始终没有与秦人的平等待遇，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区别身份等级的“邦客”与“主人”专用语，对客卿的戒备心理很强，可见秦统治者的心理死结。

二

始皇帝的齐地情结首先是由齐地的“东方魔力”引发的：齐地经济富庶，农工商协调发展，多元化经济特色是西方秦地望尘莫及的。秦持重农抑末传统，小农经济立国，其经济生活无法与“家殷人足，志高气扬”的齐人相比；从自然环境而言，齐依山傍水，风景与气候皆比秦地宜人。齐地滨海，大海的浩瀚无垠，东海之滨时常出现的海市蜃楼幻境无不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吸引力，完全异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使始皇帝向往无比。

齐地政治文化先进，最鲜明的特征是主变通、尚革新的精神以及举贤尚功的传统，它使齐国在两周时期始终焕发着蓬勃生机，在列国争雄中始终居于



政坛霸主地位。即便在战国季世秦称帝时，亦不忘拉上齐并称东西二帝。强齐的历史，不能不使始皇帝令眼视之。

齐地文化是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适应性极强的文化类型，故始皇帝重之，使之成为帝国文化建构的基础。但是秦吸纳的阴阳五行、神仙方术恰恰反映了齐文化的虚妄与幻想，它既激发了始皇帝的狂热追求，又将始皇帝置于尴尬的境地而不好收场。儒生的欺骗与背叛，不能不使始皇帝大怒、忿恨。

齐地确是人才摇篮，史称“山东出相，山西出将。”齐鲁人才如博士、儒生、法家、方士等充斥着秦朝廷，左右着皇帝的重大决策，使皇帝不能不对齐地充满敬仰。“有秦一代，上层文人和成就卓著的文人，齐人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据已知的秦博士中，齐人博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博士伏生、浮丘伯、卢敖、茅焦、淳于越等都是齐人”“司马迁《史记》中，曾集中记述了先秦时期的四位兵家，他们是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臆，这可以说是我国先秦时代军事家的杰出代表。四位兵学家中，司马穰苴、孙武、孙臆三位是齐国人，……称齐的军事文化是先秦时期全国军事文化的代表，确实是比较合适、符合历史实际的。”“勇猛善战、精熟武技的民风是齐国军事学发达的土壤，齐国有‘力能生拔牛角’的猛士孟贲，有敢于行刺秦王的义士荆轲，同时又有千千万万武艺高强的兵士。”怎能不让始皇帝充满敬仰呢？然而，齐人也确实让始皇帝惧怕、忿恨：让始皇帝对长生充满幻想的是齐人，结果让他等的几近绝望还不算，齐人侯生、卢生发表了激烈抨击秦始皇的言论后，弃始皇帝求仙求药的使命于不顾而潜逃，让始皇帝感受到了人格和自尊的严重伤害。不仅批评他、背叛他，还在他东巡途中袭击他，还有人书刻东郡陨石，“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些都是始皇帝不能容忍的，怎能不使他耿耿于怀呢？因此，齐之方士在坑儒中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齐文化也遭到毁灭性破坏。更重要的是消泯了始皇帝对齐文化的兴趣。

除了始皇帝对齐地的“拿来主义”和控制欲以外，还有一定的深层原因，那就是齐、秦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定秦族源于东方，是夷人的一支，两者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尚变通、善革新的精神，举贤重才的传统，卑礼、重功、尚武的风气，思想学术上的兼容并包特色等等。始皇帝对东方的关注应该说是一种

“寻根”情结。

秦始皇帝的东方情结，与故国社会内部结构失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周以来，关中即富庶之地，秦继承了重农传统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加之东周时代列国争雄多逐鹿中原，关中相对安定，农业得以发展，更突出了关中的富庶。但是当这一时代东方列国官私学均空前发展、大批思想家涌现、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时候，秦国却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吕不韦的杂家著作是“集儒生使著其闻”而成，秦文化的相对滞后不利于“君临天下”，不得不奉行秦人“拿来主义”传统来满足统治需要。

秦人历史上就有“拿来主义”的传统，且“贯穿于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这也是秦文化开放性的具体反映。”“尤为突出者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秦以外诸文化的拿来主义。从有关资料来看，秦人远祖曾‘拿来’过夏、商文化，相比之下，其‘拿来’戎狄文化最多，以致被称作‘戎化’，被视为‘西戎之一支’。考古资料表明，秦人早在居西陲时便开始‘拿来’周文化，吸收了周人的制陶技术，建国后，在农业、青铜制造业、文字以及礼仪制度等方面，更是全面地‘拿来’了周文化，战国以后，秦又‘拿来’法家理论，（使秦文化面貌为之一新）……。统一后，秦始皇‘拿来’了齐人邹衍所创立的五德终始说。……又‘拿来’了神仙家学派的理论，大搞求仙人、求‘不死之药’的活动……”“二是对别国人才的拿来主义。为了更好地吸收外来人才，秦发展完善了客卿制度。”总之凡是有用的东西，始皇帝都有兴趣，他就要为我所用，这正是秦民族文化特征之一——功利性。

齐文化对政治具有极强的适应性。无论是儒家、法家、还是五德终始说，都有适宜于秦帝国大厦的一面，都是维护始皇帝的专制集权的。神仙方术虽没有这种功效，但它同样迎合了始皇帝的心理需求，故被始皇帝所尊崇。齐文化博杂宏富，秦始皇好大喜功，两者一拍即合，也是秦始皇对齐地产生特殊感情的原因之一。

秦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性。秦来源于东方而兴起于西方，其文化渊源丰富，在其文化因子中既有东夷文化、姜炎文化、商文化、以及周文化的渊源，又有戎狄文化的基因。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吸收、容纳了大量的其他文化，特别是在春秋战国秦国崛起、东进扩张的过程中，大规模地吸收、继



承六国文化,更使秦文化衍化成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极强的文化。“以几个世纪的时间跨越了中原文化历经夏、商、周三代至战国两千年的进程。”这反映出秦文化具有较强的兼容并蓄、优化选择的传统。

三

秦始皇帝的东方情结,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最突出的是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客观接纳与主观抵制。一方面始皇帝对东方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较强的心理阴影。他完善了秦的客卿制度,使之成为一种有效的“储才”手段,在引进、使用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诸侯各国没有一个能与之匹敌。但是,引用东方人才在客观上接受了东方文化的渗入,他的首要条件是这些人必须为个人功名富贵完全放弃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背景;在法律上秦不承认关东人与秦人有平等地位;在使用过程中心存疑虑,处处设防;他仰慕东方文化,却疑为儒生博士“入则心非,出则巷议”而“焚书坑儒”。事实上是摒弃、排斥东方文化,甚至不惜以肉体消灭的方式打击东方知识分子。

功利性与盲目性的交织。功利性是秦文化的最显著特征,秦始皇帝继承了这一民族传统,在他的统治生涯中有求必从东方取之,嫁接到自己的统治机器上;在他的客卿制度感召下,东方的人才“归之如流水”,他来者不拒,儒、法、道、杂、兵、阴阳等应有尽有,这些人对他的帝国大厦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有用,便纳之,当他认为无用时,便“坑杀之”。应该说“焚书坑儒”,他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充分体现了他的狭隘与盲目;在接受文化方面,东方文化特别是齐地文化,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儒、法、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乃至民间的山川崇拜、泰山封禅,他样样吸纳,虽然在使用时有所选择,但是他把国家统治思想与个人信仰崇拜混为一谈。如果说儒、法、阴阳五行、山川崇拜及封禅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利于帝国大厦的巩固的话,那么,神仙方术却让始皇帝步入了执迷的死胡同。不仅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还被牵着鼻子似地多次东巡,死在了东巡途中;为了控制东方的反抗力量,迁豪富,搞移民,其本意是为了削弱东方势力,使之经营的“新秦中”成为控制东方的力量。其结果是他始料不及的:

“在秦朝时西北用的粮食,有的要从今山东的龙口市、烟台市一带调运,”齐地可称为秦朝国家粮食储备库。但是迁豪富,打击齐地贵族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击垮了齐地为他创造财富的经济支柱。破坏了东方经济,等于断绝了自己的物资来源,更激化了齐秦矛盾。

对待神灵的态度,崇拜与轻蔑同在。始皇帝似乎非常崇拜神灵,既崇拜山川诸神,也崇拜天地、仙人和祖先;既崇拜本土神灵,也祭祀东方神祇。但他仅仅是通过这种形式寻求一种宗教力量而已。一方面,他对东方神祇并无虔诚之心。先秦时期,中国的名山大川有五岳四渎,其中除华山河水还算秦国沾点边外,其他俱在关东。秦灭六国后,重新调整了天下名山大川的组合顺序,规定天下名山之祠十二,秦地居其七,大川之祠六,秦地居其四。这说明什么呢?如果始皇帝对圣山圣水虔诚的话,是不敢随便更改它的,之所以敢更改,便说明这些山川神灵要在他的皇威之下,神圣与否由他说了算,这难道能说他崇拜神灵而不是蔑视神灵吗?再者,即使是他所礼祠的齐地名山大川和八祠之神,也不是按宗法行事。“始皇帝封泰山,儒生议不敢伤山之土石草木,用蒲车。始皇却干脆从山南开了一条车道,直达山顶,并且立石直接向上天称颂至德,明其得封。这些行动表明了他对神灵并非唯唯诺诺如周人,相反有欲与神灵一试高下的勇气和自信。”另外,“赭湘山”之事已被众多史学家所举证。尽管秦《史记》中有近半的文字是崇神的,可是查遍全国各地始皇帝留下的刻石,我们仍然找不到颂天、崇神之辞。可见始皇帝所谓的崇拜神灵,只不过是装璜门面而已。

对齐地狂热而又忌恨,迷信而又惧怕。对于东方文化,始皇帝兼容并蓄,“为我所用”;对于东方的人才,来者不拒。荀子的学说及其弟子李斯、韩非等为秦王朝的法制理论的构建做出了贡献,并成功地把帝王之学运用于秦王朝的统治实践,令始皇帝满意,所以他对东方齐地表现出更大的热情甚至是狂热,以统一后大部分的时间东巡,在齐地流连忘返。然而事实证明,他对东方文化并不痴迷:统一前后,他需要儒家精神作为帝国的粘合剂,便“拿来”了儒生及其思想主张。随着帝国的稳定,他要整顿秩序、严刑峻法,便“黜儒”,甚至于“坑儒。”他想长生不死,便追求神仙方术、重用方士,耗费大批人力、物力入海。向往三神山,向往大海,多次亲临东海“以观沧海”,但寻仙药的侯生、卢生照样被坑杀。尽管寻仙



药的信念几近痴迷,但他追求的仅仅是长生不死,再次证明其功利性特征。

宽容与强制的交错。秦文化有极强的容纳性,始皇帝也有其宽容性,包括对他国文化和人才的容纳,始皇帝做得都很到位,其宽阔的胸怀与开放的意识是其他诸国君主难以比拟的,这点已见前述。然而以“皇帝”的身份“君临天下”,也狂妄地藐视天下。他以劲弩利剑统一了天下,造就了他“强制”的惯性,易于以“自以为是”的思维来统一天下的思想文化是很自然的,“独尊儒术”“黜儒”“坑儒”,以五德始终推行天下,以痴迷之心去追求不死之药等,都体现了他统治的矛盾特征。

对文化与人才的矛盾。从整体来看,始皇帝吸纳的是齐文化,看重的是齐文化,排斥的是齐人。经过东周几百年文化的交融,强之以始皇帝的“拿来主义”,齐文化在秦已积淀下来,并成为秦意识形态里的主体力量。而齐人才则随着帝国稳固迫使与秦廷脱钩。至“坑儒”,不仅齐人在秦的地位动摇,而且与秦的关系被迫剥离。人才是文化的载体,二者不可分离,离开了人,文化便成了死的。始皇帝深知这一点,他既需要文化,也需要人才。然而,事实不能令他如愿,矛盾中他选择了忍痛舍弃。

前后不同历史时期的行为矛盾。始皇帝在位十几年,早期完全是移植齐文化,为秦帝国大厦添砖加瓦。后期全力追求神仙方术,模仿齐地奢侈之风,于是所移植过来的东西变成了帝国大厦的腐蚀剂;前期移植文化目标明确,后期则迷失了自我;早期重儒、重法、重阴阳五行,后期则严刑峻法,打击儒家,似乎他心里已没有任何仁义存在。事实上他“坑儒”、打击东方儒生并没有完全摒弃儒家思想,这点从齐鲁之地秦始皇刻石的内容可以看出,虽然主要是“颂秦德”,但不乏伦理教化,从早期到后期的石刻,屡屡提及儒家思想,儒家仍是他手中强化统治的工具。这同样显示出始皇帝的矛盾心态。其实仔细分析这一矛盾情结非常易于理解,一方面儒法两家并非水火不相容,其在维护专制统治方面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另一方面,这正符合秦民族的心理特征和始皇帝的思维特点——功利性。

四

始皇帝的齐地情结,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开国君

主的一般心理。一方面对新占领区必须面对文化吸收、文化整合的问题,从文化的角度寻求支持力量,以抚慰民心,也更好地完善帝国的思想统治;另一方面对新占领区的感觉总像是收养来的孩子,从感情上不像本土人民那么亲切融洽。加以占领区人民的反叛斗争,致使他不能不存以戒心。而实质问题在于,始皇帝的这种情结,正是齐秦两种异质文化在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正常反映。

同时,这种情结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统一初期,始皇帝的态度比较狂热,以吸纳为主,谨慎为辅。中期以后,始皇帝心理蒙上阴影,以控制、排斥为主,利用辅之。这一心态历程,也正是秦帝国文化减速发展的过程。

秦始皇帝全面接触齐文化的过程,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正是关键历史时期的文化整合现象,“‘文化整合’是文化变为整体的或完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构成文化的各要素、各系统之间互相涵化,互相调适,形成‘文化模式’。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过程性,达成模式只是相对静止,整合不会停止;二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秦汉帝国正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文化不断整合的结果,其大一统的文化模式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巨大。”“国家统一,使多元文化整合的速度加强;而整合后的一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又反过来增进政治一统。秦汉四百年间,这二者互相推动,形成互补机制。”

无论始皇帝以什么样的心理、态度、准则去吸纳、审视、挑剔齐文化,毕竟他接受了齐文化,在他灭亡齐国的过程中以及统一以后,他没有去遏制、消灭齐文化。相反,齐文化中的精髓变成了秦文化中的新鲜血液,与其他文化一道,共同发展、创造了全新的秦文化,使秦文化更具活力和生命力。齐文化也在此过程中完成了由区域文化向一统文化的转变。胡适曾评价说:“秦始皇征服了六国,而齐学征服了秦始皇。”李勤德先生说:“秦代以武功自西向东统一了中国的政治,而孔儒却以文教自东向西统一了中国的思想。”我说,秦用武力自西向东征服了齐国,齐文化以它特有的魅力自东向西征服了秦文化,而成为秦文化的主流,并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影响深远。同样,始皇帝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虽有其专制、残暴的一面,但是,其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是不容否定的。■

趣话白兔丘高傒墓下“关圣帝君庙”楹联

高庶值



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前，临淄城北20华里的白兔丘庄（春秋战国时期为齐国临淄城北门户）有一座“关圣帝君庙”。庙堂的位置就坐落于紧靠高傒墓西侧下方的平地上。

相传，白兔丘“关圣帝君庙”始建于清乾隆早期。嘉庆、道光年间，村民曾对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护。遗憾的是，在日军侵华期间，庙堂被汉奸强行拆除，用其砖瓦木料，在高傒墓顶上建了岗楼。

现在，当年的“关圣帝君庙”已不复存在，但庙堂前那幅举世无双的对联，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对联的内容是“淄江难洗吴江恨，白兔常闻赤兔嘶！”。相传，这幅对联是当年庙宇建成后由青州府知名人士李文藻命题并撰写的。每逢到过年的时候就要更换一次，但是对联的内容却从来没有更变过。关于这副对联的思想内涵与背景出处，历来无人清楚，多年来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为解开此迷，笔者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对其进行考究，终于找出了答案。

我们先来解析李文藻对联中上联句“淄江难洗吴江恨”的含义：上联中“淄江”指的是山东省境内的淄江，亦称淄水、淄河。只因高傒墓濒临淄江而建，故此对联中所指的就是此一淄江无疑。而对联中的“吴江”所指的是江苏省境内的吴江，古称“淞江”，又因该江流在三国时期属吴国境内的一条江河，故又称吴淞江、亦名淞陵江。仅此可见，淄江和吴江同属我国不同疆域内的两条自然江流，然而，作者为什么以淄江和吴江这两条不同的江河贯穿到此一对联中呢？这里关键的是作者即明白这两条江流的自然气势和人文环境，又要明白当年关羽关云长被东吴所害的历史出处，才引发出作者吟诗作对的激情。可

见李文藻不但是位吟诗作对的行家，而且对我国的疆域水势与人文环境也是了如指掌。仅此，青州府名士李文藻不愧为是满清时期一文人大儒。事实上，淄江水的气势比吴江水要大得多。不仅如此，只因淄江源于上游的泰沂山脉和鲁山山脉之间，又经下游的鲁北平原由小清河入海。受地势环境的影响上下游落差较大。每逢汛期山洪爆发，巨涛滚滚，汪洋一片，尤其是处于中下游的临淄城至广饶入境这一河段，更为惊心动魄，使人望之生畏。而吴江则不然，相比而言，吴江在汛期行洪时要比淄江水势平稳得多。然而，就淄江和吴江这两江流的气势相比，淄江水再大再汹涌，也难以洗刷当年关羽关云长被东吴所害的仇与恨。另外，对句中还体现出作者为关羽关云长鸣冤叫屈的思想内涵。这就是“淄江难洗吴江恨”对句的背景与出处。对联的下句是：“白兔常闻赤兔嘶！”单从字义上来讲好像不难明白对句的大致意思，但对联中的句意远非说来是简单的，不懂点我国春秋时代历史的人是很难点评出这一对句深层次含义的。因此要想从真正意义上揭秘这一对句的生成初终，还需从我国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说起。

众所周知，关羽关云长在后汉与三国时期是一位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此人行侠仗义、精忠报国。作为刘备政治集团重要统治将领的关羽，肩负复兴汉室基业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他即独当着荆州一面的军事统帅，又背负着北伐曹魏和处理与东吴复杂时局的重任。为了辅佐结义大哥刘备复兴汉室基业，关羽关云长时常白天理政军务、到夜间还要熟读史著《春秋》，以此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才智与道德情操。关羽不负大哥刘备的重托，为蜀国的建立和政权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关羽的功德与人品备受人们所敬崇，死后又受到历代朝廷的褒封，被国人奉为“关公”“关老爷”“关圣帝君”，被佛教称为“伽蓝菩萨”，被统治者崇为“武圣”并与号为“文圣”的孔子齐名，被商道中人供奉为“武财神”等。另据不完全统计，至明清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有名记载的“关帝庙”或“关圣帝君庙”等弘扬关羽的庙宇文化就不下3000余处。光在北京地区就不下200




余座关帝庙宇。而这些庙宇的精髓思想,基本都是来弘扬和传承关羽忠信仁义之功德、倡导人们积德行善之文明的思想内涵。然而,人们在弘扬和传承关羽功德绩业的同时,却未曾想过关羽思想的根基与来源由来于何?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传承中的一项不足或缺失。在民族文化与社会文明不断挖掘与探源的今天,在此不妨提示大家回忆一下关羽的成就历程与时代之背景。特别是关羽在保护二位皇嫂千里寻兄那段艰苦难熬的日子里,身为汉寿亭侯的关羽关云长白天斡旋于曹魏的政务官场,到夜间依旧不忘熟读《春秋》这桩事儿。这里的问题是何为《春秋》?《春秋》中都撰记了些什么?对此恐怕有不少人难以完整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历史名著《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这是我国最早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概括地说,《春秋》是根据我国大周王朝春秋时代的史官记事,有孔子等儒家先贤修撰而成的一部历史名著。《春秋》中记载或撰记了东周一个时期(春秋时代)以来,周王室势力的减弱和诸侯群雄纷争时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的历史背景与过程,史称“春秋五霸”时期(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仅此认识,我们会联想到当年为什么要选择在高傒墓下建一座“关圣帝君庙”?又因何故激发了青州府名士李文藻在高傒墓下“关圣帝君庙”作出“淄江难洗吴江恨,白兔常闻赤兔嘶!”这一激情豪放的对联?然而就笔者提出的这一问题而言,只有把春秋历史上被国人敬宠为忠肝义胆、至德至善、精忠报国的春秋名臣——齐上卿高傒的历史生平排列出来,也就不难解答这一问题。

高傒(前728—637年),自号白兔,谥号敬仲,世称高子;是为齐国贵族大夫,齐开国元君姜太公后

裔,周天子册封齐国之监国上卿。高傒身为齐国扶政上卿大夫,平生以忠德信义为立人之本,身历四朝,崇德重才,曾拥扶齐桓公、齐孝公两代齐国君主。高傒一生行侠仗义、至德至善、精忠报国,曾与时任国相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我国春秋史上五霸之首功;于公元前659年鲁国发生庆父之乱时,高傒受桓公之命,将“南阳之甲”3000治鲁,帮助鲁国“立僖公而成鲁”,稳定了鲁国政局,确保鲁国国民免受战乱之苦。迄今留有“犹望高子”之美谈。对此,史著《谷梁》评曰:“高子深执忠臣之义,勉其君以霸。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鲁国遂安。以此见,权在高子。高子之为人臣,忠也,从义不从命矣。”从史著《谷梁》对高傒的评价来看,高傒在当时的齐国不但地位之高、权力之重,而且深执忠臣之义。仅此而言,高傒无愧为是春秋史上忠德信义立人之本的一大圣贤,无愧为是春秋时代杰出而崇高的历史名臣。高傒逝后葬于临淄城北20华里的淄江西岸,古齐燕大道东侧高丘之上,世为白兔丘。今天的敬仲镇及白兔丘庄均由齐上卿高傒字号而得名。

至此,高傒墓下“关圣帝君庙”以及庙前青州府名士李文藻所题对联,下联句“白兔常闻赤兔嘶”的思想内涵已揭底。概括而论:“白兔”即为高傒自号,也指其本人;“赤兔”即是所指关羽的“赤兔马”,又体现出关羽关云长其人的所在。对句中还体现出“赤兔马”的嘶叫,象征着一代英雄豪杰横空于世的悲壮场景。而这一悲壮场景即是关羽关云长立马跨刀出征时的雄壮气魄,也是被春秋时代军政名臣——齐国上卿高傒所敬佩的。“淄江难洗吴江恨,白兔常闻赤兔嘶!”好一幅世之无双的名人对句,不但包容了两位历史先贤的崇高品德,而且还为后来的齐文化造就了一桌丰盛的大餐。

三国时期的关羽与春秋时期的高傒相距850余年,虽属不同于两个年代的历史人物,但两者之间共有相同的民族文化之精髓思想内涵。这并不是个偶然,这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传承与发扬中的一大体现。仅此引起我们重视的是,由于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不足和缺陷,有许多的方志文化与社会文明,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挖掘或探源。深信在党中央、国务院所倡导“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重要指示精神的鼓舞下,先进的民族文化必定会给人民生活带来更加进一步的社会文明。 

西江月·临淄

刘德昌

| | |
|---------|---------|
| 牛峰青霭云度 | 云蒸霞蔚两岸 |
| 淄江北去泱泱 | 玉树临风平岗 |
| 山明水秀着霓裳 | 清丽故都日月朗 |
| 熏风袭人花香 | 欣逢盛世华章 |



太极拳与《孙子兵法》中的整体与局部简说

李光乐

一、整体与局部说

整体与局部,从字义上说,局部是整体的一部分。“整”就是完整、完全没有残缺。整体就是集体或事物的全部,如整体规划、整体结构、整体行动等等。在太极拳修炼中所说的“行拳走架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体完整一气”的要求,与《孙子兵法》中所讲的“作战中不能首尾呼应,就会处于被动状态”的战略要言有着相近、相同、相通的密切关联。就太极拳而言,仅从诸多师辈们传功授艺时要求铭记的“一静无有不静、一动无有不动、一松无有不沉、一开无有不开、一合无有不合……”以及“手到眼到、步到身到、意到心到”的要言来说,其实质全部是对所学拳术中“局部与整体”的提示和严格要求。

二、孙子兵法说

《孙子·九地篇》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长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首至,击其中而首尾皆至。”“以决战事,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逸,敌不及拒”。“势如行弩,节如发机”。强调用兵作战应注意部队的整体性,如果各个局部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作战中就不能首尾呼应,就会处于被动状态。

孙子说:“从前善于作战的人,能够使敌人前后部队不能相互策应,主力和小部队无法相互依靠,官兵之间不能相互救援,上下之间无法聚拢,士卒离散难以集中,遇上交战,阵行也不整齐。至于我军,则见我有利就打。对我无利就停止行动。要使部队能够齐心协力奋勇作战如同一人,要使优劣条件不同的士卒都能够发挥作用,根本在于恰当地利用地形。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使全军上下携手团结如同一人,这是因为客观形势迫使部队不得不这样。九种地形的应变处置,攻防进退的利害得失,全军上下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作为将帅不能不认真研究和周密考察的”。

此外在本篇中,还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率然”蛇。孙武用它来比喻军队的团结和协作应如率然一样齐心协力,勇往直前。

三、太极拳说

《用武要言》讲:“上欲动而下自随之,下欲动而上自领之,上下动而中部应之”。陈鑫说:“击首尾动精神贯,击尾首动脉络通,当中一击首尾动,上下四旁扣如弓”。太极拳的首要特征就是强调,练拳要

“周身一家”“劲要整”,一身之劲要练成一家,“一动无有不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强调内不动,外不发,腰不动,手不发。陈照奎先生讲:“打拳一个部位有毛病,可能是全身的毛病,绝不是一个部位的毛病”。“一个部位有错误,全身都不对。”《太极拳图说》中“外三合”“内三合”,即肩与胯、肘与膝、手与足外三合;心与意、意与气、气与力内三合。在行拳和技击中,局部与整体要相互配合,开合有度,体现出太极拳的“整体感”。

太极拳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武术文化遗产之一,是内家拳中的一个拳种,是一个内外兼修、形神俱炼的拳种,因此更应该,从局部到整体,从外形到内里,有机地结合,刻苦磨练,求真务实,科学的论证,用我的恩师李超群先生传授查拳时那句格言去印证习练者功夫深浅,应该是准确的,也是比较现实的。不论你练的是哪家哪派,首先要看你的“手眼身法步”,再看“精神气力功”。笔者一向不认同那些“不在形式在气势”“不在外表在内里”的习练者。应该明白,“重意不重形”“重内不重外”的言词,应该出自那些学有所成,练有所就的武道高人之口。而我们这些一般的武术太极拳爱好者,特别是那些好高骛远的初学者,还是应该先重形后重意,即要重局部的规范,又要讲整体的协调。练习一个架势也好,一种套路也好,不能不管各部位的错对与否,更不能不注意全身上下,内外整体活动的协调统一。从“明规矩、守规矩、合规矩而脱规矩”的进程练起,逐步到达“内外相兼”“形神合一”的完美境界。

四、结语

《孙子兵法》反复强调,齐心协力,加强治理、管理曰:“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就是通过严格的治理、管理,使士卒齐心协力,英勇杀敌如同一人。

《孙子兵法》浓缩了中国军事战略智慧的精华,的确是一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典籍。所以广大武术太极拳同道师友们,应当在习拳练剑之余,静下心来,好好阅读、学习、鉴赏一下我国这部最古老、最杰出的兵书。这样,一是进一步见证这部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之神奇魅力,二是用它的哲理精论来指导我们广大武术太极拳爱好者们学习、探索、研修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促进大家在现有的成就面前,再上一个新的层次,为弘扬、传承我们民族传统武术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唐人诗歌颂管鲍者，首推诗仙李白。他在《陈情赠友人》中写道：“鲍生荐夷吾，一举置齐相。斯人无良朋，岂有青云望。临财不苟取，推分固辞让。后世称其贤，英风邈难尚。”对鲍叔牙这种高风亮节的荐贤情操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

在《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李白又曰：“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李白在诗中以诸葛亮、管鲍自喻，言已结交崔氏兄弟可与之共荣，有希冀崔氏引荐之意。

李白诗《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中曰：“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李白用此诗形容自己与元丹丘之间的交情犹如管鲍之交。由于此时李白的境遇有类管仲微贱之时，故在这首诗中有“穷与鲍生贾”之语。

在《赠张相镐(其一)》中，李白诗曰：“昔为管将鲍，中奔吴隔秦。一生欲报主，百代思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重陈。卧病宿松山，苍茫空四邻。风云激壮志，枯槁惊常伦。”诗中句“昔为管将鲍，中奔吴隔秦”，谓其往昔与张相镐相善如管鲍，中道分离，一

唐人诗歌颂管鲍

陈巨慧

在东南，一在长安。

唐人诗歌颂管鲍者，除李白之外，还有杜甫、高适、陈子昂和元稹。他们的诗作，其主旨均是褒扬管鲍贫贱之交的。

杜甫《贫交行》：“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十年长安的困守和安史之乱，使杜甫生活在唐代最低层。他流离失所，贫困潦倒，饱尝了苦难和艰辛。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使得他

对贫交的感触最深。此诗泾渭分明，针砭时弊，痛快淋漓地颂扬了管鲍之“贫时交”，对反复无常者、轻薄者给予了无情鞭挞。

杜甫诗《过故斛斯校书庄二首》(二)：“燕入非旁舍，鸥归祇故池。断桥无复板，卧柳自生枝。遂有山阳作，多惭鲍叔知。素交零落尽，白首双泪垂。”此诗为杜甫过亡故斛斯庄时有感而作。“多惭鲍叔知”，用以比己与斛斯情谊；“素交零落尽”，谓世传管鲍善交，杜甫与斛斯亦是真朴历久之朋友。

高适在《赠任华》诗中写道：“丈夫结交须结贫，贫者结交交始亲。世人不解结交者，唯重黄金不重人。黄金虽多有尽时，结交一成无竭期。君不见管仲与鲍叔，至今留名名不移。”高适在给任华的诗中，崇尚“丈夫结交须结贫，贫者结交交始亲”的交友之道，这和杜甫所主张的“贫交”“素交”不谋而合，其主旨一脉相承。

元稹《寄乐天二首》诗中云：“荣辱升沉影与身，世情谁是旧雷陈？唯应鲍叔犹怜我，自保曾参不杀人。”诗人因被诬“谋刺裴度”而出刺同州，他在给白居易的诗中以雷陈、管鲍比喻他们之间的友好情谊。

(上接第38页)缠腰；脚下起兮伏兮的幽谷叠锦堆绿，两条银白的道路如龙蛇腾雾，为这人间仙境注入了现代的因子。眼光放远一点，逶迤而去的淄河，太公湖如一面镜子泊在河中；再放远一点，临淄新城楼宇傲然，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延续辉煌。

我在台下的古碑前流连，三块石碑，虽经风雨剥蚀，仔细看去，隐约还能看出勒石刻碑的时间，大清康熙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光绪三十三年，上面镌刻着建庙或重修时候首倡者、捐款者的姓名，这些人已消失在悠悠岁月深处。在光绪年间立的碑上，我为自己能够依稀辨识出几行字庆幸：“处山谷之险，当

道途之阻，东接苍峻，西映黄山，南对稷峰，北临淄水，其蔚然块然，严阿崆峒者俱有，此固形势之自然，迥非人力之所为也。”她蕴含的文化气息，让我这样多愁善感的人逐香而至。

马莲台畔，满树的槐花，让春天饱满，绽放。纯洁的槐花，是避俗的良药，为我们接风洗尘。在这个曲径通幽之处，我，一个拙于言语表达的书生，情不自禁迸出两句：“寻常巷陌在在有，马莲台奇天下无。”这算不上诗，我也断不敢拿去就教于方家。

马莲台确实很适合一个人的旅行，独步，沉思，怀想。情在不能醒。

齐文化在世界再次大放光彩

张福信

2014年3月27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发表重要演讲。演讲全面深刻阐述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强调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当习近平主席讲到“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时,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

习主席所说的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约公元前502年,卒于约公元前422年,汉族,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左丘明乃姜子牙后裔。据考证他是鲁国都君庄人(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军事家。曾任鲁国史官,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故司马迁在《史记·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他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史学界推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

习主席所说的晏婴,生于公元前578年,卒于公元前500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又称晏子,今山东高密人。他聪颖多谋,刚正不阿,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40余年。孔丘曾赞

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晏婴头脑机灵,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王。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崇敬晏婴,在《史记·管晏列传》最后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祈慕焉。”

习主席所引用的《左传》这一段的原文是: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鬯馥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有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据也驾着车赶来了。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谐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也不过是相同而已,哪里能说是和谐呢?”景公说:“和谐与相同有差别吗?”晏子回答说:“有差别。和谐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重就减少调料。君子吃了这种肉羹,用来平和心性。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可以,臣下进言指出不可以的,使可以的更加完备;国君认为不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可以的,臣下进言指出其中可以的,去掉不可以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丁,百姓没有争斗之心。所以《诗·商颂·烈祖》中说:‘还有调和的好羹’



汤,五味各又适中。敬献神明来享用,上下和睦不争斗。’先王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成就政事。音乐的道理也像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各方面相配合而成,由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各方面相调节而成。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可以平和心性。心性平和,德行就协调。所以,《诗·豳风·狼跋》说:‘美好音乐没瑕疵。’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下去呢?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能听得下去?不应当相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晏子主要从国家政治的角度,论证了“和”与“同”的本质区别。君臣之间,应该允许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不同意见,在彼此充分发表各自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和”,才是国家政治的应有的状态和理想境界。而“同”则相反,“同”否定不同,回避矛盾,不允许不同意见、不同认识的存在及发展。

和与同,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表现有一致性,但在实质上,它们完全不同。同,是绝对的一致,没有变动,没有多样性,因此,它代表了单调、沉闷、死寂,也没有内在的活力和动力,不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也不符合宇宙万事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性。和,却是相对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相互不同、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统一态、平衡态。因此,它既不是相互抵消、溶解,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积极方面结成和谐统一的新整体。它保留了各个因素的特点,又不让它们彼此抵消,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活力、生命力、再生力的整体。

和的观念,既是宇宙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之一。换句话说,和的内涵,既包括了自然规律,也包括了人的理智对秩序的追求,即人为的秩序。和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国家兴盛的理想状态是和谐:君臣之间、官民之间、国与国之间、朝野之间,相互理解、支持、协调,利益趋于一致;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和谐:有限和无限、虚与实、似与不似、刚与柔、抑与扬等等因素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人们处理事务、人际关系也崇尚“和为贵”,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分歧,用相互切磋来发扬各自所长,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之处,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

“和”的最终旨归,是人的内心的心性平和,也就

是说,它的最后落脚点,还是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人本的,而不是物质的。

习近平主席非常精当地引用了晏婴的一番话后,接着说:“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追溯到54年前,1960年5月27日北京,毛泽东主席在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其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毛: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蒙:我们应当从两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

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大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毛:好,我赞成。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英国陆军元帅。1887年11月17日出生于伦敦肯宁敦区圣马克教区的一牧师家庭。1901年14岁时才正式上学,文化成绩低劣,但体育成绩极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负重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蒙哥马利率远征军第3师横渡英吉利海峡,参加了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斗。1942年7月,北非沙漠中的英国第8集团军,被“沙漠之狐”隆美尔的德国非洲军团击败,退守埃及境内的阿莱曼地区。在英军濒临崩溃之际,他临危受命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同年10月至11月间他组织向德军发动了阿拉曼战役,一举击溃隆美尔非洲军团,扭转了北非战局。随后又挥师乘胜追击,协同美军将德、意军队围歼于突尼斯。他由此声誉大振,被人们称之为捕捉“沙漠之



狐”的猎手。1944年6月率领第21集团军在诺曼底登陆，此后转战西北欧，参与指挥了沙纳姆战役和阿登战役。1944年9月1日，蒙哥马利被英国王室晋升为元帅。1945年3月，蒙哥马利率英美联军强渡莱茵河，之后便日夜兼程，向波罗的海进发。5月，驻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的150万德军向蒙哥马利投降。1951年4月2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成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任最高司令部司令，蒙哥马利任最高副司令。1960年和1961年蒙哥马利元帅两次访问中国，均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提出“承认一个中国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则之一。”

孙武(约公元前535—?)，字长卿，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人，陈公子完之后裔，其祖食邑乐安，是吴国将领，著名军事家、政治家，被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他与伍子胥率吴军破楚，五战五捷，率兵3万打败60万楚国大军，攻入楚国郢都，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

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毛泽东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多次指出它的军事思想的原则性、灵活性、实用性，早在1936年12月写的著名的军事宏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时隔24年后，毛泽东主席把《孙子兵法》，也就是齐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兵文化推向了世界，使齐文化在世界大放光彩。

在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伟大时代，习近平主席将齐文化中晏婴关于“和而不同”的理念，进行了绝妙的运用，精当的阐述，极至的弘扬，使齐文化再一次在世界大放光彩。

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齐文化，曾经创造了中国先秦文化的高峰，是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信，它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伟大变革中发出灿烂的光辉。

两千多年了，
悦耳的韶乐还在余音袅袅，
连我这个非音乐的耳朵，
也被那只无形的审美之手牵着，
一路寻寻觅觅，慕名前往，
一睹为快，了却夙愿。

沿着齐国历史曾经辉煌的脉络，
在初冬的一个下午，
于淄博乡郊不起眼的村落，
见识了看似窄小却名声远扬的韶院，
一个曾经让士大夫痴迷的地方，
一个曾经让孔夫子失态的所在，
一个至今散发魅力的文化符号，
一个写进历史册页的历史景点。
中国的音乐人应该去朝圣的地方，
娱乐节目策划人可以去觅灵感的乡野，
作家、诗人可以去发发思古之幽情，
历史学者或许能挖掘出些失传的文明碎片。

满地银杏树的落叶，
厚厚的，厚厚的，
仿佛历史重重的积淀。
静谧中的寂寞，
因了夕阳的斜照，
金灿灿一片。
“孔子闻韶处”五个隶书背后，
隐隐传来韶乐的韵律。
肉兮肉兮，无欲无味也，
酒兮酒兮，未喝已醉也，
孔子之言让官方与民间
玩味了两千余年，
诠释了两千多年，
至今，还在诱惑着音乐的发烧友
与历史真相的探寻者，
在此徘徊，在此反思：
传承了？翻新了？超越了？
抑或无法企及的音乐峰岚？

(凌鼎年：江苏太仓作协主席，
全国著名小小说家)

孔子闻韶处

凌鼎年



“守险全国”辨莒邑

朱宇

战国后期，燕昭王为报伐国破都之仇，经过30多年准备，派客卿乐毅率大军伐齐。乐毅在历史上和管仲齐名，谋略广有，会同三晋与秦国的友军，在济水西岸大破齐兵。随后挥师东进，攻破齐都，后分兵略地，齐国70多座城邑，除即墨和莒邑没有被攻破外，其它悉被占领。齐国处于存亡危急关头。

即墨守帅田单，原系临淄市掾（相当于首都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此时被公推挑起重担。他组织全城力量，坚守孤城数年之久，终于智易敌帅，阵设火牛，实现了战局的大逆转，大破攻城燕军主力，尽复齐境，迎接在莒邑坚守的齐襄王君臣，返回都城，上演了一出辉煌历史的复国正剧。

即墨是有着“三里之城，五里之国”的齐东重镇，大路贯通临淄，位置锁定在今平度市东郭的墨水上游。但襄王君臣坚守的莒邑位置，却史无明证。北魏郦道元注《水经》，认为沫水河谷中段的莒国旧都，即是“乐毅攻齐，守险全国”的所在。后世人们都沿袭此认定。笔者以为此证不确。

地名重叠，古今常见。春秋时莒国而外，周王国、鲁国和齐国都各有莒邑。作为周王国的边邑和鲁国的下邑，所涉史证微乎其微。齐国的莒邑，则有较详细的记述。《春秋·昭三年》记述，齐景公带近侍去莒邑打猎取乐。头几年权臣庆封谋划作乱，失败后逃奔吴国，同党卢蒲癸被流放到北部海滨。此时，他找准机会，溜到莒邑，向景公哭诉自己老迈年残，不会再干出格的事了，请求赦免返回都城以终天年，景公见说的可怜，准备答应，大臣说：“卢蒲癸不但回不了都城，反而要被流放到更远的燕国去。”《春秋左氏传·昭十年》又记述，齐国崛起的强族陈无宇，为扩展势力，联合鲍氏族，以私甲进攻齐国世臣栾氏和高氏，对手失败后逃亡鲁国，陈无宇将掠夺和瓜分到手的财物献给齐景公，请求将莒邑赐给自己作为退休后养老的地方。齐景公只允许给靠近的另一块城邑，陈无宇不接受，齐景公只好另外将西境高唐邑（今禹城市一带）赐给他。

可以想见，莒国此时是主权国家，小而顽强，常和鲁国武力争夺边界地区，也能以武力化解边境齐军偷袭的危机，绝不会允许邻国君臣在自己国都飞鹰走狗取乐，更不会允许邻国君臣将自己国都作为

讨价还价的赐物。

另一历史讯息是，燕齐之战早160多年前，莒国已被南方强国楚国武力吞并。新版《辞海》

对“莒”字条释有云：“周为莒国。公元前431年为楚所灭，后属齐。”再后即是肯定此处即齐国抗燕未下的莒邑。《辞海》所释，实为附会无稽之谈。楚灭莒后，强力北扩，蚕食了鲁国东北境大片地区，推进到了齐长城东段的城脚下。史籍中从没有这一时间段楚、齐两国在这一地区构兵的记述。倒是《战国策·楚二》记述了一段历史插曲，早些年，楚襄王还当太子时，在齐国充当任子，老王身死，楚襄王要回国继任，齐王勒索要以东地（原楚国侵占的穆陵以南的地带）500里为允许条件，被迫答应。楚襄王返国后反悔，不肯割让，齐军出兵要攻占，楚国除准备迎战外，并约好秦国重兵压齐西境，齐国只好罢手。莒都没有易主。

由之可充分认定，此时楚国吞并的莒都和齐国的莒邑，全不相干。

莒邑所在，排比和综合史料，是可以大体推定的。

《史记·田单列传》记述，燕军攻占齐都后，攻莒不下，“引兵东围即墨”。可知，莒邑位置，在临淄东贯即墨的大路西段南侧。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述说，齐湣王济西兵败，返回临淄的道路被阻断，辗转去鲁国等地落脚。此前，他曾号称“东帝”，他仍以“天子”自居，人家不肯招待，只好逃到莒邑。楚王派淖齿救齐，也到莒邑任齐相，淖齿有野心，残杀齐闵王，和占领军接头，商议瓜分齐国财富和土地。可证，莒邑在穆陵以北、由原莒都通往齐都的“莒道”以东。

《战国策·齐策六》记述貂勃与齐襄王的对话：“燕人兴师而袭齐墟，王走而之城阳山中。”又说田单破燕之后，“为栈道木阁而迎王与后于城阳之山中。”可见，莒邑（即城阳）地处深山区。“行尽青山是潍县”，莒邑所在，即处于胶莱河谷以西的山内。

王孙贾，是年仅15岁的王族少年，随侍闵王，在返回的路上走散，只身到了都城家中，受老母劝勉，寻走莒邑，到达后，齐闵王已被淖齿残杀，少年怒不可遏，来到市场呼喊：“淖齿乱齐国，杀闵王，欲与我诛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之诛淖齿刺而杀之。”《战国策·齐策六》这段叙述，反映出莒邑平民浓厚的故国情怀。参证其他史料，证明了莒邑离齐都并不远。

以上斑斑史料，可以印证，莒（下转第16页）

舍本逐末

【解释】舍：舍弃。本：根本。逐：追求。末：枝节。抛弃根本的、主要的，而去追求枝节的、次要的。形容做事情不从根本上着手，只在细枝末节上下功夫。

【出处】《战国策·齐策四》：“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



1.周朝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经常互派使者，相互访问。齐国齐襄王派遣使者到赵国去拜见赵威后。赵威后是赵国赵惠文王的妻子、赵成王的母亲（即中学语文课本《触龙说赵太后》中的赵太后），此时她在赵国临朝听政。



2.宾主双方见过面以后，赵威后问齐国使者：“你们齐国的收成好吗？老百姓们都能安居乐业吗？你们的国君也安然无恙吧？”



3.齐国使者听了很不高兴，说：“尊敬的太后，我奉我们国君的命令来向您问好，您不先问候我们的国君，却先打听齐国的收成和百姓的状况，哪里先问候卑贱者再问候尊贵者的道理呢？”



4.赵威后回答说：“话不能这样说。要是收成不好，百姓们靠什么生活？要是没有百姓们的拥护，你们的国君怎么能够坐稳江山？难道要我舍弃了根本，先去关心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吗？”齐国的使者听了非常惭愧。

（韩雷声/文 朱代训/图）



马莲台

春风沉醉马莲台

王德亭

每年春深时节,我都被和风牵拽着脚步,走向马莲台,走进马莲台的沟沟壑壑,树海花香,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在这方净土上发一番思古幽情。

马莲台离临淄中心城区大约10华里路,在齐陵街道南部山区起伏的山峦中。在现代文明高歌猛进的时候,马莲台以她的宁静自守,与喧嚣浮躁保持了适当的距离。数千米长的山间幽谷,让人生出徘徊徘徊的情趣;山崖沟壑峰回路转,波峰浪谷目不暇给,果园花木与映雪飘香的槐树相映成趣。徜徉其间,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慨。

我和马莲台结缘,是13年前,与文友孟泓、贾学德的一次涉足。学德是摄影爱好者,他发现这道幽谷后,带我们去分享。那时还没有进山的马路,我们要依赖双脚丈量完抵达马莲台的路程。我们在沟壑深处寻踪马莲台遗迹,读着清际乡民立的石碑,我一下就被这方胜迹吸引了。明末慌乱,匪祸殃及这片土地,老百姓的性命如草芥。“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民”的当地乡民,携妻将雏躲进了这个峰峦叠嶂的峡谷,免受了生灵涂炭之苦。他们为冥冥中神灵的佑护心生感激,捐资出工,在高台上修建庙宇,供奉香火,以表达感激之情。

我站在古庙遗址上,脚地里有一片碎石,被淹没在一人多高的荆棘丛中,这大概就是古庙全部的遗存了。幸有临淄区政府把马莲台公布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又得齐陵街道的社会贤达出资,在古台的断崖绝壁修筑石洞,铺砌了石阶,让我们在抵达的过程中,免除了荆棘的羁绊和攀登的劳苦。

马莲台的母体是齐陵南部山区的土地,在这片沃土上,沉睡着战国时期东方大国齐国的六位国君。马莲台地处淄河南岸的牛山、康山之阳,稷山之阴。牛山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

仲魂归之地;康山则与齐国的齐康王有着不解之缘;稷山上,有当地村民开山采石发现的石井墓道。稷山古墓群,墓道在山巅依石凿刻,巧夺天工,让我们惊叹2000多年前的工匠水平。稷山脚下,长眠着终军。终军是济南人,少年得志,深得汉武帝赏识。“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人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汉书·终军传》)终军奉命出使南越,被越相吕嘉攻杀,20岁时以身殉国,世称“终童”。悠悠古史,增加了马莲台的厚重。

每年春深时节,逢上双休日,或“五一”小长假,马莲台便热闹起来。来的人各怀着一份心情:有的是为了放逐一周的疲惫,有的是画院来取景写生的学生,还有的就是奔着那满山谷的槐香来的。槐花开放的时间,每年会随着春暖的迟早有早有迟。但来采花的人,都有一样迫切的心情。马莲台的槐花好吃,一则这里是丘陵台地,形成了适宜的小气候;二则远离污染和尘俗。一片一片的刺槐树,甘愿在这荒丘僻壤安身立命,长在沟坡崖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落纷披,花香盈面。仿佛把雁北的大雪搬到这里,铺天盖地下了一个昼夜,把马莲台装扮得越发圣洁。人们也顾不了脚下的危险了,攀高爬低,攀花折枝,攀折的是一种心情。撷一把槐花,送进口中,嚼得满口生香。带一兜槐花,把春天提回家,槐花馅食、槐花水饺、槐花粳粳饭的香气氤氲,马莲台的三春美景如海上三山,亦梦亦幻。

我随《淄博日报》临淄采风团走进马莲台的时候,环山路已开通了,她一下拉近了我们与这方胜景的心理距离。

站在马莲台上,顿有极目天阔之感。环绕马莲台周遭,恰有四座峭壁回环捍护,呈现着莲花的奔放。北侧康山绿树戴帽;南邻稷山松柏(下转第32页)



金山游记

仇绪芳

金山优美的风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尤其近年金山重新整修以后,更是游人如织。一年夏天,连续几天大雨过后,我顶着蒙蒙细雨来到金山脚下。湿漉漉的石阶呈黛黑色,绿苔湿滑。拾级而上,雾霭绕身,清风轻拂。及至中段,渐感劳累,浑身有燥热之感。蓦然,一滴清露落于臂上,清凉而惬意。到十八盘上部拐弯处,坐下休息。极目南望,远山在淡淡的细雨中渺渺茫茫,山下红楼碧水,遍野庄稼,一派茁壮生机;近看两边的山膀上,松柏随风低吟,薄雾漫漫;俯瞰山下,团团白雾随风飘过,显得深不可测;回首仰望,陡峭的十八盘,就像挂于云端的天阶,南天门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到达山顶,我轻抚着断壁残垣,辨识着残碑上的字迹,遥想着历史的厚重,体验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顿时,我体悟到了金山的灵魂:雄浑中透出灵秀,巍峨中不失清韵。立时,诗兴大发,遂成《雨中登金山》:“仰看天门雾迷滴,石阶苔滑风犹湿。清露霏臂清泠泠,绿霭绕身绿依依。鸟瞰新村楼次第,抚辩残碑字依稀。盛世金雀昂首唱,东望紫气浮古齐。”

金山是一座以道教文化为主体的灵山圣地。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对各种优秀文化有着极大的吸纳性和兼容性。长期以来,儒、释、道等优秀文化融会贯通、潜移默化,成为金山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志士先贤的崇高理想;天人合一,崇尚自然,是古人的追求,也是当今的时尚;求诚求善,至真至纯,是哲人的教诲,也是我们的宏深心愿。抬首仰望,那恢弘肃穆的玉皇殿、王母宫、观音殿等佛道文化建筑,我不由想起了当代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的“正、清、和。——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斯三气也。”一直以来,金山人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的追求,在使金山人保持了“正、清、和”的同时,也使金山保持了绵延不绝得鼎盛香火。

每当我站在金山之巅,沐浴着晨光晚霞,聆听着松涛鸟鸣,仰瞻长天日、月、星、云,静观人间寒、暑、冷、暖。人生在这里顿悟,生命在这里升华……

金山,我可爱的故乡;金山,我心中的圣地! 

在杏雨洗春,山莺唤绿的清明节前,我又一次游览了金山风景区。

攀登在蜿蜒而陡峭的石阶上,浏览着沿途的风光,享受着大自然的纯美,感受着春天勃勃的生机:橘红色的山花,一簇簇满山开放;鲜黄色的络络嘴,一片片、一朵朵。苦菜芥菜绿油油、鲜嫩嫩……温暖的春日,柔柔的春风,使人陶醉!

金山是一座有着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山。许多史书中都有该山的记载。据《山东通志》载:“金山在县(指益都县。今青州市)西八十里,一曰金碯山,即魏志之金雀山也,在金岭南十余里。”《旧五代史》卷十九(梁书)列传九:(朱珍)“与淄人战于白草口,败之。青人以步骑二万,列三寨于金岭驿,珍与战,连破之,歼其师,尽获军器戎马。”山上有道教文化建筑十余处,据残碑记载:多重建于明末清初,而始建年代更久远。该山还是一座宝山。《辞源》金雀山:“山东益都境有金山,即金雀山,当今益都县西北。山出金雀石,可制砚。五代·梁·朱珍与淄人战于金雀山,即此。”《辞源》金雀石:“金雀石:砚石名。……石色紺青。质坚,可作砚。……清·沈心《怪石录》:金雀石紺青润密,叩如金玉,用墨不逮歙。”只可惜,能制砚的金雀石出于金山何处,已无可考。

金山是一座英雄的山。金山看似平实无华,而平实中隐藏着伟大。它就像中国的农民,憨厚中寓着智慧,朴拙中透出英气。大凡孕育英雄的地方,并非一定是名山大川。历史上刘邦、朱元璋、李闯王等,哪个不是生于穷乡僻壤?在历史的长河中,金山哺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英雄儿女。他们为保家卫国,刚正不屈,前赴后继。山前山后的村村寨寨、沟沟坎坎,无不浸透了烈士的鲜血。杨国夫将军、廖容标将军等领导的八路军三支队、四支队,冯毅之领导的益都县县大队,都曾在金山周边、淄河两岸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斗争过。1941年冬,益都县大队二大队与日伪军四五百人大战于北刘村崔家楼,激战三昼夜,击毙日寇指挥官及其以下官兵四十余人,取得辉煌战果。大队长杨敬坤烈士及其战友大无畏的英雄故事流传至今。人称“刘天爷爷”的抗日英雄刘振堂转战于金山脚下,出没于张周城乡,战斗在胶济沿线,神出鬼没,威震敌胆。他们光辉的英雄事迹感天地泣鬼神,给金山儿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金山儿女在保卫祖国、建设家园中奋斗不息。

金山是一座景色秀丽、风光旖旎的山。历年来,



牛山怀古

孙方之

甲午马年春三月，随《淄博日报》“与你相约”文学采风团再来齐陵。

没想到的是，本来这方离着临淄新城尚有十几华里的青山秀水之地，被不断扩张的城市步步紧逼，竟也成为了一条“街道”。

齐陵，以数代齐王多葬于此而得名。在这方土地上行行走，踏下去一只左脚，你可能踩住的是齐桓公伐楚，辚辚战车曾经滚过的辙印；迈出去一只右脚，亦可能踏到的是《诗经·齐风·东方未明》里，那一帮“折柳樊圃”夜以继日修筑国防工事的奴隶们，听到国君的命令，从睡梦里爬起，慌慌张张“颠倒衣裳”的地方。

牛山北麓，那位协助齐桓公成就一匡霸业的盖世奇才，依然在安然地沉睡着。此刻，站在管仲高大的陵墓前，俯瞰着清凌凌的淄河水一路北去。思古之幽情，一如河水奔流，不能自己。

从公元2014年，倒退2699年，是公元前685年。那一年，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齐公子小白，在宫廷夺位的血腥争斗中杀死庶兄公子纠胜出，登上姜齐第十二代君位。他为了江山社稷，在鲍叔牙的力劝推荐下，摒弃一箭之私仇，启用管仲为相。管仲知恩图报，施展治国才华，协助桓公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内政“相地而衰征”，大力发展商业贸易，盐铁收归官办，严禁私贩私冶；外交军事，“遵王攘夷”，发动攻蔡灭楚之役，迫使屈完结盟。终于在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会盟”，确立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代霸主地位。

“幸脱当年车槛灾，一匡霸业为齐开。可怜三尺牛山土，千古长埋天下才”。记得这是以前看到过，立在管仲墓前一通明代石碑上刻着的一首诗。这首诗准确生动地描绘出齐相管仲人生轨迹。遗憾的是，新整修的管仲墓，不仅看不到了那通石碑，就连高大如山的封土上，自由生长的古树花草，也不见了踪影。“弄真成假”的人为雕琢痕迹，使这堆“千古长埋天下才”的牛山之土，失却了应有的历史沧桑感。而依牛山北坡建成的管仲纪念馆，钢筋水泥建筑虽妆扮上仿古外衣，然而遮掩不住其高傻憨呆的胎质。倒是一院子杂花生树，正桃红李白，昭示着主人死后第2660个春天的到来。

展室里，讲解员姑娘清脆的解说声音，回荡在牛

山上空。一遍一遍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述说着主人公的文治武功。一个死去2600多年的人，还能让后人建祠修坟纪念。这是历史的选择，民意的选择。

出身底层的管仲，血管里流淌着民本意识的血液。为齐相的管仲，才能敢于站在人民的立场，劝谏齐桓公，要把百姓当作天。一天桓公问管仲：“为君王的人，应把什么当作最宝贵的？”管仲告诉他：“贵天”。这个天就是百姓。对于一个国家，百姓亲附，就可安宁；百姓辅助，就能强盛；百姓反对，就很危险；百姓背弃，就要灭亡。齐桓公采纳他的“贵天”思想，全力支持他的治国之策。一部经略文武，照耀古今的传世治国经典《管子》就此诞生。“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人本思想，成为历代有为统治者奉行的治国圭臬。

管仲的民本思想，使他把相位看得极轻。从不为保住相位享受荣华富贵而讨好主子。敢于当面纠正桓公的不良行为。由于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结果是上行下效，整个临淄城的人都起穿紫色的衣服。导致紫色布料疯狂涨价，奢靡之气蔓延王公贵族，百姓怨声载道。桓公执政之初，亲民意识强烈，对此十分忧虑，问计管仲。管仲告诉他，这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大王何不试试自己带头不穿紫衣？桓公脱下紫衣的第三天，果然国境之内再没人穿紫衣。这是否要算2600多年前，“打铁先得自身硬”群众路线教育的一次生动实战演示？

吟怀山川趣，幽抱托风怀。“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站在牛山北望，这片曾经演绎过或波澜壮阔或壮怀激烈历史悲喜剧的土地，吟咏李白《梁园吟》中的名句，别有一番滋味拥入心怀。曾经盛极一时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而今万丈宫阙都做了土。留给后人的，除了一声叹息，是否还有，应该重复和不应该重复的经验与教训？

一列高铁列车正隆隆地飞驰而过。历史巨轮的车辙，继续在牛山脚下叠印。

（孙方之：中国作协会员，周村区文化局原局长，现任周村区作协主席）

牛山远眺



临淄山王汉代兵马俑出土始末

王会田 贾健

在2013年5月18日第37个国际博物馆日，“山王庄西汉兵马俑”大型展览在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再现了西汉时期大贵族庄园布局 and 车马出行的盛况。

“山王庄西汉兵马俑”从出土到展出历时5年



发掘时的全景图

多，终于向世人揭开它神秘的面纱。2007年12月，在位于临淄区山王村的齐鲁塑编厂生活区扩建改造工程中，区文物局组织考古人员对华盛园住宅小区39#楼基槽进行文物勘探时，在楼基槽的东南角发现了一个不足长5米、宽2米的长条形土坑。为了搞清楚坑的大小结构以及用途，区文物局反复与建设施工单位协商，暂停了建筑施工，向槽外扩方，找出了四周范围，发现了一个长方形土坑。经勘探，从楼槽底部向下1.8米处又发现腐朽的木质灰痕迹，由此可断定，这个土坑极有可能是一个陪葬坑。文物工作人员当即对坑进行发掘清理，并于12月22日在清理的盗洞内发现了陶楼顶、瓦当、人物俑、车马俑等陶器残片。

在发掘过程中，坑的南壁上部是生土，底部有继续向外延伸的淤积土（当时认为是壁龛），为了摸清整个坑的形制，又多次同建设单位协商，清理掉上面的钢筋混凝土，果然又发现了一个长方形坑，坑的形状大小几乎与北坑相同。此后，对整个俑坑进行了

抢救性清理，同时，在清理绘图过程中向省、市文物主管部门进行了汇报，并于2008年1月26日完成了全部的清理绘图工作。

在发掘清理过程中，省、市、区各级领导极为重视，多次到工地视察指导工作。特别是临淄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坑内文物安全，安排公安干警专人负责看管，建立了24小时巡逻值班制度，维护了现场秩序，保证了工地文物安全。

山东省文物局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省、市考古专家多次到工地视察，听取汇报，讨论保护措施，制定保护方案。因陶俑坑是在工程施工中发现，鉴于俑坑东面紧靠厂房和变压器室，北为牛山路，南距胶济铁路不远，环境条件极为恶劣，不适宜就地保护，考古专家一致赞同取回室内进行有效保护。为此，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临淄区文物局联合组成考古队，于2008年5月底全部完成了俑坑内文物的提取工作。

陶俑坑为南北方向，坑口总长15.3米；坑底总长15.45米。中间有一甬道连接南、北两坑，南坑甬道顶部塌陷，形状不清；北坑甬道为圆角平顶，高1.4米；坑底部略斜，南高北低，甬道南北长2.4米、宽度与坑的相同为3.45米。南坑北壁较直，其他三壁底部略大，坑口长6.4米、宽3.2米、距地表深5.2米；底长6.55米、宽3.45米。北坑南北两壁较直，两侧坑壁底部略大，坑长6.5米、宽3.2米、距地表深5.4米；底宽3.45米。坑壁西北角上部挖楼槽时已被挖掘毁掉，其他坑角均发现有数量不等供人上下的脚窝，脚窝形状为梯形、直角三角形和不规则梯形三种，脚窝高10-23、进深6-12厘米。坑底四周发现有腐朽的木质灰痕，残存高度约1米；提取完陶俑后，在坑底发现了9排27个分布均匀，排列规整的圆形柱洞，其中，从南往北第三排靠近坑西壁的一个柱洞被盗洞打破破坏。柱洞直径18-32厘米、深在17-55厘米之间，有的柱洞底铺有青石块。另外，坑内器物下面没有发现木质灰痕迹，为细黄色生土，因此，坑内器



物直接摆放在生土上面,然后四周放置木板,顶加盖盖板,并用圆形立柱支撑。

坑内出土了一大批文物,为南北排列摆放,从陶俑坑的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从南面阙楼至院落前大门为第一部分,由5辆单辕4驾马的陶车,在驾马两侧各有一名护卫骑兵俑,同7排46骑排列规整的骑兵俑组成了车马俑护卫方阵。从院落前大门到后院大门为第二部分,约有300多名身穿铠甲、头戴盔、肩披膊、脚穿粉红色战靴、内穿长袍的步卒俑手持盾牌组成了步兵俑方阵。在院落门楼后面,步兵俑阵前面有2辆东西并列的双辕牛车。后院大门至北端为第三部分,为主人出行方阵。由8座陶楼、陶仓分列两侧和北端,楼、仓里侧有3辆单辕4驾陶马车,1辆双辕单驾陶马车,陶车马的两侧有护马和护卫骑兵俑,马前车后为站立式侍俑。该部分应是墓主人出征前恭送场面及生前生活场景。楼、仓外侧分布着陶羊、陶猪、陶鸭等动物俑。另外,俑坑四周均匀分布着64件手持盾牌的兵俑,兵俑背靠坑内文物,脸面向外,应为站岗的护卫兵。

价值评定:陶俑坑为南北方向,中间有一甬道连接南、北两坑,这类形制的俑坑为首次发现。陶俑坑内文物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骑俑及车马组成的护卫方阵;第二部分为步俑护卫方阵,主要有步兵俑组成;第三部分为主人出行方阵。该俑坑表现的是当时的达官显贵的出行仪仗。这种综合排列形式在国内的俑坑中也是不多见的。

俑坑中的“宅院建筑”也很特殊,属于三进式的“日”字形前庭后室结构。前大门偏于俑坑西侧,顶为悬山顶,东西有庇顶,两侧有门房,大门内为宽阔的庭院。后院大门与前大门前后相对,结构基本相同。院内西侧前为戏楼,楼上有正在表演的戏俑、鼓乐俑等,观赏演出的主人一边享用桌上餐具中精美的食物,一边观看表演,侍从则侍立其旁。再后面的庀顶式正堂,是院内的主要建筑,堂前有台阶,显示出其形制高大。院东侧有1座粮仓和1间庖厨,粮仓为庀殿顶,庖厨为悬山顶,厨前还有一口水井,仓厨房后有排列整齐的一群羊。院北侧为4座平房居室,悬山顶,最西端的1座有东西庇顶,房后东西两侧设有两个猪圈,东圈有两头猪、西圈有1头猪,圈前还有饲养

人员。另外,在俑坑的四周排列有64个武士俑,手持盾牌,面向外,武士俑之间大体间距相近,整体呈保卫俑坑的护卫状。坑内人物形态多,身份多,而且牲畜、器具也是种类繁多,目前在类似出土俑坑中是唯一的。出土的陶楼、陶阙大都是在东汉陪葬中出现,这是首次在西汉陪葬坑内发现,至少是在山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此类模型明器,只有身份很高的人或大家族的墓主人才可能有此陪葬。因此,从俑坑的规模、院落的布局、陶俑和车马的整体组合以及器物特征看,俑坑地处汉代齐国都城临淄附近,出土的陶阙为二出阙,随葬的车马达11辆之多,按照汉制,陪葬坑的主人当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能属于汉齐国的大贵族或王侯。

据考证,俑坑的年代为西汉早、中时期。整个坑内出土文物500多套1000余件,不仅有兵马俑、兵俑、陶楼、陶仓、动物俑,并且还有穿着服饰华丽的侍俑、牵马俑、门吏俑,以及楼顶上的表演俑和观赏俑、模仿礼器形制的陶明器等。坑内文物虽然种类繁多,但排列规整,布局清晰,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的再现。这种综合形制的俑坑,在山东首次发现乃至全国也不多见,说明了墓主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应是汉齐王国的大贵族或汉齐王的陪葬坑。这座俑坑的发现为研究西汉时期的葬制、社会制度、雕塑工艺、排兵布阵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文物提取以后,国家、省、市文物部门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2011年,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与陕西秦俑博物馆合作,启动了临淄山王庄西汉兵马俑彩绘陶器修复项目。历经三年的修复工作,500余件套彩绘兵马俑已全部修复完毕并完成复原布展,到2013年5月18日,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山王庄西汉兵马俑”展厅正式对外开放展览,吸引国内外无数游客前来观看,对当时规模如此宏大的出行场景赞叹不已。📷



修复后的山王庄西汉兵马俑

临淄春耕习俗

王毅

旧时,清明过后,气温升高,桃李花开,蜂蝶飞舞,香椿萌嫩芽,榆钱圆又嫩,梁燕正衔泥,鹊巢已双栖,正是春耕时节。

春耕最重要的准备就是“搭犊”。《辞典》对“犊”的解释为“牵引犁、耙等农具的畜力单位,能拉动一种农具的畜力叫——犊,有时是一头牲口,有时是两头或两头以上。”临淄大多数土地粘、硬,没有一头牲口的“犊”,都是两头以上。村里一户农民能喂养两头牲畜毕竟是少数,除非是几户大财主不需要联户搭犊,绝大多数农户在春耕前都要各自寻求适合的农户插夥搭犊。有的两骡搭犊,有的两牛搭犊,有的牛驴搭犊,称之为“二杆子犊”;有的两牛一驴搭犊,有的一牛一骡一驴搭犊,有两骡一驴搭犊,称之为“三杆子犊”;有的四头毛驴搭犊,称之为“四驴子犊”。邻里乡亲这种自愿插伙搭犊耕地形式,是自古传承下来,代代相传,它昭示着自然小农经济互助合作的旺盛生命力,也反映了民间自发群体的凝聚力。关于“搭犊”而引发出来的俗语颇多。如,几个火夥干某一件事,不能协力同心,使不齐劲,为首的掌握者既生气又棘手,称之为“四驴子犊扶犁匠——喊破嗓子活生气”。又如,某头头为集体办事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带领大伙埋头苦干,称之为“领犊牛”。再又如,多人伙夥干某件事,其中有些人想另立炉灶,各干各的,管这种行为称之为“拆犊”。再又如,人们对连襟兄弟,称之为“一拉杆子”。这些以“搭犊”引发出来的俗语,既形象又贴切。

要耕地先让牲口上犊,也称“套犊”。用畜力牵引木犁、铁弓犁,耕地前先把套索在地上摆好。领犊牛是使役好的耕牛,套索放右边,左边是次等的牛或驴,两套索的后钩分别挂在二牛杆上,二牛杆中间的后钩挂在耙环上,耙环钩挂在木犁上。再把甩绳放好就可以套牲口了。先套领犊牛,再套左边牛或驴(若驴可早戴上硬膀子和夹膀子),用绳拴在鼻圈绳子上,再在牛左耳上绕一圈(驴可用缰绳绕鼻梁一圈叫“打过梁”再接甩绳),两根甩绳对接握在扶犁

人手中。扶犁人右手握犁把,左手拿鞭子(也有背耕地大鞭的)和甩绳就扶犁耕田了。吆喝声和着鞭子声驱赶牲口加快行走。“哦,哦——”随着喊声,一拖一拖拉甩绳,牲口就知道略向右走;“咦、咦、咦——”牲口就略向左走;若喊“哦回——”就向右回头;若喊“咦回——”就向左回头走;若喊“驾”就是加快,某个牲口拉不平二牛杆就用鞭子打;若喊“甯——”,就是停下,使役好的牲口都懂得各种吆喝声。将犊套好后,把它挂在拖车上,再将耙和犁放在拖车上,便驱赶着一犊牲口来到地头。耕地匠需先看一看地块去年是“伏耕的”(从地块中间起耕)还是“绞耕的”(从地块两边起耕)从而决定今年与之相反而耕。如果是“绞耕”最后中间的“墒沟”较深,可“倒墒”一遭,以减轻平墒沟的麻烦。

如果是绞耕,插犁前,扶犁匠须查看“桑棵”。临淄有民俗:每块地的两头和中间都植有一丛桑棵。它是小农经济各地主户可耕地边界的标志物,由双方共同植定,长期存活,长得过大时,需双方共修“桑棵”。耕地匠按桑棵为界而耕,避免了争地边的纠纷。

提到耕地的技术,有两则谚语,其一曰“耕地不用学,两眼瞅瞅前砣。”其二曰:“耕地深与浅,动动犁把‘两楔’见效验。”搭犊耕地是牲口的重活儿,累得骡驴出汗,牛卧墒沟。因此间歇时间较长,需得等到骡驴消汗,牛“嚼沫”之后为度。耕地匠们趁机凑成





堆,打火抽旱烟,下“土棋”……

乡亲们搭耩耕地是一种纯朴的田园乐趣。秋天的早晨,田野里雾气濛濛,像挂地空中千万片待染的白纱,缓缓地摆动。“噢——嚎——”“驾——吁——”这拖长的吆喝牲口的回声在雾霭里回荡;驱赶牲口的响鞭在空蒙中炸响。远眺,晨雾中一耩耩拉犁拖把的剪影像耍皮影戏似的。近瞅,那骡马耩,长鬃劲蹄,喷鼻声伴随着“迎膀”有节奏的的摩擦声,唿唿行进,堡子如浪翻滚……扶犁匠右手扶着犁把儿,左手手腕顶在腰坎上,虎步生风,满怀的激越和豪气!双牛耩刚慢条斯理,稳扎稳打。扶犁匠悠然地踏着八字步,满脸的庄重、严肃。

俗话说“扶犁先学鞭”。牛皮拖鞭,短柄,鞭身近丈长,近把儿处有馍馍般粗,递次渐细。有爱俏的人,鞭上系有节节红缨,挥动起来如赤练横空,煞是惹眼。因用右手扶犁把儿,挥鞭只能用左手,这更增加了学鞭的难度,刚学摔鞭时既不响,也没力度,还有“缠子轱辘头”的危险,扶犁匠摔的正鞭劲而直,犹如蛟龙打挺儿,抽回来的反鞭恰似长蛇摆尾,两鞭递响如霹雳轰鸣。扶犁匠打的鞭有两种:其一曰“实鞭”,既响且重,落在牲口脊背上顿时跳起指头般粗的鞭痕儿;落在骡马的脖颈上,鬃毛如用刀剪一般,纷纷扬扬。故而扶犁匠的拖鞭经常背在肩头上,不轻易放实鞭,只要用鞭把儿轻轻敲敲犁把儿,耩上的牲口就乖乖地卖劲,听使唤。其二曰“虚鞭”,它只有如雷的响声而不着牲口的皮肉,此鞭也叫响鞭。家乡的扶犁匠们有经常放响鞭的习惯,那是他们自我陶醉的一种乐趣罢了,并非为了打牲口,故家乡有“扶犁匠打响鞭——自图快活”的歇后语。踏耩更有趣。在刚耕过的面窝儿似的土地上,扶犁匠站在耩的踏板上,一手持住牲口缰绳,一手挥动着摇鞭,随着双脚交替起落,使耩均匀地摆动拖行。耩像一把巨型的梳子,划出几十条波浪线……耩过的地块犹如一架琴弦颤抖的巨型古琴……踏着耩在松软的地面上滑行,既有坐荡椅的飘荡感,又有坐雪橇的滑行感。耩坷垃地,耩上下颠簸,比坐花轿还惬意呢!

晚归时,幻变、神奇的犁铧更有趣。每当日薄西山,晚霞映天。老牛摔着尾巴慢悠悠地拉着拖车归来。扶犁匠轻哼着梆子腔,高了兴左右开弓,放几声响鞭,惊得停树待宿的鸟雀扑愣愣乱飞,引得光腓孩子雀跃拍手……拖车上那面擦拭得油光可鉴的犁铧

在下,映物照人,变幻莫测,它简直是一面小型的哈哈镜:它能把西山上高大的柏树照成矮矮的狼尾巴蒿;它能把山上低矮的小庙照成一把硕长的出鞘宝剑;它能把晚归的绵羊照成高大的骆驼;它能把清瘦的老扶犁匠照成笑咪咪的弥勒佛。光腓孩子们当看到他们的苹果脸照成“二指脸”小鬼时,闹罢恶作剧后,在二指厚的土里打“旁连”、竖“直立”……

搭耩耕地虽说能自寻些田园乐趣,但更多的则是劳累和烦恼。用大骡大马搭耩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农户是老牛、瘦驴搭耩。笔者十六岁时就曾当过老牛瘦驴耩的小扶犁匠。

老牛在狭窄而暄松的墒沟里打别腿;瘦驴的腿像抽筋,蹄子抬得老高落不下,其乏力之状不言而喻。笔者摔的鞭既不响又无力度,打老牛一鞭,腕一斜,打瘦驴一鞭,腰一弓,把犁拉得东倒西歪,笔者只得像醉汉逛街似的“救犁”,耕的地像长虫吃了蛤蟆。一天下来嗓子喊哑了,浑身像散了架,躺在土炕上“翻饼”……然而四驴子耩的扶犁匠却是最生气、最烦恼的差事,四个毛驴搭一耩,像一串乱蹦哒的蚂蚱,叫驴们拉犁虽然无力性欲却十分亢奋,发起性来,大叫不止,东咬一口,西踢一蹄。草驴们吓得不是畏缩不前,就是奋力挣脱。扶犁匠既使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若狠打几鞭,打着的拉一膀,打不着的松一套,不是这个脱了“杆儿”,就是那具拌了腿,乱成一窝蜂似的。真是应了“四驴子耩活生气”的俗语。要说最苦最累莫过于冒雨踏耩,搭耩是几家畜力和农具的组合,确实不易,小风小雨,谁敢轻易歇耩,再加上“只耕不耩”是大忌,俗语“耕地不耩,炉碴,瓦堡”,因此不管耕了多少地必须赶在雨前耩完。当暴风雨初来时,还能拖泥条踏耩。待到暴雨倾盆而降时,就只能“畜拔响蹄”,人“跟耩踩藕”了。人畜成了落汤鸡,其苦累之状可想而知。

扶犁匠们尽管至苦至累,反而焐红了他们那颗爱犁、护犁的执著、赤诚的红心。俗说扶犁匠有两大怪:“鞋底完好帮早坏,蓑衣不披给犁盖”。凡是耕地回头、间歇,晚归“上拖”时,扶犁匠总是习惯地用右手提起犁,用左脚的鞋将犁铧擦拭几下,故而鞋帮先破。扶犁匠的蓑衣,即使雨下得再大自己也不披,宁愿自己挨淋,也要将犁铧盖个严,以防焐犁。扶犁匠们的敬业之心可见一斑。

春耕之后,为了保墒,间或再耩几次,就等雨后春播了。📖

陈姓渊源

◎ 闫树学

陈姓是中国第五大姓，总人口约为5800多万，约占全国人口的4.63%。



陈姓图腾

陈姓图腾解释

陈姓图腾由“东”和“太阳升降的阶梯”组成。东为日在水中，此木又叫（木专）木、扶木、扶桑、若木、建木。专执观察天文神职的氏族又被封于宛丘之地则称为陈氏族，进而形成氏族的图腾和国名，最终产生了姓氏。古代有陈仓、陈留、陈等，它们都是天文观测中心，也都是当时的首都或京城。陈姓始祖为胡公满。

陈姓起源

陈姓起源有四：

一、出自妫姓，其始祖为妫满，为虞舜之后裔。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周武王灭商以后，追封前代圣王的后人妫满于陈，妫满为陈侯，称胡公满。胡公满传至十世孙妫完，陈国内乱，厉公之子出奔至齐，以国为氏，称陈氏。

二、出于陈国公族后裔。陈国在妫满死后，其子孙有以国为氏，就是陈氏。除胡公满的子孙陈完这一支主系外，还有三支。一是陈哀公之子留，避居陈留。二是陈湜公之长子陈衍，避居阳武户牖乡。三是陈湜公次子全温之后陈孟琚，居于固始，其后因无子，便以颍川陈寔为嗣子，遂融入颍川陈氏。

三、由他姓改姓为陈姓。隋初有白永贵改姓陈，其后裔也多改陈姓，是为万年之陈氏。刘矫的后裔也有改陈姓的。

四、由少数民族汉化改姓。南北朝时，鲜卑族一支三字姓侯莫陈氏随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实行汉化政策，改复姓为汉字单姓，称陈氏。



陈姓始祖 胡公满



陈胜吴广 大泽乡起义

陈姓历代名人

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西汉开国功臣陈平，西晋史学家陈寿，革命家陈独秀，太平天国将领陈玉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著名科学家陈芳允等。

陈姓繁衍迁徙

陈姓对联

三君翊汉光乔梓

三阮扶唐驾竹林

◆ 郡里：颍川郡 汝南郡 下邳郡 广陵郡

◆ 堂号：二梅堂 槐星堂 槐泉堂

陈姓发源于今河南淮阳，至今

淮阳还有：老

陈户之说。

春秋时陈国内乱，

陈氏族人中的几

支分几次迁往今

河南开封县陈留

镇、原阳县杨阿乡

和固始县。西晋末年，陈氏族人先

后迁往今江苏丹阳市、浙江长兴

县。南朝时，陈霸先建立了陈国，

定都今南京。唐初，陈元光父子入

福建开辟漳州，陈氏族人入今广

东，始于南宋。其间，越南李朝女

皇李昭皇之夫陈煊即位为越南陈朝

首任君主。明初，陈氏始有族人移

居日本。明末，有族人入台湾。明

清以后，陈氏陆续有族人迁居马来

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

美、英、法、澳等国。



陈姓人口分布图

齐文化精神 (四)

变革开放 务实包容

中国图腾文化艺术研究院

八、民本精神

民本精神的首倡者是管仲,集中保存在《管子》一书中。《管子》认为,人的生命是高天厚土赐予的,理应受到尊重,这是民本思想哲学的基础。

《管子》认为,民是国家的基石,是争霸天下的根本。国家的治和乱、兴与亡都取决于民心向背,取决于统治者和国家的政策是否得到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决于民是否得到应有的地位和权利。民安则国安,民治则国治;民乱则国乱,民危则国危。这是民本思想的政治学基础。

《管子》认为:“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并进一步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



四民分居图

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仲以一树所获为喻,说明了人的地位的重要性。

管仲把民本思想应用到国家管理中去,这就使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因为,以民为本的国家管理思想的基础是重视人的价值、尊严、需要和情感。

九、和谐精神

建设和谐国家是《管子》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该书《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意思是说,用“道”养民,人民就能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无敌于天下了。

《管子》的和谐思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只是说明了道至万物的派生现象,却没有说出派生原因和原理,这不能不说是老子留下的遗憾。老子的遗憾被《管子》弥补了。《管子》认为:“只有

人事与天道相互协调,天地间的美好事物才会产生出来。”

不仅如此,《管子》进一步认为,人也是天地精华和谐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新生命,并且人的寿命也决定于和谐状态。对此,《业内》说:“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和谐地结合产生出来的。两者和谐地结合就有生命,反之,不和谐结合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规律,他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他表现出来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根源。”故而,《业内》进一步说:“和乃自生。”由此可知,《管子》第一次精辟地提出了世界万物乃至于人无不产生于“和谐”的论断。

《管子》把和谐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推演到政治学中去,便产生了和谐国家的管理哲学思想。

十、谋略精神

“因其俗,简其礼”的治齐原则;“与时变,与俗化”的变革观念;“尊贤智,赏有功”的用人方针;尚礼义,重法制的政治传统;“均田分力”,“相地哀征”的农业制度;“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工商政策;“来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财”的开放措施;孟津观兵,牧野之战的兵权奇计;“尊王攘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称霸方略;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的取胜战术;“不辱小节,耻功名不立”的人生追求;“社稷是主”,不死君难的价值取向;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



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图

处世哲学;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养晦之术;《管子》的博大,《孙子兵法》的精辟,《晏子春秋》的灵秀,稷下学说的恢弘……总之,齐国的智谋文化内容之丰富,风格之显明,在先秦时代,是其他任何诸侯国都无与伦比的,而且这种文化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历久弥新。

临 | 淄 | 于 | 姓 | 探 | 源

于有存 于启泉

于姓是当今中国第28位的大姓,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62%。它在临淄排行第6位,计2.2万余人。

于姓的起源有六:

一、出自姬姓,为周武王姬发之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武王克商后,大举分封诸侯,其次子姬诞封于邶(今河南沁省阳县西万镇邶郛村),世称邶叔。后,其子孙以国为氏(邶繁体字为“于邑”),或有去邑为“于”,是为河南于氏,史称于姓正宗。

二、其实,邶国不唯姬发之裔。《史记·周本纪》载:(周文王)“明年,伐邶。”这一史实证明,在邶叔之前早有商之邶国存在,他们同样也会有人姓邶,有人姓于。他们非邶叔之后,而为商人之后。

三、《古今姓氏辩证》载:唐宪宗时,为避宪宗李纯讳,淳于氏去“淳”为单字“于”。淳于氏为炎帝(姜姓)之后。周武王灭商,将原夏朝斟灌国君(炎帝之后裔)移封于州邑(今安丘县东北)世称州公。春秋时,州公实亡于杞,后复国,更名“淳于”,春秋末国亡,族人以国为姓,是为淳于氏。

四、《路史》载: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时,东海郡(今山东东南及江苏苏北以东地区)于公裔孙随道武帝拓跋珪(公元386年—公元408年)迁至代北(今山西省代县、繁峙、五台、原平一带)改为万俚于,北魏孝文帝元宏(公元471年—公元499年)时,复为于姓。至于东海郡于氏之源,徐州《于氏定国堂族谱》说:“据长者传言,我定国堂于氏系河南商丘迁来,今姑存之,聊备一说耳。”

五、赐姓。明朝时,赐元人巴延达哩姓于名忠。

六、少数民族改为汉姓之“于”。

(一)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鲜卑族之万俚于氏改为了“于”姓。自此,于姓大家庭便有了少数民族的血统。

(二)元末,蒙古族玉里伯牙吾氏部分族人改为于姓。

(三)清朝尼玛哈氏(满族八旗之一)改为汉姓“于”。

(四)近、现代,达斡尔、鄂伦春、土、回、高丽等少数民族多有改为于姓者。

从以上六种有据可依之于姓渊源可以看出,于姓是中华各民族和谐相处的一个大家庭。那么,临淄于姓从何而来?

《齐乘》“于氏考”云:“东齐于氏皆斥山望也。”《于氏族谱》载临淄于姓皆由荣成赤山(原名斥山)迁来,现分两支:一为皇城支,一为张店支。皇城支中金村2007年《于氏支谱序》载:“始祖原籍登州府文登县斥山人也。明(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初遭花马军变,始祖与始祖母相失。始祖母率二世兄弟三人,迁于临淄县淄水之东岸而卜居焉。其庄名傅家庄,后更名于家庄”。张店支《于氏族谱序》载:“考先祖所录旧本,斥山其本家焉。明季永乐(公元1401年—公元1424年)间,二世祖讳凤自斥山徙益都县福山,自福山又徙金岭镇。……不数传,又徙长山县东偏别墅,以姓为氏因名于家庄。”

那么,斥山于氏从何而来?

据洪水澜于氏老莹碑文《于氏附葬之记》(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载:文登“于氏系出汉东海定国之后,子孙诜诜适他所,家谱散亡不能世次。”此处“文登于氏”即文登斥山于氏,由此推知临淄于氏为汉东海郡于定国之后。

临淄于氏两支同源同宗,其人口主要分布为:皇城镇之于家、蓬科、马岱、锡腊、张家、石槽;凤凰镇之于家、梧台、刘地、九仙、彩家、王家桥、金召;齐都镇之东关、西关、葛家、东门;辛店街道之东王、于家、大武、小武;稷下街道之韩家、郑王、朱营、徐姚;金岭镇之金岭四村、披甲庵;金山镇之于家、左庄;齐陵街道之宋家等地。

现代临淄,于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中国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东方学大师于道泉,政界、军界、医界、工商界、文化艺术界杰出人物更难以计数。

(于有存:中学语文教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淄博市作协会员)



齐长城墙体的病害及成因

张艳群 程留斌

齐长城遗址是由墙体、关堡、烽火台以及部分相关遗存构成的。其中,以墙体为主体,联系山险、沟壑等自然地物,与关口、寨堡、烽火台等军事设施一起,共同形成一套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墙体根据其所在区域的修筑条件和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修筑方式和工程做法,建筑材料多就近取材。其构筑方式主要有土墙、石墙、土石混筑等类型,山岭地段多因山取石,采用石砌;平原地带多就地取土,采用夯筑;另有将前两者结合的土石混筑墙体;除此之外还充分利用山险、沟壑等自然地物代替,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历经千年的齐长城墙体,已出现坍塌、歪闪等不同程度的毁坏,局部甚至消失。研究齐长城墙体的病害及成因,针对性地进行抢救保护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建造工艺

齐长城墙体分土墙、土石混筑墙体、石墙等类型。土墙、土石混筑墙体多在平川或低洼地方用土夯筑而成,窄者十几米,宽者二十余米,分多层夯打,坚固结实。现存土墙顶部宽1~6米,底部宽7~15米,墙体因被破坏,残高0.5~5米。部分墙体的两侧有修筑城墙时的取土沟,沟底距现地表深1~1.5米。石墙在山岭之上就地取材干砌而成,西部长清肥城多为片麻岩,石薄易取,层层叠起;中部岱岳、历城等地,多用泰山青石;章丘、莱芜多用石灰岩;东部地区多用红色砂岩。墙体的垒砌有单面和双面之分,单面垒砌墙体多利用山岭自然地势。在外侧陡崖处修整砌筑石墙,内侧填塞土石或石筑,形成坚固墙体,墙体外侧陡高险峻,内侧矮平与山岭相连利于防守。双面墙体多依山岭修筑,全部用石头垒砌而成或两侧垒砌石头中间填以碎石或土石。石墙宽5~12米,现存高度1~2米,保存好者高达4米多。由章丘发现保存较好的石墙观察,长城的顶部可能采用平砌。章丘锦阳关一带石墙,外侧有垛口,应为清代修筑形成。

常见病害

切面是土墙最常见的病害,从病害形式上也可以称之为断面,常伴有掏蚀凹进现象,掏蚀深度10~40厘米,雨水冲刷和人为挖掘均能形成土墙切面。由于土墙出现切面,降低了其抵御自然侵害的能力,加剧了墙体其他病害的发生,故对土墙切面的处理,也是土墙保护加固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是冲蚀或冲沟。由于墙体表面无草皮覆盖,当所在地区发生降雨,在雨蚀作用下,表面土壤被带走,对墙体的磨蚀破坏非常严重,且一旦具有一定的汇水面,便会在墙体表面沿一定已存在的裂隙形成规模不一的冲沟。如齐长城诸城段和胶南段,墙体以土石混筑为主,长期被沿用为机耕路,严重破坏了墙体的表面结构,雨季时,在雨水的冲刷下发生严重的侵蚀作用,产生不同程度的冲沟。

此外,塌落、坍塌、歪闪、取石也是齐长城石墙体最普遍的病害。

残损成因

自然破坏包括自然侵蚀和乔木生长等原因。墙体不断受到风化、冲蚀、冻融等自然力的破坏,出现疏松剥离或碎裂,从而影响整体结构的稳定性,造成墙体失稳坍塌。勘察发现,多处墙体上有苗圃性林地。随着乔木自身生长发育,其根系直接作用于墙体,夯筑层逐渐被破坏;或石缝间隙扩大,造成墙体失稳坍塌。

此外,在勘察过程中还发现,自然生长的大面积(覆盖度大于85%)黄背草、羊胡子草等草皮对土(砂)墙或土石混筑墙有明显的水土保持作用,草皮覆盖率偏低甚至缺失的部位,冲蚀现象比较严重。

人为破坏包括耕作、修路、取土、取石等形式。自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至今,长城墙体两侧或墙体顶面被开垦为农田,形成大量墙体切面,农民耕种时常将墙体塌落坡开垦整平,甚至将墙心夯土大量采挖至墙下薄地,导致墙体破

文物生物病害研究的重要性

柯院信

文物保护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应用性研究,生物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性研究近年来受到国内外文物保护研究领域特别关注,其根本原因是文物受生物病害困扰。一般来说,任何由生物给文物带来的损伤都可以称为生物病害;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文物生物病害主要是指小型生物或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以文物,特别是一些有机质文物为营养源进行繁殖和传播,使文物常年遭受腐蚀,从而给文物造成损害;这种情况与人类的感染性疾病很相似,即病原生物也是利用人体为营养源进行繁殖和传播。

哪些生物容易危害文物

调研结果表明,我国文物生物病害危害现象非常普遍,危害范围较大;从受病害威胁的文物种类来看,大型的室外非移动土质和石质文物受生物病害的侵蚀程度和范围要大于有机质文物等馆藏文物,超出了调研前的预估;从生物病害的种类来看,主要可分为五类:地衣、真菌、细菌、苔藓类小植物和昆虫类小动物,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地衣和真菌类。地衣和真菌有极强的生命力,它们可以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生存,因此,对文物的危害范围也非常大,从博物馆内的有机质地馆藏文物,到室外的土质和石质文物,都可以发现地衣和真菌病害的存在。长期以来,文物保护单位非常重视有机质地文物,特别是对馆藏的有机质地文物生物病害防治,也建立了相对较为有效的防治方法和技术。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室

外。部分耕地直接侵占墙顶,且深翻顶部夯层,将土层摊平至长城两侧,使墙体遭受严重破坏,局部段落趋于消失。

长城墙体长期处于农田包围环境中,人们为了便利,在墙体上或其两侧开辟机耕路,造成纵向、横向或斜向切面。此外,附近居民在修筑坟茔时,往往从墙体上挖掘取土,形成不同程度的挖掘切面,对墙

体的土质和石质文物病害的防治一直以来都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难题。

为什么说文物生物病害及防治技术研究是世界性难题

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的特殊价值,而大部分文物,特别是有机质地的文物都面临生物病害的威胁,因此,文物生物病害及防治技术研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病害基本特性不能确定。文物生物病害机制和防治技术的研究面临许多技术难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病害的病源生物(地衣、真菌或细菌)多数都是不可培养的,也就是说在实验室条件下不能培养这些病源微生物,这就意味着很难确定它们的生化生理特性。不能确定它们的这些基本特性,就给病害的防治带来困难。

其二,文物完整性保持难度大。在研究文物生物病害及防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技术问题是保持文物的完整性,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都是因为这个问题而无法进行,这也是文物生物病害研究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其三,病害的快速检测不能实现。在文物生物病害防治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问题,就是病害的快速和灵敏的检测和监测技术。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但要想达到预定目标,还需要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技术和方法来克服上述的诸多难题。

体造成极大的破坏。

通过对齐长城遗址现状的勘察分析,墙体的破坏因素主要是人为破坏,在此基础上,雨水冲刷、灌木根系发育、石块风化等自然因素,加剧了破坏进程,扩大了破坏程度,使长城墙体不能长久保存。认清墙体发育的主要病害及其成因,将为齐长城的保护加固提供科学的依据。■



文物生物病害研究状况

目前,文物生物病害研究对象涉及有室外大型石质文物、壁画,也有丝绸和纸质等馆藏文物,大部分集中在石质文物和壁画生物病害的研究,其中欧美国家做过许多相关的研究。生物病害能导致石质文物及壁画在化学、物理和美学三方面的损坏,如微生物产生的色素可使文物颜色发生改变等。在石质文物生物病害研究中,涉及的病害主要为地衣,其次为石生真菌,研究的内容主要有:1、地衣及石生真菌病害的种类调查,病害物种的群落结构组成与病害程度的关系,以及病害物种的变化与大型土质或石质文物病害趋势的预警等研究,其中,病害种类的分子生物学鉴定是这类研究的基础;2、地衣、真菌在石质和土质文物病害过程中的机理研究,包括病害生物对文物的物理和化学两个方面的破坏作用,其中,物理作用是指地衣真菌菌丝穿透岩石,导致菌体直接破坏文物的完整性,进一步在水或冰侵入后造成更为深层的侵蚀和破坏;化学作用是指地衣真菌类病原生物分泌的草酸和地衣酸类物质对文物的直接侵蚀;3、生物病害防治技术和方法的研究,主要在化学和物理的两个方面,生物防治技术研究较少,原因主要是生物防治研究相对复杂,投入较大,且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有一定难度。化学防治方法主要集中于农用杀虫药的使用,但副作用会很大,因为化学杀虫剂可能会和文物发生反应,长期使用会对文物造成损伤;物理杀虫的方法包括热处理和紫外线等射线的照射,能够很好地保护馆藏文物不受病害的侵袭,但对室外大型文物病害防治的应用难度较大。因此,对有效防治文物生物病害,且对文物本身无损害的新方法、新技术的研究是文物保护研究的主要方向。国内文物生物病害研究对象比较丰富,涉及石质文物、土质文物、木质文物、壁画、丝绸纸质等馆藏文物,以及博物馆环境,其中绝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微生物种类调查,种类鉴定方法主要依靠形态学鉴定,极少涉及生物病害的机理研究;在文物修复方面主要使用化学和物理法,大多数是应急式处理,即生物病害爆发时仓促进行病害去除,有时病害种类及病害去除方法是否有针对性都值得商榷;除通过分泌醋酸纤维素酶加固出土丝绸文物的报道外,鲜见生物修复方面的研究。

文物生物病害的主要种类与范围

从文物生物病害的程度和范围看,我国文物生物病害的受害种类和范围比较广泛,有石质、土质、壁画和木质等为主的室外文物,也有木质、丝绸和纸质等为主的馆藏文物。由于馆藏文物的保存和管理比较集中,生物病害的防控相对容易。但对于室外的以土质、石质和木质文物为主的文物,特别是一些大型文物,如大佛、石刻、石窟等,其生物病害的防治难度很大,成本也很高,因此,大部分都是顺其自然。从调研结果看,我国北方由于气候干燥、温度较低,其室外文物生物病害的范围虽然也比较广泛,但严重程度较低,种类也少,比较集中在地衣和真菌类;而南方由于气候潮湿、温度比较适合生物的繁殖,其室外文物生物病害的范围不但很广泛,而且程度非常严重,几乎所有的室外文物都不能幸免;病害的种类包括苔藓、昆虫、藻类、地衣和真菌等多种生物,损害的程度也比较严重。另外,不同质地的文物面临的生物病害种类不尽相同,严重程度亦有差异。以石质文物为例,通过对中国南北方具代表性的石质文物进行现场调研发现,地衣、石生真菌、苔藓生物病害非常普遍,其中地衣病害最为明显,以癣屑衣、茶渍衣、网衣为优势类群,通常覆盖能够石质文物面积的30%~80%,中国南方比北方环境更适宜地衣的生长,石质文物的地衣病害就更为严重。肉眼可见的地衣一般覆盖在石质文物表面,但其影响绝不止于表面这么简单,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结果显示,地衣型真菌菌丝会穿透岩石表层进入岩石内部。地衣是真菌与藻类和(或)蓝细菌组成的共生联合体,本质为真菌。地衣是公认的先锋生物,原因是地衣在岩石风化和土壤形成中起主导作用,即岩石的风化是从地衣的侵入开始。地衣型真菌菌丝由浅至深,由表层至内部,对石质文物进行物理和化学的综合作用,虽然这种作用进程缓慢,但当其积累到一定程度,直接的后果是地衣彻底风化瓦解石质文物。

在馆藏文物中,雕漆器、漆器、木雕和竹器等木质文物表面易发生霉变,以曲霉属和脉孢菌属为主的霉菌为主要污染菌;除微生物外,木制古建筑中还常有白蚁等有害生物产生的病害。馆藏文物受生物病害侵蚀的典型案例是上海博物馆志丹院,其元代水闸遗址在建馆以后,由于馆内的潮湿和通风条件



问题,水闸木桩遭受严重的真菌病害,期间曾迫使博物馆一度封馆进行生物病害的清洗和灭杀。

相对于石质文物的地衣病害和馆藏文物的真菌病害,土质文物生物病害虽然危害较轻,但范围也比较广泛。其病害原因主要是环境的普遍阴暗潮湿,造成霉菌的大面积繁殖,给土质文物表面带来损伤。我国是壁画文物较多的国家,多数壁画分布于石窟寺、地下墓室及古建筑内,它们也是病害生物的主要生境之一。壁画微生物病害目前已发现的细菌包括芽孢杆菌属和产碱菌属等,真菌主要以青霉属为主。但是,这些壁画的生物病害到底是如何形成,到目前为止不十分清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在馆藏古代文物中,有机质地文物如丝绸和纸类文物等的数量在馆藏文物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类文物上的主要生物病害为霉菌,如烟曲霉、棒曲霉、意大利青霉、黑曲霉等。霉菌也广泛存在于博物馆文物库房中,如根霉、曲霉、青霉、枝霉,球毛壳霉等,严重威胁着不同种类文物的自身价值。

国内文物生物病害研究分析

我国现有文物生物病害防治技术研究总体来讲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研究还有一段距离,个中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我国古代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其二是研究经费投入少。国内报道的文物生物病害,除石质、壁画,丝绸和纸类外,还包括木质、土质以及博物馆。研究涉及生物病害种类调查、危害机理以及防治方法,但研究技术和深度等方面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1、文物生物病害的研究只在少数文保单位进行,因此对生物病害的研究也只局限于对病害生物(病源)种类分类鉴定方面,较少进行生物病害的系统性研究;对于文物生物病害的研究报道仅集中在一些特定文物点和特定类别的文物,研究相对零散;2、文物生物病害病源生物种类的鉴定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形态学观察,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研究手段仍然欠缺,尤其是缺乏形态、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系统生物学方法,因此,病害的种类鉴定常常不准确,从而不能深入的了解文物病害的损伤程度;3、生物病害侵蚀文物的机理研究尚不够深入,多数研究仅停留在种类鉴定和病害的物理清除,对于不同生物种类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机制危害文物认识不

清,缺乏对生物种类和去除生物病害研究的中间环节,即病害的作用机理的研究,因此对不同种类生物病害很难有针对性的防治技术研究。除此之外,文物生物病害和生物技术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工作,此类研究工作的滞后也是由于传统上我国不同部门研究单位的分工和布局不同,造成从事前沿生物技术研究单位与文物保护单位各自进行本领域的研究,很少有机会从事交叉性学科的研究;又由于文物保护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物保护单位很难与生物技术研究领域的科研院所进行实质性的合作研究,而文物保护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相对缺乏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背景,这使得对文物生物病害的危害范围及危害程度、生物病害致病机理及损伤机制的研究很难深入和全面的开展。

文物生物病害和防治的生物技术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面临许多世界性难题,而这些难题也就是我国文物生物病害研究和防治的方向。就目前我国文物生物病害的研究现状看,由于这个研究领域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打开不同部门之间合作研究的障碍,加大前沿生物技术研究单位与文物保护单位之间的合作。文物生物病害的研究亟待研究和攻关的课题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大型室外土质和石质文物生物病害的危害程度和范围的系统性研究,这包括病害病源的种类鉴别和病害范围的系统性调查;其二,博物馆内馆藏文物生物病害种类及病害分布的研究。馆藏文物种类繁多复杂,生物病害主要发生在有机质地文物,病害的种类和分布也相对复杂;其三,结合现在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研究技术,研究和开发快速简便的生物病害检测和监测技术,以应用于病害病源种类的鉴别和博物馆内生物病害的预警性监测。■



因俗简礼
傅东篆刻



齐国天文学家甘德虽然在人间逝去了两千多年,但他并没有消失,依然在茫茫宇宙中的探索着天文奥秘。特别是这几年,他

看到国家的载人航天事业飞速发展,屡次在浩渺的太空展示“中国力量”,当五星红旗飘扬天宇时,他感到十分高兴。特别是当他听说,有一名叫王亚平的女航天员来自山东烟台(当年属齐国)时,更是十分骄傲。

这不,很早甘德就听说神舟十号飞船将于2013年6月11日17时38分发射升空,一连几天激动地食宿不香,急切地盼望着第十个来自家乡的“贵客”。他要看看神十的威武身姿,他要看看三名航天员的英俊容貌。特别是那位来自“祖国”的女航天员王亚平,他更要亲自与他握握手,表示衷心祝贺。

终于等到了神十发射的那一刻,在地动山摇般的轰鸣声中,托举神十飞船的长征二号F火箭腾空而起,把一团橘红色的烈焰留在了湛蓝的大漠长空。甘德看到这震撼人心的场景十分激动,遥遥等待着那盼望已久的会面。

之前,甘德早已通过遥控接收器了解到,神舟十号飞船在轨飞行期间,将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进行两次交会对接。已成功与神舟八号、神舟九号飞船进行4次交会对接试验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目前已进入预定的对接轨道,在轨运行稳定,设备状态良好,静候神舟十号飞船的到来。他还欣喜地知道,作为人类开展空间探索的最佳平台,空间站是中

故事新编

甘德迎“神十” 会“玉兔”

朱航宇

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最高目标。中国将在2016年前研制并发射空间实验室,2020年前后建造空间站。

此时甘德看到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跃入世界先进行列,不住唏嘘赞叹。想想自己那个年代:科技落后,设施简陋,缺少资金等等,眼中不时流露出对科技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现代社会的羡慕。他常常想,假如自己能生活在今天该有多好啊,到时自己也一定会加入到载人航天事业的行列中来,说不定能像杨利伟等一批批航天员那样遨游苍穹,书写人生的光荣和自豪;或许自己发挥特长,利用现代功能强大的天文望远镜,可以发现更多的恒星和行星及其运行规律,以及更多宇宙的奥秘,或许能探知宇宙的起源,那该多爽啊!自己喜欢无穷的想象和神秘宇宙的探索。

噢,光顾想心事了。这时,甘德又把目光瞄向了神十,见它正飞驰电掣般地刺破长空,飞向预定地点。甘德看到神十飞船经过绕飞准备,成功实现与天宫一号的自动和手动空间交会对接时,不禁激动地拍起手来。在天宫一号,甘德终于见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他一一与他们握手拥抱、拍照、交谈。甘德说:“你们是来自中国的飞天英雄,看到你们精神饱满、英姿勃勃,我感到很高兴。你们执行我国第五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航天梦,展现了中国人‘敢上九天揽月’的豪情壮志,这是光荣而又神圣的,我为你们感到骄傲。”讲完话,王亚平很有礼貌地走到甘德面前,激动地说:“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您。上学时,就知道您是古代一位很了不起的天文学家,著有《天文星占》8卷、《岁星经》等。在恒星区划命名、行星观测与研究等方面有所贡献。您还编制了世界上最古老星表,最早发现了木卫二。我很敬佩您。您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说完两人又拥抱在一起,互相鼓励。”

接下来,甘德认真地听了王亚平的太空授课,这是航天员首次面向中小學生开展的太空授课和天地互动交流等科普教育活动,是神舟十号飞行

甘德画像





任务的一大亮点。太空课上,王亚平向中小学生展示微重力条件下的特殊物理现象,了解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加深对质量、重量以及牛顿定律等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王亚平做的精彩的实验令广大中小学生对科学如痴如醉,也令甘德大呼过瘾。

真是喜事连连。这几年,甘德亲眼见证了“神一”送上太空、“神五”载人飞行、“神七”出舱活动、“神九”载人交会对接,一路的技术突破,令他目不暇接。中国“航天梦”载着“中国梦”一路飞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旅已经迈向了遥远的太空。

神十飞天刚刚结束,“玉兔”探“宫”又拉帷幕。2013年12月2日1时30分,“嫦娥三号”探测器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甘德早早来到月球,准备迎接造访月球的首位“中国客人”。在甘德的心目中,这位“客人”一定十分神秘。

“广寒宫”没有地球人想象的那样浪漫而婀娜。甘德在这里深有体会:这里无风、无雨、无空气,昼夜温差极大。人类是不适宜生存的。甘德作为“仙人”,自然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虽然十分寂寞,但他还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十分期待。

“看到了!看到了!”甘德高兴地像个孩子似的大声呼叫着、蹦跳着。“嫦娥三号”离月面越来越近。他恨不能上去和它拥抱一下。

甘德目测,着陆器会在布满砾石和尘埃的虹湾地区落月。他赶紧驾乘小型飞船冲了过去。赶到时,着陆器已被阳光照得一片金色,月球车“胸前”的五星红旗鲜艳夺目。甘德激动地心怦怦直跳。

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由着陆器和巡视器两部分组成,“玉兔号”月球车就是指巡视器。此时甘德终于看到了“玉兔号”月球车的“庐山真面目”:它周身上下为银色,长1.5米,宽1米,高1.1米,“身材”呈长方形盒状,重达140公斤。肩部有两块可以打开的太阳能电池帆板,产生电能;脚踏六个“风火轮”,可爬20度的坡、越20厘米的障碍;一只长长的“耳朵”是地月对话通讯天线;2双敏锐的“眼睛”分别是导航相机与全景相机;一只灵巧的“胳膊”是机械臂,负责探测岩石土壤的成分;6只可独立驱动“脚”,也就是筛网轮,纯金属丝手工编织、质地轻巧、牵引性能好。他看到这样精巧的设计禁不住叫起好来,暗暗佩服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实现了规模拓展和技术跨越。

之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甘德看到“玉兔”

从着陆器上缓缓“走”到月球表面,并绕着陆器“巡视”一周,随后“玉兔”与着陆器进行“两器互拍”。然后它们的镜头又一起对准甘德拍了起来,甘德十分高兴地打出“V”形手势,表示祝贺嫦娥三号落月成功,还不时说:“欢迎中国‘客人’到来,祝你们探月成功。”为了留下这珍贵的纪念,甘德又分别与“玉兔”和着陆器合了影。

“玉兔”的到来,给寂寞的甘德带来了不少乐趣。他时常陪伴在这位“新朋友”旁边,看他怎么“走”路、怎么睡眠、怎么工作。

观察中甘德发现,“玉兔”拥有独特的“慧眼”——导航相机,负责对月球表面上的障碍进行感知和识别,并据此规划自己的巡视路径。只要遇到超过20度的斜坡、高于20厘米的石块或直径大于2米的陨石坑,“玉兔”都能自主作出判断,或前进、转弯、后退,或原地打转,以确保在“危机四伏”的月面上畅行无阻。在接下来的3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月球车将以每小时200米的速度和每一“步”7米左右的节奏巡视月面,并与留在落月点的着陆器一起,开展月表形貌和地质构造、月面物质成分和可利用资源、地球等离子体层等科学探测。虽然它的速度很慢,有些让人受不了,但甘德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有的是时间陪伴着它,有了这位“新朋友”,自己反而不会寂寞了,会天天悠哉乐哉!同时,他也会尽己所能帮助“玉兔”成功完成探月任务,争取让中国的探月工程再往前迈出一大步,实现人类最终居住月球的梦想。

七律·齐地吟(两首)

李光乐

晏婴公园怀晏相

彩壁长廊穿闹市,花坪树径贯东西。
闲游信步谈今古,揽胜观光赏赋诗。
晏相贤明启后世,倡廉反奢鉴心机。
仁德俭点谦诚信,笃志扶齐树新帜。

千秋万代颂雅风

红花翠黛嵌名城,赞语欢声漫碧空。
敬慕三朝留趣话,恭扬晏相重民生。
家余禄米济贫众,旧舍粗衣拒厚封。
品正行端昭日月,千秋万代颂雅风。



田稷子退金

田稷子幼年时父亲早逝，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从小受到母亲的严格管教。他长大成人后，不但以孝敬母亲出名，而且才智超群，当了齐国的宰相。三年期满之后，带着百镒黄金回家，高高兴兴交给母亲。

他的母亲十分贤良，没有因为儿子当国相而奢侈，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母亲看到儿子带回那么多的金子，没有显出喜悦之色，反担心地问，这些金子是从哪里得来的，田稷子说是为相三年积攒的俸禄。母亲说：“你做官三年，难道不吃饭，不穿衣服，不花销吗？”他被母亲问得张口结舌，脸上露出羞愧之色。母亲教训道：“我从小就教育你，做人要有德行，长大当官要清正廉洁，这些话难道你都忘记了吗？你老实告诉我，这些金子是哪里来的？”田稷子不敢再隐瞒，只得老实告诉母亲，这些金子是手下的官员送给自己的，自己没舍得用，带回家孝敬母亲。母亲听了生气地说：“你身为一国之相，国家给你那么高的报酬，国君又那么信任你，你应该一心为国家办事，取信于民，可你私心这么重，竟敢收手下官员这么多的金子，你这是犯罪。”田稷子听了母亲的话，辩解道：“我是为了孝敬你，让你欢度晚年才这样做的。”母亲听了他的话，更加生气，严厉训斥道：“你这样做，是对国不忠，对母亲不孝，你收别人这些金子，不但害自己，也是害全家人，我以后也要随你一起坐牢的。”田稷子见母亲如此动怒，知道错了，连忙跪下，请求母亲原谅自己的过错。

田稷子把金子退还之后，又到宫殿禀报此事，请求齐王治自己的罪。齐王听说田稷子有这样贤良的母亲，就赦免了他的罪过，让他继续为齐国之相。他的母亲也得到齐王的奖赏。

田稷子之母教子退黄金的故事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

齐国故事二则

曹承章

晏子酒宴识诡计

战国时期，晋国强大之后，想寻找机会攻打齐国。为探求虚实，晋王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范昭带了好多礼品送给齐王，齐王高兴地接受了礼品，在宫殿大摆酒宴招待，并让国相晏婴及群臣作陪。宴会气氛欢快而和谐，齐国君臣和晋国使者一起开怀畅饮。在大家喝得酒酣耳热之时，范昭提出一个非分要求，要用齐王的酒杯喝一杯酒，以表示晋国和齐国的友好关系。此时，齐王早已喝得头昏脑涨，神智迷糊，完全忘记了朝廷的规矩，当然更不会发现范昭换杯喝酒的诡计，就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让随从在自己杯中倒满酒，递给范昭。范昭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并把酒杯恭恭敬敬还给齐王，脸上却显出居心叵

测的表情。范昭的表演当然瞒不过旁边晏婴敏锐的目光，他当即识破了范昭的阴谋，大声命令随从把齐王的酒杯扔掉，再换一个的。原来按照当时的礼仪，酒宴上等级分明，君臣各有自己的酒杯，材质形状不同，不能互换，国君的酒杯更不能让一个外国使者随便使用。如果一个国君的酒杯被他人随便使用，不但表明其昏庸无能，也暗示这个国家制度混乱，手下没有能臣，可被其他国家随意戏弄。晏婴的及时提醒，让范昭心里一惊，认识到名声远播的晏婴绝非等闲之辈，遇事果断，明察秋毫，确实不好对付。范昭精心设计的阴谋被识破，只得假装自己喝多了，慌忙向齐王赔罪，向晏婴认错。

范昭回到晋国，向晋王陈述了出使齐国的经过，并提醒晋王，有晏婴在齐国执政，不能攻打齐国。晋国国王因此放弃了攻打齐国的念头。

孔子听说了此事，对晏婴大加赞扬：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意思是说：晏婴真厉害，在酒宴上表现出来的才能，让千里之外的人都感到惊恐。这就是成语“折冲樽俎”的来历。



宁戚，才华出众。他看到诸侯国互相争战，弄得民不聊生，便决心辅佐一位贤明君主，干一番富国强民的大事业。他听说齐桓公有宏图大略，重用人才，便决心到齐国来。可宁戚家里穷。卫国离齐国路途遥远，怎么办呢？他便给要来齐国做买卖的商人做了赶车夫，他们在路上走了许多日子，这天傍晚赶到了临淄城西。听说城门已经关了，便在大路旁康浪河畔一家客栈停下来住宿，等明日进城。

到了零晨时分，忽听人声喧哗，从城里走出许多人，前边有武士开路。宁戚一打听，才知是齐桓公出城去民间访贤。宁戚认为机会到了，便一只手给

巍巍宁戚冢



牛拌草，一只手拍打着牛角，唱起《牛角歌》。

齐桓公正走到这里，听得这歌声，觉得此人出言不凡，颇有来头，便命管仲去察访。

第二天，管仲去见宁戚，说明来意，不料，宁戚只是说：“浩浩乎白水。”管仲不解其义，身为一国之相，又不好再问，回到家里愁得食不甘味，坐卧不宁。管仲妻问有什么事愁得这样，管仲叹口气说：“咳，人家说的话，我都听不明白，你一个妇道人家能懂什么。”管仲妻子不服气地说：“不要瞧不起人。老、弱、残、少者，一样能做大事。昔日先君姜太公，70多岁了，还在渭河之滨钓鱼，80岁才被周文王拜为太师，伐纣灭商，为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90多岁封于齐国当了国君。您能以为他老了就不行吗？商朝初期，有一个叫伊尹的人，原本是有莘氏随嫁的一个奴隶，汤公见他有能力，立他为三公，他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你能以为他出身微贱就无能吗？圣子5岁，帮助禹治水，出了好多好主意，禹都非常佩服他，你能以为他年幼就不行吗？牛犊刚生下来，站都站不稳，但用

齐文化系列小说

霸主

马新亭

不了几年，就胜过其母，你能以为它弱就不行吗？”管仲被妻子说得满面羞愧，便对妻子说：“桓公让我去察访一个从卫国的人，这个人叫宁戚，我去了后，宁戚只说了一句‘浩浩乎白水’，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故忧愁万分。”妻子一听，微微一笑说：“人家不是已经把意思明明白白告诉你了吗？一首诗里有这样的句子‘浩浩白水，倏倏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定，从我焉如。’意思不是明摆着愿意听齐王的召唤吗？”管仲恍然大悟，更加佩服宁戚的才华，立刻上朝奏知齐桓公，说宁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建议宁戚做大司田（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长）。

不料，好多大臣不服说：“宁戚是卫国人，卫国离这里又不远，不过五百里路，不如派人到他的家乡打听打听，如果他确实确实是贤能之人，再任用也不晚。”

齐桓公说：“不可，如果派人去打听，假如他得罪人太多，那里的人肯定过多的是说他的种种陋习，说的他体不完肤，这样他的才能和美德就被掩盖了。假如嫉妒他的人太多，也会往他身上泼脏水。作为一个人谁又能做到十全十美呢？到那时我们又怎么能敢重用他呢？用人就要用人之长，而不是用人之短。”

天下人听说此事后，怀才不遇的人才纷至沓来，齐桓公以礼相待，唯才是举，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文臣武将尽忠报国，辅佐齐桓公成其霸主。齐国由此从一个弱国，成为春秋之霸、战国之雄。

七律·老有所乐

刘长胜

老年找乐度余生，手捻银须唱太平。
仄仄平平歌盛世，抑扬顿挫咏心声。
灯前苦练谱佳句，桌面勤习绘丹青。
皓首云开多砺志，夕阳熨染晚霞红。



文史知识

圣旨

圣旨是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其轴柄质地按官员品级不同,严格区别:一品为玉轴,二品为黑犀牛角轴,三品为贴金轴,四品和五品为黑牛角轴。

圣旨的材料十分考究,均为上好蚕丝制成的绫锦织品,图案多为祥云瑞鹤,富丽堂皇。圣旨两端则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作为历代帝王下达的文书命令及封赠有功官员或赐给爵位名号颁发的诰命或敕命,圣旨颜色越丰富,说明接受封赠的官员官衔越高。

圣旨的长度历代并没有硬性规定:长的可达500厘米,短的约为200厘米,宽度一般约33厘米。上面印有皇帝的玺印。明清两代圣旨的诰命和敕命,都是由翰林院撰拟的。明清两代圣旨的书写者称为“庶吉士”,是在进士中择其最优秀者,由皇帝亲自评点,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就曾被录用为“庶吉士”。所以,圣旨的文字书写端庄秀丽、圆润飘逸,圣旨的行文极为简练,几乎达到无可增删的程度,其内容又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古代的布币

中国古代货币历史悠久,它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产生的。一般认为它产生于夏商时代,到清朝末年终结。先秦时期的三晋地区,曾流行一种仿照农耕工具的铜铸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布币。

布币从最初的仿照农具形状,到逐渐摒弃体大笨重、耗费原材料的缺点,从而发展出一条布币自身的币形历史,这在后人看来,除却历史价值、考古价值之外,还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美学价值。西周以来的布币在经历了原始布——空首布——平首布后,出现了尖足布、方足布、桥足布、圆足布、三孔布和长布等,形式繁多。其中,方足布的特征是方肩、方裆、方足。方足币是战国时期一种流通区域最广、品类丰富,存世数量最多的先秦铸币。币文主要是三家分晋的韩、赵、魏三国的城邑的名称。

古代的“普通话”

古代的普通话被称为“官话”“正音”或“雅音”。一般来说,首都话即官话,以长安为首都,官

话自然是秦腔;以洛阳为首都,官话自然是洛腔。魏晋南北朝时,洛阳官话又被称为“中原雅音”或“中原正音”,长时间地占据着正统普通话的地位。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民南迁,朝廷在建康(南京)定都,吴语开始受到重视。吴语结构复杂,其基础是百越话,掺杂部分荆楚方言,这与春秋晚期楚灭越后迁民于江东有关。

东晋在江东建国,身处吴语氛围;同时,南渡诸人又带来了“中原正音”,两者相融合,形成了当时的官方语言“江淮话”。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南人”和“北人”概念的提出与分野同样也是从这个时期正式开始的。当时的音调之争正是这种意识自觉的体现,由此带来的文化分野,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日后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

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是中国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他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立黄、白、红、蓝四旗,旗皆纯色,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创建了八旗制度。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

清朝的八旗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中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的主体是骑兵。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其特点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于八旗者皆可以为兵。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实际上,清代兵有常数,饷有定额,随着满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并非所有满族人都能披甲,而到后来披甲的人数占满族人口的比例愈来愈小。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共存在296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



用。然而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古代的“冤家”

在古代，“冤家”这个词的含义有两种，一种是指仇人，另一种是指伴侣或情人。这样看起来，“冤家”一词的含义很是有趣，以“冤家”比喻仇人，比如“冤家路窄”“冤家死对头”，众所周知，这里的“冤家”指的都是仇人，这是恨之深，而“冤家”也可以用来比喻伴侣或情人，比如“小冤家”，这则是爱之切。仇人和伴侣或情人，一个是恨到深处，一个是爱到极致，原本意思相反的二者却都可以用“冤家”一词来说。

唐朝的《朝野僉载》一书是最早记载“冤家”一词的史籍，这本书中写道：“此子与冤家同年生”，这里的“冤家”指的是仇人，因此可知，“冤家”的最初含义是指仇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冤家”一词却慢慢演变成了对伴侣或情人的称呼。

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冤家”一词常常用来称呼那些被一个人似恨而实爱、给自己带来苦恼而又舍不得的人。于是，古代的民间就有了“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何时休”的俗语，这里的“冤家”指的就是相互爱慕的男人和女人，是一种昵称。

掌故

按照字典的解释，掌故多指对历史人物故事的考证叙述，带有一定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掌故”原本是指一种朝廷命名的官职，准确点说，是汉代始设的一种国家文职官名。

史载，汉朝时，国家设置了一种名为“掌故”的官职，隶属于太常。太常下属太史，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太史的长官叫太史令。国人俗知的司马迁，就是汉代有名的太史令。太史令手下有许多官员，其中就有“掌故”一职。“掌故”专门负责管理收集国家历史故事，因其工作性质是掌管国家的“旧事”，所以称为“掌故”。“掌故”是汉代文学官的一种，但比文学掌故略高。掌故因为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政府官员，因此，国家定期给他们发“工资”。

汉代“以石论秩”，即官员以“石”表示职级的大小来领取俸禄，掌故也不例外。在汉朝，有些掌故是可以传袭的，掌故也由此成为“职业掌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便是太史令(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所以其父病逝后，司马迁承袭了太史令一职。《史记·龟策列传》中就有“孝文、孝武因袭掌故，未遑讲试”的记载。

由于掌故属于一种朝廷必需的史官，因此，历朝历代都很看重。唐代时，国家对掌故一职又做了细化，工作分工更为明确。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朝廷设有“内侍掌故”和“州郡掌故”，分别负责宫廷及各地流传的故事、轶闻、考证等。一上一下，一内一外，一朝一野，将国家的朝野逸闻、民间逸事等一网打尽，全行记录下来。唐代时的翰林学士也有兼掌历史沿革的职能，所以也泛称“掌故”。到宋、明、清三朝时，凡收集有关上层社会人士的轶事、朝野逸闻、民间传说等的人，都统称“掌故”了。而且，掌故的词性也发生了变化，由官职名变成了逸闻轶事、坊间趣话。

风筝

风筝，古称纸鸢、纸鹞、鹞子。据古书记载，风筝的出现，最初是由于生产和军事的需要，相传春秋时代的公输般就曾“削竹为鹞，成而飞之”，以侦察宋城。在唐朝赵昕的《息灯鹞》、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欧阳修的《新唐书·田悦传》中都有风筝与军事相关的故事。后来由于以木制鸢质量过重，人们便用纸来代替木料制作风筝，称其为“纸鸢”。五代时李邕在宫中放纸鸢时，还在鸢头栓上一个竹笛，经风一吹，声似箜篌，遂叫“风筝”。

风筝大体分为硬膀和软膀两大类。从式样上分，可分为三种：动物类，如蝴蝶、蜈蚣、青蛙等；人物类，如孙悟空、仙女、胖娃娃等；器物类，如扇子、星星、白菜、花篮等。有的风筝还拖有一条长尾巴，既起平衡作用，又作装饰。就风筝工艺来讲，以北京和天津的产品最佳。北京风筝多为单层，做成蜻蜓、飞鸟形，色彩较天津更为浓艳，对比也越发强烈，中间色多用白，灵巧，轻快，另具一格。天津风筝大多为组装形，可以拆装折叠。另外，江苏南通的大板鹞也别有风情。山东潍坊素有“风筝城”之称，早在明代风筝就已进入兴盛时期。如今，潍坊的国际风筝节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外国风筝高手和游人，风筝已成为开展国际经贸交流的媒介。风筝不仅是民间工艺品和玩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起到特殊的作用。

古籍

凡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线装书都可称之为“古籍”。最早的古籍出现在唐代,以“日历”的形式流出,到宋代开始成书。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就中华古籍收藏实力而言,国内首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次之,海外则以哈佛燕京图书馆为最。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前收藏的包括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中华善本有4000部,四五万册左右,仅明刻本就有1500部,其中国内各大图书馆空缺的版本就有189部之多。

古籍修复的原则

1、最少干预原则。就是在古籍的修复中,摒弃传统的整卷整叶托裱的方法,对文献各部分的残破现状做具体分析,对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尽量少地在藏品上添加修复材料,避免因过度修复而造成的保护性破坏,尽量保留古籍文献的各种研究信息。

2、整旧如旧原则。就是在修复中尽可能保持古籍文献的原貌,保留文献的装帧风格。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并不是企图恢复该文献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是尽可能保持该文献修复前的原貌,就是

战国双龙双系陶瓶

文物天地



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文献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决不使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

3、可逆性原则。即修复措施是可逆的,可重复的。如果将来发现有更科学更适宜的保护修复技术,随时可以更换修复材料,回到修复前的原来状态。同时可逆性原则对于我们改正工作中的失误而尽量不损害古籍非常必要。

4、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即修复中所用的修复材料(纸张、线、颜料、墨等)必须与原始文件的材料有一定的色差,避免与藏品本身固有的历史信息混淆。

金银币收藏五不宜

1、发行量过大的金银币。发行量的多少是决定某个金银币品种能否升值的首要因素。从绝大部分金银币的价格走势可看出,金银币的发行量与价格基本是呈反比关系,即量少价高,量多价低。

2、狂炒过已回落的金银币。市场里常有一些品种受到主力大

力追捧而成为“黑马”。但一遇庄家出货,这类“黑马”价格便会大幅下跌。虽说有时跌幅已很深了,但仍不适宜普通投资者买进,因为狂炒过已回落的金银币,在高位会形成大量的“套牢族”,今后其价格一旦上涨,解套族就会倾巢而出。

3、设计平庸、制作不精的金银币。金银币作为一门独特的投资艺术,市场对其设计水平和制作质量是十分挑剔的。一些设计新颖,工艺先进,制作精美的金银币极易受到市场关注,而设计平庸、制作不精的金银币则不宜投资。

4、不具有独特题材的金银币。炒金银币其实就是炒题材,有题材就会有庄家肯于进场,不具有独特题材的是很难激起市场炒作热情的。

5、品相不佳的金银币。金银币投资还应该讲究“品相”,如果碰到有水渍、污斑、变色、生锈、霉点等“品相”不佳的现代金银币,要坚决回避,即使这些金银币的销售价格低于正常的价格,仍不可贸然买进,因为“品相”有问题的金银币到时候很难出货。

漆器的收藏养护

漆器是一种制作精美、风格独特、具有较高观赏和收藏价值的艺术品,目前收藏、拍卖行情日益看好。漆器收藏应注意对其进行有效的保养,这样才能使其长久保持艺术风采。

漆器的胎质不同,保护的方法也不同,例如以金属为胎的漆器,胎质较为坚固,不易损坏,所以对这类漆器以保护漆层为主。以木、竹为胎的漆器,不仅要注意



保护漆层,还要注意保护胎体。

漆器在收藏时应注意避免阳光曝晒、烟熏,收藏室的湿度和温度不宜急剧变化,避免忽干忽湿,最好把漆器放在温度和湿度比较恒定的房中。许多制作精美的古代漆器,即使长期埋藏在潮湿的地下或干燥的沙漠中,也能保持光艳如新,但出土后会因环境湿度变化大而出现变形、变色等现象。这是因为空气过于干燥,漆器容易发生断裂,湿度过大,则易出现变形和脱漆。

收藏时应特别注意,不要把漆器放得离地太近,也不要将其放在铺设海绵的地上,因为地上湿气大,海绵的吸水力又比较强,久置于地易使器物发霉脱漆。

在移动漆器时应轻拿轻放,注意不要与坚硬、锐利的物体碰撞或摩擦,避免剧烈的震动。因为有的漆器在地下埋藏千年,胎质易变得疏松,稍不注意,就会损坏。同时,盐、碱等物质对漆器有一定损害,要注意远离这些东西。

漆器的收藏还应注意防尘。如果有灰尘积淀,可用鸡毛帚和柔软的毛刷轻轻清理,或用棉纱布擦拭。

文玩菩提子颗数的含义

佩戴文玩菩提子的讲究很多,包含了各类文玩菩提子的意义以及不同数目串珠的穿法。实际上,文玩菩提子的颗数,在佩戴时多者千颗以上,少者唯有一颗而已。串珠的颗数不同,其所代表的意义也不同,但每一种串法都是有讲究的,并非随意成串。

1080颗:这是目前可查的最大数量的串珠数目,1080颗串珠暗合了“前六后四”共10界间的1080种烦恼,其中每界为108种

烦恼。这种穿法更多地出现在法事大会或其他的重要场合之上,往往由一些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上人所配,平日里难得一见。

108颗:相对而言,这种数目的串珠较为普遍,大家在很多佛珠上都可以见到,暗指消除108种烦恼,求得身心安定,化做无欲无求的姿态,是很多修佛者佩戴文玩菩提子所选择的数目。另外,108也是道家文化中天罡地煞的数目总和,佩戴亦有护身之意。

54颗:此串珠数源于菩萨修行中所需感悟的54处阶位,即“十信”“十住”“十行”“十地”“十回向”和“四善根”。

42颗:此数目和54颗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也说的是菩萨修行中所要感悟的阶位数目,只不过用“等觉”“妙绝”两颗串珠代替了“十信”“四善根”,同“十住”“十行”“十地”“十回向”共成42颗串珠。

36颗:36颗是108颗的精简版本,主要是为了便于人们随身携带,另外也传达了以小见大、化繁为简的奥妙哲理。

27颗:每一颗串珠代表一位佛学圣者,合计为佛家27圣贤,源于小乘派系中“四向四果”之论。

21颗:覆盖了菩萨修行自大涅槃到成佛所经历的21处阶位,即“十地”“十波罗蜜”和“佛果”。

18颗:这一数目现在比较常见,很多串珠都以此为准,民间也有“十八子”的说法,数目吉祥而且便于携带,故而颇为常见。从佛学的角度上说,其指的是佛家的十八罗汉抑或是佛祖的18种变化。

14颗:同18颗一样,这一数目也很常见,尤其是现在很多青年人极其青睐这一种串珠,借用了其“十四忍”的寓意。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其代表的是佛家所说的“十四无畏”,体现的是劝诫

修行的理念。

12颗:在佛学中,常有“十二因缘”或是“二六之缘”一说,世间之事多为因缘而生又为因缘而去,而这12颗串珠就表明了这“十二缘起”。

6颗:分别代表了耳、鼻、舌、眼、身、意这“六根六情”,指代的是人的六种感官六种感知。

3颗:代表是“佛”“法”“僧”这三宝,多为虔诚的佛教信徒所持有。

1颗:一般来说,一颗珠往往比较贵重,挑选具有很高物质价值的珠子,表达了佩戴者的艺术审美品位,可以贴身携带或是悬挂在家中,体现了人们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

印章的收藏与鉴赏

首先能够保存至今的名家印章越来越少,收藏价值越来越大,但实际上收藏爱好者仍然有捡漏的可能。原因是不少名家的印章印文不会直署其名,不懂行的卖家在收到印章后,只要有所盈利就有可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手,这就要看收藏者的眼光和运气了。

其次是好的印章石本身就属于稀缺资源,在收藏市场上的售价逐年升高,增值潜力巨大,更何况带有历史、工艺和人文价值的老印章。杭州西泠印社近几年拍卖的印章,屡创新的价格纪录。因此,印章收藏爱好者不能放过任何一方石材上佳的印章,毕竟“佳石不易得”。

第三是篆刻本身不同于大众艺术,其社会普及面不如字画等收藏。很多收藏者只把印章作为判断字画真伪的一个特征,而不是分门别类地予以研究,真正懂印章的人还是不多。新介入印章收藏的爱好者,也有可能淘到上品的老印章。■

乐游博物院 品鉴文化餐

徐大伟

“听说齐文化博物院临淄古玩城和几家民间艺术馆开馆了,走,去看看。”去年第十届齐文化旅游节期间,朋友约我一同去新建于太公湖畔的临淄古玩城和几家民间艺术馆参观。我早就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一路驾车奔来。

但见这里已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来自市区的男女老少,带着笑颜和期盼,怀着与我一样的心情,步入齐文化博物院,想一品这顿丰盛的文化大餐。

我了解到,齐文化博物院主要包括齐文化博物馆、足球博物馆、民间艺术馆聚落和文化市场4个部分,规划占地445.7亩,建筑规模13.1万平方米,总投资10亿元,其中,齐文化博物馆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足球博物馆1.1万平方米,民间艺术馆聚落6.5万平方米,文化市场2万平方米。

民间艺术馆聚落和文化市场由9组相对独立的建筑组成,分为16个民间艺术馆和一个临淄古玩城,分别是文源艺术馆、德龙古陶艺术馆、观美艺术馆、齐鲁美术馆、临淄鑫和艺术馆、大顺文化艺术馆、翰文堂美术馆、墨雅文化艺术馆、齐文艺术馆、檀林艺术馆、红太阳珍藏馆、云志艺术馆和临淄古玩城等,组成了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公益艺术馆群。

我看到现在的齐文化博物院有很多场馆还正在建设中,即使开馆的也没有完全装饰好,道路也没有修好,为防止下雨泥泞,只是铺了一层厚厚的石子,但这并不影响我参观的心情。

我们首先来到临淄古玩城参观。进得门来,见这里已是装饰一新。新颖的设计、新装的店面,考究的展室、丰富的展品……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有些目不暇接的感觉。从一楼到三楼,展品琳琅满目,有青铜器精品展、地方币展、“七彩云南”翡翠展、蹴鞠文化展、图腾文化展、全国各地画廊、文物、艺术品交易拍卖活动、临淄文学艺术成果展、淄博特色旅游产品展销、齐风——首届中国画名家邀请展、书画精品展以及齐瓦当、拓片、烟标等数以万计文物文化精品,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人们拿着相机、手机不停地拍照,孩子们则好奇地询问着古玩的来历和用处。大人

们有的欣赏品味,有的商谈交易,不亦乐乎。

来到文源艺术馆、德龙古陶艺术馆、观美艺术馆,看到这里有明清瓷器展、油画展、雕塑展、山水画精品展、明清状元匾额展等。在明清状元匾额展前,我看着20多块古色古香、字体飘逸遒劲的匾额,凝视着、琢磨着、比划着,想象着它的由来、它的主人是谁和它们曾带给主人的骄傲与自豪。我也禁不住要感谢收藏者把这笔文化遗产保存的这么好,能让今天的人们一饱眼福。

来到齐鲁美术馆,进入展厅感到很有气派。这里展出的是从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中挑选的200多幅高水平作品。特别是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的巨幅画作《丰乐图》和工笔画《马背上的民族》,格外引人注目,它们都是首次在山东省内展出。宏大的尺幅、高超的画技,使得人们纷纷拍照。

鑫和艺术馆举办的是明清古字画展、碑帖展和迟浩田、张万年等将军书画展。古字画与现当代字画交相辉映,别有风趣。我虽然不懂字画,但还是不愿只看看热闹,尽力运用自己掌握的点滴知识,发现特色,寻找不同,久久驻足品鉴,不愿离去。直到朋友再三催促,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虽然转了几个馆有些疲劳,但还是想多品尝一下这顿难得的文化大餐。接着我们又来到大顺文化艺术馆。

大顺文化艺术馆带给我的是更多的震撼。大顺集团聘请国内具备专业实力的展馆设计专家科学规划展陈,由陶瓷文化展厅、铜器文化展厅、古钱币银器文化展厅、床文化展厅、牌匾文化展厅、屏风文化展厅和学术交流厅等14个厅23个区组成。铜器文



齐文化博物院临淄古玩城暨民间艺术馆聚落正式开馆



化展厅主要收藏自春秋至明清时期的青铜器等达百余件；陶瓷文化展厅主要收藏自汉代以来至明清时期为主的陶瓷器千余件；古钱币银器文化展厅主要收藏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古钱币银器千余件；床文化展厅主要收藏明清时期的床百余件；牌匾文化展厅主要收藏清代的牌匾百余件；屏风文化展厅主要收藏明清屏风百余件。2011年9月，CCTV《寻宝》栏目走进临淄，鉴宝专家对大顺文化艺术馆的收藏给予高度评价并一致推选山东大顺集团党委书记、总裁李嘉才为《寻宝》城市文化联谊会会长。大顺文化艺术馆，是李嘉才先生历经几代人精心收藏的结晶。据了解，大顺集团坚持文化立馆、公益立馆、科技立馆的办馆方针，广泛收集、科学保护、积极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历史文化研究，加强与业界其他博物馆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着力推进文化发掘、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努力将大顺文化艺术馆打造成为藏品丰富、极具特色、服务多样、水平一流的博物馆。

我边看边佩服总裁李嘉才坚持不懈搞收藏、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深厚的文化情结。他“创造”的财富，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了，我心里生出深深地感谢。

好戏还在上演，精彩不断呈现。来到齐文艺术馆，这里有齐国文字展、中国国家画院院展。齐文艺术馆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包括齐国文字发展史、石刻、书画艺术馆三大部分，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管理系统，使齐国文字博物馆成为国内一流、设施先进的专题博物馆。青铜铭文、陶文、瓦当文、玉石器文、货币文字等等，都彰显了齐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

在红太阳珍藏馆，也是人流不断。人们带着心中的那份“红太阳情结”，纷纷驻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领袖像前，进入特殊的历史回忆和对伟人的思念。来到云志艺术馆，看到正在举行“当代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风光摄影展”。徜徉在这光影变幻、色彩灵动的世界里，你会为他们野外采风的辛劳而赞叹，也会被他们深入生活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会跟着他们的观察与思考而开启大脑，也会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而燃烧激情。在享受饕餮视觉盛宴的同时，透过一个个被定格的精彩瞬间，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美丽大自然的清新呼吸，触摸到时代脉搏的强劲律动，也似乎听到了历史的沉重步伐，看到了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而伴随这一切的，是每一位摄影艺术家艰辛跋涉的生命历程。

我与朋友品尝这顿文化大餐，历时5个多小时，虽然有些累，但累并快乐着。我已在热切盼望着今年齐文化博物馆和足球博物馆的开馆，这顿文化盛宴我一定会再来品尝，相信滋味一定不错。到时我们一块来吧！

今年，齐文化博物院向社会开放后，群众可通过游览，了解齐地历史，感知历史事件和齐地风情。这一集中展示齐文化的艺术馆聚落将成为临淄区齐文化旅游的新地标。齐文化博物院项目是临淄区的文化龙头项目。齐文化博物院通过优化整合旅游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服务功能，以淄河为纽带，串联周边文物遗址和旅游景点，将形成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有机结合、相互支撑的大旅游格局，打造特色更为鲜明、氛围更为浓厚、服务更为优质的旅游名牌，间接带动商业购物、餐饮、住宿、娱乐等产业发展，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东周殉马

胡云丽

马年，人们不吝惜对马的誉美之辞：

龙马精神、一马当先、马到成功……

此时，我想起了那一匹匹侧卧沉睡的东周殉马

是它们，让齐国有了威加四海的雄风

马上千秋，峥嵘岁月

是它们的光荣与自豪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东周殉马，沉淀了岁月的沧桑

虽扬鬃奔驰不再

但仍让人禁不住打开久远的记忆

在那个争霸称雄的年代

它们是战场上的英雄

战马的职责，永远是一往无前

万 化 山 上 遥 想 火 牛 阵

于永军

从即墨西去10公里许,有村曰“牛齐埠”。公元前279年,燕齐两国交兵,即墨守将田单,在这里用“火牛阵”出奇制胜,一举击溃强大的燕军,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首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该村因此而得名。

牛齐埠村旁有座海拔不足100米、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土山,名叫“万化山”,传说是火牛阵的发生地。癸巳年白露时,我站在万化山上,迎着猎猎西风,衣袂如战旗逆着时光招展,心神也随那长空的流云荡开了去。

山坡上的蒿草茅叶已经泛黄,野藤蔓弃下的小红果,草丛中撒落的羊屎蛋,随着肃杀的秋风,沁进2300多年前驻扎过军帐的土层里。秋意在午后的空气里明明灭灭,呼吸间已嗅到历史风烟的味道。当年,燕国驱兵南下,大举讨伐齐国,一路势如破竹,短短半年间,攻下齐国包括都城临淄在内的70多座城池,最后只剩下莒城和即墨两地。齐王逃于莒城,燕军攻打数月不下,又转攻即墨(今平度古岬镇一带)。揣摩燕军当时的心思,或许认为这是个软柿子,未料到竟会在此遭到毁灭性打击。眼下,站在万化山上,西北望,即墨故城迄今尚存的城墙遗址,坍塌残破,但依稀可见昔日之规模,在秋光里的剪影黝黑如铁,凛然不可侵犯。

肯定有这么一天,已然带领即墨军民顽强守城三年的田单,又登上了观敌瞭阵的城楼。面对燕军铁桶般的围困,他在苦苦思索以弱胜强的招数。突然间,不知谁家的牛刨了蹶子,在城里街巷间疯狂。看着纷纷躲避的行人,田单眼前不禁一亮,灵感之神瞬间接通了苦思的心闸。于是,战争史上第一个神奇的进攻样式——火牛阵诞生了。

不知那个夜晚,天上有没有月亮,是否有寒风刮着,但我敢断言,喧闹的燕军大营已经静了下来。而此时,经过一天的精心准备,即墨城里1000多头牛,身上披戴五彩,牛角上捆着尖刀,尾巴上缠着浸

透油脂的易燃物,被5000名扮成天兵神将模样的士兵,从挖开的通往城外的豁口中悄悄赶了出来。只听一声梆响,牛尾巴上的易燃物悉数点燃,烧疼了的牛疯狂地冲向了燕营,“天兵神将”挥舞着大刀紧随其后,喊杀声划破了午夜的沉寂。睡眼朦胧中的燕军将士,但见火光飞腾,神兵怪兽从天而降,大多数头蒙了、腿软了,数以万计的人在砍杀、踩踏中丢了性命。这一仗,燕军主力损失殆尽,处于弱势的齐国从此由守转入了攻,几个月工夫便收复了被占领的全部城池。田单这个原先在临淄从事市场管理的小吏,一下子成了名噪列国的一代英杰。

家国天下时代的战火已随烽烟飘逝,风雨侵蚀了几多城垣,留下了几多被传诵千古的故事与传说。万化山上,曾有过一座不知年代的土冢,人们猜说,那儿掩埋的是阵亡的火牛,被“礼而葬之”。又有一说,火牛阵一仗,燕军将士尸横遍野,田单看着不忍,命人将他们一起埋葬在这里。倘若如是,当年战败那么多人,需要造多大一个冢啊?我不敢再猜想。或许,在这金戈铁马、马革裹尸、铁马冰河啸西风的古战场上,它只是当时若干土冢中的一座。

关于万化山上的土冢还有一个说法,那是田单的墓地。田单虽贵为齐相,生前不居功自傲,身后也不愿张扬,叮嘱家人将自己悄悄葬于此,他要看着“火牛阵”,守卫着他所挚爱的这片土地。《即墨乡土志》中就有这样一句:“田单墓在万化山巅。”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人们对英雄的美好构想。众说纷纭,只会增加神秘的美感。许多神秘就是这样,从模糊中来,朦胧中出。这其实也是一种美。有时候,我们需要个人思绪的信马由缰,需要体验神秘的伟大存在。谜底一旦揭开了,往往就会平淡如水。

田单成就了火牛阵,火牛阵成就了田单。它让我们再一次见识了弱势被智慧灌注后的威力,见识了人的创造力有时会被困境激活的奇迹。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力量驱动下,奔涌向前。 [章]



泄柳店 相约在一个雨天里

◎ 愍 仲

知道泄柳店这个名字,完全是因为那个因色被弑的齐国国君姜光。沉淀了至少有365天之后,终于在一个令人伤感的天气里相会了。

昏暗的光影里,我终于和酝酿了一年之久的这个村庄的符号见面了。村头,一脸茫然而又冰冷的石碑,告诉了我仅有的一段肺腑之言:“泄柳店,建于周朝,村名因人命名。”村名?人名?简短的再也不能简短的碑铭,让我一头的雾水。不对!是一头的雨水。这是我观看碑文时原景重映。难道说这村落与孔老夫子的得意门生、七十二贤士之一的泄柳有关联?

说起这个孔门高徒,其实也就是《史记》记载过的子柳、子庚,他名颜辛(或颜幸、颜柳),春秋末年鲁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505年,比孔子小46岁,他学富五车,品德高尚,为历代帝王所推崇。唐开元27封少萧伯,宋大中祥符2年封其为阳谷侯,明嘉靖9年追赠为先贤。北宋文学家周起曾撰文赞美他:“增封云岭,诏毕鲁堂;显允君子,会议有章。英概如挹,德音不忘,横亘千古,淳风载扬。”记得在《孟子外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万章问曰:‘子庚何人也?’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

我抚摸着村碑那深深镌刻的“泄柳”二字,任由思绪滑过无际的长空,去那个遥远的时代搜寻这位先贤的身影。

在鲁国,对!是在鲁国的都城内。鲁哀公的小儿子死了,鲁哀公想准备出殡时拉棺材用的大绳,又怕违反了礼制,就去请教孔子学生有若。有若说:可以。仲孙、叔孙、季孙氏都曾经用过。”泄柳却劝阻说:“过去天子用车辕画有龙图案的殡车装载棺材,诸侯用不画龙的殡车装棺椁。在送棺椁入墓穴时,用榆白皮的汁液涂在墓道上,让棺椁滑入墓穴,这个时候才用拉棺材的大绳子。这3个臣子公然违背礼制,不用殡车而只用大绳,希望国君不要向他们学习。”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却从中折射出泄柳是一个礼学修养深厚,社会知识渊博的“知礼者”。也可以从这件事上窥知泄柳维护周礼、尊崇君权的意识是如何的根深蒂固,这在那个遥远的封建

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一声汽笛打断了我的思忆脉络,拽回到身旁车水马龙的省道上。稍作暂时的现实插曲,思绪又重新连接起来,又回到了2000年前的春秋时代。

仍然是在洙水萦绕的鲁国都城某一隅,泄柳的母亲因病去世了,他的弟弟子硕请求备办丧葬的器用。泄柳问:“用什么来备办呢?”子硕说:“请把庶弟的母女卖掉。”泄柳说:“怎么可以卖掉别人的母亲,用得来的钱安葬自己的母亲呢?不行。”他的母亲下葬后,子硕想用别人送来助葬的钱帛备买祭祀器物。泄柳说:“不能这样,我听说君子不惜丧葬之事以利其家,还是把剩下的钱财分发给贫穷的兄弟吧。”通过历史镜头的重映和回放,我们不难看出泄柳是个不损人利己的人,大有不取不义之财的君子风范。

在通往村子的狭窄深巷里,我苦苦思索着这里的先民们为何把自己的居住地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来命名,肯定是有原因的。我猜想,有可能是当年他追随着孔老师来齐国时投宿眼前的某家客栈,店家及四邻仰慕泄柳先生之高风,把他曾投宿的这地处便呼作泄柳店。是与非枉作瞎猜,不过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一根筋地这样认为。

事过境迁,除了空留下这个令后人猜想不已的村名外,并没留下有关他的什么蛛丝马迹。现在村庄已经是一个有居民326户的不小村落,整齐的砖瓦房,笔直的水泥路,整个村子我找不到一星半点的旧痕迹。除了村西那座被崔杼杀死的庄公之墓,再也找不到属于那个年代的历史影子。在一起去村民崔善堂家的路上,当过16年村支书的王华堂告诉我,崔姓在村子里属于第一个大姓。我的脑海中立马与那个弑君的崔杼联系在一起,如此众多的崔氏后裔是不是他的后代子孙呢?2000年来他们守着给祖先带来耻辱和恶名的齐庄公,让其安安稳稳地沉睡着,为其祖宗的行为而忏悔,这该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啊。

其实,这次我的泄柳店之行,除了看望那个因色丧命的姜光外,这个村子的一门传统工艺亦是我寻访的一大要点。小时候本家的石志明大娘,娘家就



织花边

是敬仲镇这一带的。她有一门从娘家带过去的织栏杆好手艺,生产队劳动之余,她就在一个圆形的墩子上娴熟地编织着花边,她那双侍弄棒槌的手让我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有时候,我趁她不注意,偷偷地摸几下她叫作栏杆托子的那些光滑木棒槌。最近几年我开始研究民间艺术后,方才知道儿时大娘使用的那些小棒槌,就是泄柳店人做出来的。

做了一辈子这手艺的崔善堂老人说:“我们村制作花边棒槌的活路,是清朝末年由村人鲍路三从外地引进的,是制作花边的必用工具。百余年来,伴随着花边艺术的长盛不衰,这村人呼作栏杆托子的手艺也成了全村人挣钱的门路,家家户户没有不会的。就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文革时期”,村民们还都偷偷地在家旮旯里藏着干呢。崔善堂老人又告诉我,那阵子逼出来的手法真叫绝,为了不被人家发现做栏杆托子,就用葫芦瓢罩在璇棒槌的架子上练就摸黑能制作栏杆托子的好手艺。他一边说着,一边搬出他那些鼓捣了快一辈子的老玩意儿,给我做示范。他介绍说,制作花边棒槌主要以梨木、枣木等硬质木为原料,分为下料、滚棍、圆腕、开葫芦、削脖根等主要工序。旧时候该手艺传媳不传女,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周边地区花边艺术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栏杆托子的生产,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旧俗,不仅传女儿,艺人们还到天津、周村等地传授技术。看来,这村民的思想还真是改变了呢。临行前,崔善堂专门挑选了3枚他制作好的花边棒槌送给我,虽说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还是十分感激老人的这份心意。听说现在的年青人大都外出创事业,没有多少人喜欢这门手艺了。我知道假若有一天制作栏杆托子的手艺没人做下去的话,那么传承多代人的临淄花边艺术大有失传的可能。离开那户农家小院

之际,我默默地祈祷着。

夏后的这场及时雨从早晨不住点地下着,天空湿漉漉的,心中不住地犯嘀咕:看来今天若想见到泄柳店老鹰啄蝶的景象是不可能了。据说这个村里有一个姓王的村民有一手扎制风筝的拿手好戏,尤似鸢鹰腾空后,蝴蝶即沿线蹁跹而上,达到了鸢鹰近处,鸢鹰猛一低头,从地面往上看如同啄噬蝴蝶,惊恐害怕的蝴蝶随即闭合翅膀徐徐而下,接近地面时复又展翅升空,如此反反复复,妙趣横生,观者无不为此一“鸢鹰啄蝶”拍手叫绝。问及72岁的王华堂这项奇观的近况,他苦涩地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他那饱经沧桑的古铜色脸上,我似乎体味出些许不妙的成份,感觉到了他们那个扎制鸢鹰的本家可能成为了最后一个抚摸过天空的人。许多年后,也许很少有人再记起天空中的那纸鸢啄蝶的奇妙景物的样子,记起那个曾经给予它生命的王姓村民。

耐着性子的雨,湿透了灰濛濛的长空,洗涤着古老村庄的尘埃,也打湿了我这颗远道而来的心。怀揣着想探索泄柳店一切神秘的情愫,恋恋不舍地收起从齐庄公无边淫乱的境地里飘荡的思绪,心有不甘地关闭了触及先贤泄柳人和事的历史闸门,无可奈何地告别了热情陪伴我的老书记、老艺人,还有那个属于子辈的小王强,做起了再见的手势。

泄柳店,我还会再来的。但愿相约在一个秋高气爽硕果累累的金色季节,再来时肯定不会仅仅是几枚棒槌托子,说不定有我心仪的临淄花边,还有陈酿的牺尊美酒。 ㊦





北部乡镇齐文化考察记

李玉国

4月19日,参加了齐文化研究社和齐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北部乡镇齐文化考察,感觉收获良多。

一、稷下学宫

考察第一站是稷下学宫遗址。其实说是遗址,只不过是一片青青麦田,稷下学宫不惟“高门大屋、康庄之衢”的遗迹全无,甚至连学宫的确切之地也已众说纷纭。当年,天下贤士尽归齐国“位列大夫,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的文化胜景也早已成为学人的记忆与憧憬。但踪迹全无丝毫不影响稷下学宫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分量,稷下学宫为天下贤士讲学著述、切磋论辩创造的繁荣景象,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今,稷下学宫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象征,早已深入人心。古人有诗云:“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稷下学宫作为具体的建筑,的确早已片瓦无存,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长存于历史长河。这也说明精神远比物质更为流传久远。甚至就算没有文字记录,单靠口耳相传,文化也能够流传千载。泽被后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吗?

二、晏婴墓

在晏婴墓,给我留下鲜明印象的不是巍巍墓冢,也不是晏子廉政事迹的石刻画像,而是人们不久前敬献的花圈。

同行的前辈介绍:此墓严格说来并不是晏子真正埋骨之地,但晏婴墓在这片土地上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原来,因时代久远、战乱频仍,至宋朝之时,晏婴墓在这片土地上的确切位置就已莫衷一是。天下太平后,宋人为了纪念晏子以人为本、廉洁奉公的德行,特地在此堆土而成晏婴墓。因为只是堆土而成,所以墓中并无夯土。此说得到“盗墓人”的验证:盗墓人曾在此盗挖,从盗洞中也可以证实前辈所言不谬:整个晏婴墓中,并无夯土痕迹。想不明白的是,盗墓人居然去盗一代廉相晏婴的墓,亏他们想得出来。就算这是真墓,除了能证明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外,盗墓者恐怕也无半点收获。看来盗墓也需要学点历史知识。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晏婴也称得上一代廉相了。所以他的墓地即使被岁月湮灭,人民也照样会堆土成墓。千年之后,也照样会有人敬献花圈。

心中有人民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民心永远是一座无字丰碑。

三、大城小城

说实话,大城小城是此行最大的收获了。此前,这个问题我一直没关注过,原因就在于想当然的把大城小城类比于古代城池的城郭(外城内城)。不值得过多关注。此番经实地考察和姜健介绍,才得知,小城是从大城一侧扩展而来。是田氏代姜之后给自己建的新巢。也就是说田氏代姜之后在紧挨着大城西南角又建了小城作为自己的宫殿。且小城与大城接壤之处的城墙厚达数十米之多。其他方向的城墙反而薄了很多。这说明田氏代姜之后,田齐政权当时最大的反对声音并非出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所以才有这番防内甚于防外的举措。用姜健的话说就是小城建在大城西南,还有一层基于安全退路方面的考虑:万一姜氏子孙造反,田氏控制不了局面时,也好往西南方向田氏的老家——陈国(今河南淮阳)逃跑。但好在田氏子孙深知唯有人民是最得罪不起的治国至理,倒也与民生息,不几代就巩固了田齐政权,及至田齐王建亡国之时,就有不少齐国人为之唏嘘了。

厚厚的城墙在田齐统治者手里成了摆设。不过,也幸亏这厚厚的城墙,方才留存至今。其他处的城墙基本上已荡然无存。不过这也反证了上文所言:唯有文化之墙方能永屹于世。

四、高傒墓

敬仲镇白兔丘,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起白兔丘,那时一直以为这里野兔成群,所以才叫白兔丘。及大,才知自己闹了一个大笑话。原来白兔丘之名源于高傒墓:高傒,自号白兔先生。因其对齐国的发展壮大发挥过巨大作用。所以,他去世后,被齐王谥号敬仲。这也是敬仲镇、白兔丘地名的由来。

高傒虽为齐国上卿,并且也为齐国发展发挥了自己巨大的作用,如先后迎立齐国国君齐桓公、齐孝

“董永与七仙女”故事的由来和流传

杨玉勇

黄梅戏《天仙配》响彻大江南北，家喻户晓，戏中主人公董永与七仙女的原型来自于汉孝子董永与傅小姐。

董永，后汉千乘人，今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人。千乘城始于战国时期，因齐景公有马千乘，常猎于此而得名。相传，东汉时期，千乘郡内有1户人家姓董，父子2人相依为命，董永为了生计而学会女人的针线活，纺线织布。一天，董永的父亲去世了，为了葬父，他卖身来到傅员外家做家奴。董永的勤劳朴实和“孝”行打开了傅员外女儿傅小姐的爱情心扉，他们借马踏湖边的那颗老槐树枝叶传情，私定终身。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一段时间，傅员外知道女儿与董永私定终身事后，不但没有责难女儿，他还深明大义，冲破当时世俗观念，让女儿下嫁董永，成全了这对青年的恋情。

傅小姐下嫁董永后，在千乘郡影响很大，人们议论纷纷，由于傅小姐长得花容月貌，美若天仙，人们在议论中认为是仙女下凡，故所以说董永娶了一位仙女，久而久之，仙女下凡嫁给董永为妻的故事逐渐在九州大地传开了。

汉代，由于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以

“孝”教化其民，推崇孝道，作为孝子的董永，成了当时人们道德上效仿的楷模，迅速由齐地向外流传。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先在山东流传，继而在黄河流域广为传播；东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侵略中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极不稳定，处于长期分裂局面，大批士族和平民相继南迁到长江流域并定居下来，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也从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流传。

南宋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宋文帝的太子刘劭杀害宋文帝自立，改元太初。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起兵讨劭，以“孝”号召，收买人心，他率领讨劭军沿江东下，到达新亭(今南京南)即位，其年号为“孝建”，死后谥号为“孝武帝”。由于刘骏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提倡孝道，“孝”在当时社会上蔚然成风，作为孝子出身的董永，很快成为社会上最受推崇的历史人物之一，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进一步传播，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并逐渐向神州大地蔓延，由于董永孝名远播，逐被后人奉为“二十四孝”之一。

(作者单位：山东省鲁中监狱)

公。对齐国发展壮大为春秋五霸之首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整个齐国发展史上还不算浓墨重彩的第一梯队之人。但在地方政府和全国各地高姓子孙的共同投资努力下，现在这里已是全国高姓祭祖之地，其墓建筑规模却丝毫不亚于任何第一梯队的重要人物。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容忽视民间力量。衣锦还乡是中国人固有的情结，如何最大程度的吸引衣锦还乡者的投资也就成为当事者要多加考虑的问题。

五、藏书楼与金陵寺

此行还参观了素有全国地方志收藏第一人之称的高玉森的弘阳藏书楼。2万余册的志书蔚为壮观。大家都不由感叹：“持之以恒的做某一件事，必定会结出硕果！”在高先生的另一展厅收藏的是书画碑帖、陶器和酒。高先生的收藏，倒也无形之中紧紧

抓住了中国文化之精妙所在。书与酒，清醒与迷狂，这两者应该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翼，影响深远。

在路上，有人议论说，这些书，他也就只是收藏，恐怕不会读。想想也是，古代，藏书家往往都是知识大家，从这一点上来说，当代之人只是学到了古人的皮毛。

书并非止于藏，书最大的境界就是处于传播状态之中。这一点，佛倒是深谙此道。信众也是亦步亦趋的践行其道。或许，对于佛而言，如果印一万册佛书，能结一善果，印书者也足以成佛矣。在金陵寺我们几乎每人都满载佛书而归，看到我们一行如此爱书，直令热心人大呼：这次主持不在，下次我再和你们来，直接向主持要，到时你们尽情的拿！

一灯能灭千年暗，一书能启万年愚。这便是文化的力量。而发挥出力量的前提是书的传播，而不是收藏。